越地春秋

目录



2012年第4期

总第41期

存史资政

3 绍兴县的解放和县城的接管/绍兴县史志办公室

8 试探中国（发达地区）农业发展的企业化之路
——关于浙江绍兴县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改革的后续思考
/欧 文

志鉴论坛

16 实事求是地对待市县志书的篇幅问题
——以《绍兴县志》《海盐县志稿》等为例
/颜越虎

专题研究

27 “王阳明在绍兴”考释/钱茂竹

35 李钟岳与“大通党案”/黄 斌

45 越缦堂联话辑注（三）/邓政阳

62 绍兴陶堰秋官里牌坊研究/陆菊仙

主 办

绍兴县史志办公室

绍兴县史志学会

主　编：何鸣雷

副主编：徐炳荣
董思思

编　辑：陈飞燕
孙　羽　宋如玲
陆　杨　郑文燕
韩　英　韩兰芳

山会人物

69　李慈铭年谱（续十）/傅振照

95　刘基被“羁管”绍兴/余德余

101　辛亥志士沈钧业/蔡　彦

史海钩沉

108　世界红卍字会绍兴分会史料钩沉/裘士雄

113　钱玄同和古越藏书楼/鲁先进　张玲琳

地　　址：柯桥寺岔96号
邮　　编：312030
电　　话：0575-85561339
传　　真：0575-85561395
E — mail：sxxshizhi@126.com
网　　址：www.sxxszb.com.cn
制作印刷：绍兴县报印务有限公司
出刊时间：2013年3月6日

声明

1.本刊所载文章仅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刊立场。

2.稿件凡经本刊使用，如无电子版、信息网络传播权等方面的特殊声明，即视为作者同意本刊进行电子版信息数字化传播。

3.本刊及越地春秋网站刊登的所有作品未经本刊书面许可，不得转载、摘编或以其他形式使用。

4.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收到稿酬和样书的作者请直接与本刊编辑联系。

绍兴县的解放和县城的接管

□ 绍兴县史志办公室



随着全国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1949年2月，中共浙东临委领导中心转至会稽地区，绍兴地区成为浙东解放前夕的政治中心。绍兴县地处杭州和宁波之间，地理位置重要，又是闻名全国的历史古城。浙东临委对绍兴县的工作十分重视。为加强绍兴县工作，临委在1949年3月中共会稽临工委成立后，指示成立了绍兴县临工委、县办事处、县独立中队。在部署迎接大军南下、接管城市的准备工作时，又决定绍兴县城由临委城市工作委员会负责接管，并为解放绍兴县城做了大量的准备。三四月，临委和浙东第二游击纵队数次派人进县城，了解情况，与绍兴城内上层人士联络接洽。在中共会稽临工委、绍兴县临工委的配合下，临委城工委还对绍兴县面积、人口、行政区划等一般情况，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等机构，公用事业、工商业、文化教育、社会团体、外侨、特种行业、地方派系等情况进行了调查，于5月3日编印了《绍兴城市调查报告初稿》，为明确敌情、部署解放绍兴县提供了详细的资料。

一、绍兴县的解放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突破长江天堑。4月21日，南京解放。随后，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三野战军乘胜南进，分路进入浙江。5月3日，杭州解放。为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浙东，中共浙东临委、浙东第二游击纵队决定迅即解放诸暨、绍兴。5月5日下午，浙东第二游击纵

队在枫桥大礼堂召开1000多人参加的决心大会，决定迅速解放诸暨、绍兴，并确定由浙东第二游击纵队直属主力解放绍兴。

5月6日，浙东第二游击纵队司令部及直属三支队、警卫大队、浙东人民革命干部学校、中共绍兴县临工委、绍兴县办事处、新越大队等700余人，在司令员马青、政委顾德欢等人率领下，从枫桥出发，向绍兴县城挺进。中午，部队在绍兴县兰亭野餐时，得到国民党部队在县城内新增两个团的消息。为了尽可能使古城免遭破坏，纵队领导决定暂缓攻城。6日晚，部队在离县城约10公里的山村坡塘宿营，并派人进城了解情况。7日上午，绍兴县临时救济委员会派代表到坡塘汇报城内有关情况及准备迎接解放军的各项工作，并告知城内驻军已向宁波方向逃窜。纵队领导立即决定兵分两路进攻县城。顾德欢、马青、张任伟、诸敏亲自制定方案，具体布置任务：三支队一大队从县城南门突入，向县城的东、南、北三个方向纵深攻击，扩大战果，警卫大队密切配合；三支队二大队在城东东湖边的箬贲山一带，占领有利地形，封锁公路，阻击溃逃的国民党部队。任务布置后，部队分头行动。三支队二大队在上午10时提前出发，下午2时左右，进到离箬贲山约2公里的几座小山旁时，有零星的机步枪弹射来。部队立即占领两座小山头，用重机枪向箬贲山方向还击。国民党部队也占据了离箬贲山不远的一座山头，封锁部队前进的道路。相持一段时间后，国民党部队撤离。三支队二大队继续在箬贲山一带封锁公路。

浙东第二游击纵队司令部、三支队一大队、警卫大队等稍后向绍兴县城挺进。时驻县城内的有国民党“长江”部队和县自卫总队等，四周要道筑有碉堡，府山、塔山、蕺山等山头均有国民党驻守。在浙东第二游击纵队司令部、三支队一大队、警卫大队等兵临城下时，城内仅有少数残留的国民党县自卫总队和土顽武装。下午3时，部队进至县城南门外，纵队司令部在龟山设立指挥部。当三支队一大队、警卫大队插到南门时，塔山及南门碉堡的守敌向部队开枪。经过短时间的交战，三支队一大队迅速占领南门，数十名警察携枪投降。随后，三支队一大队和警卫大队分三路向城内继续挺进，很快占领了塔山、府山，把红旗插在山顶上，绍兴县宣告解放。中共浙东临委机关、浙东第二游击纵队司令部、中共绍兴县临工委等在群众的欢迎声中进城。5月8日，《绍兴新闻》、《绍兴工商报》照常出版，并以大字标题报道绍兴解放的消息。

二、县城的初步接管

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各地县城的接管工作由南下干部与当地干部共同进行。由于解放进程进展迅速，负责接管工作的南下干部无法按时到达，因此，绍兴县城的接管经历了两

个阶段，即初步接管和全面接管。

绍兴县的前期接管由浙东临委直接负责。绍兴县解放时，由于国民党的统治整体崩溃，国民党在绍兴各地的政权除军事机关随军逃跑外，官僚资本企业、财政金融机构均未撤走。因此，县委（工委）、县政府（办事处）在县城解放的当天，即派事先安排好的武装和工作人员进入县城，按照浙东临委确定的“维持秩序，保护一切公私财产，一切原封不动”的原则开展工作。武装和工作人员入城后严格遵守城市纪律，在迅速解除城内的一切反动武装后，先后查封国民党县级政权机关、档案部门，接管国民党县政府及官僚所办的银行、工厂、公司、医院及教育机构等，控制邮电通信机关，对车站、教堂、名胜古迹等公共设施采取保护措施，并规定对私营工厂、商店等不得侵犯。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游击纵队从枫桥出发之前，组成几个接管小组，明确分工，一进城后迅速进驻邮局、银行、电灯公司、仓库、机关等各部门。各单位组织的护厂、护局人员，主动配合接管人员，保证了县城照明和邮电顺畅，城内秩序井然。

5月8日，浙东行政公署、浙东纵队司令部在原国民党绍兴县政府内成立联合办事处，负责绍兴的接管工作，并由公署财政处处长朱之光负责处理绍兴政治财经事务，纵队参谋长张任伟负责处理绍兴城防治安事务。同日，为迎接人民解放军东进，会师绍兴，中共浙东临委、浙东行政公署、浙东第二游击纵队联合发出布告：拥护大军，解放浙东；严守秩序，各安其业；旧职人员，照常供职；各家商店，照常营业；各家工厂，照常生产；公共财产，统一接管；所有档案，全部封存；发现坏人，依法惩办等。

为了维护县城的社会秩序，5月9日至10日，浙东纵队司令部、政治部在绍兴中学先后召开工商界、文化界及居民代表参加的3个大型座谈会，出席人员各达100余人。工商界座谈会，主要是号召工商人士努力生产，保证营业，并协助部队收容散兵游勇。文化界座谈会，参加的对象是报社、印刷厂的代表和中小学校长，希望大家积极宣传党的政策。同时，为把群众组织起来，还召开了居民代表座谈会。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七兵团二十一军六十一师政委王静敏率一个团到达柯桥镇。浙东第二游击纵队由张任伟、诸敏骑马出城，与王静敏胜利会师。13日，该团进入县城，参加维护县城社会秩序和协同担任城防警戒等工作。

5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七兵团二十二军和浙东第二游击纵队在绍兴觉民舞台举行南北会师大会。22日，中共浙江省委决定，建立萧（山）、绍（兴）、诸（暨）、杭（县）四县工作委员会，由张雨帆任书记，王醒、刘显辉、林岑、商景才为委员，并确定了秘书、组织、宣传方面的负责人，指导筹建所属地域县委及人民政权组织机构。

三、县城的全面接管

随着人民解放军和浙东地方武装会师的实现，负责南下接管的干部陆续到达绍兴，绍兴县城进行全面接管的条件成熟。根据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司令部、政治部的电令，1949年5月25日，绍兴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由谢福林担任主任（7月由严政接任），王起担任副主任。军管会下设秘书处、军事处、文教处、财经处、政务处，统一全市军事民政等管理事宜。当日，市军管会发布第一号布告，规定军管会为军事管制时期的最高权力机关，统一全市军事、民政等管理事宜。同时成立绍兴市警备司令部，由谢福林任司令员，张任伟为参谋长，诸敏为政治部主任，负责绍兴市的军事警卫、守备、维护社会治安及维护军容风纪等工作。

绍兴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后，立即部署开展全面接管工作。根据迅速建立革命秩序，安定市民的日常生活，恢复生产的接管总要求，绍兴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开展了对国民政府绍兴县地方旧政权的接管。至6月7日，市军管会通过派接管小组和军代表，先后接管了国民党绍兴县党政、警察、法院等党政机关，收验了文件档案，登记清理了物资，并按照上级的指示，对旧职人员在发放二次维持费后，根据情况或遣散或留用。同时，建立新的人民政权。

6月3日，中共绍兴县委成立，周林任县委书记，王秋林任副书记。县委设立了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民运部等工作机构，驻地设于城区光明路。6日，绍兴县人民政府成立，县长王秋林，副县长信明吾主持工作。县政府设有秘书室、民政科、财粮科（同年12月改为财政科）、文教科等工作机构，驻地设于城区西咸欢河沿。同月，建立了9个分区委和区人民政府，分别接管国民党政府的72个乡镇，并陆续建立乡镇人民政府。

在开展接管旧政权工作的同时，市军管会根据中共浙江省委《关于金融、贸易、电讯、公路、铁道、税收诸部门全省皆按整套系统由上而下进行接管的决定》，通过成立接管小组，分系统派遣军事代表到单位一个一个接管的方式，开展接管。在中国人民银行杭州分行的具体指导下，5月底，绍兴市军管会派人接管了国民党政府在绍兴县设立的中国银行绍兴县支行、中国农民银行绍兴办事处、交通银行绍兴办事处、中央合作金库绍兴分理处、浙江地方银行绍兴支行等金融机构。6月7日，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绍兴支行，管辖十专区各县金融机构。

电讯、运输及税收等系统的接管工作也有序进行。5月28日，市军管会任命侯子丰为驻大明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军事代表，李耐河为驻绍兴电讯局军事代表，陈涛为驻绍兴电话公司军事代表，马盛臻为驻绍兴邮政局军事代表，康传孔为驻绍兴水利局军事代表，朱治德为驻大华、正大、同

昌、卓章轮船公司军事代表，高振芝为驻萧绍汽车公司、杭绍小客车运输行军事代表，对这些单位进行接管。5月29日，市军管会任命张承学为接管原县田粮处小组组长，章联为组员。6月1日，市军管会财经处接管原国民党绍兴市的财政科、绍兴县税稽征处及各区乡工作，并通告自即日起开始征收屠宰税、筵席税、娱乐税、使用牌照税、营业牌照税、牙行牌照税、契税房捐等税目、税率。除规定之税收外，任何机关、团体、部队和个人，未经批准，不得向人民征收一文一粟。

此外，市军管会还领导接管了公立医院、公立学校、新闻出版、文化艺术等单位。5月28日，绍兴市军管会成立了3个军事代表组，接管3个公立医院。任命张正行为驻前国民党六九医院军事代表组长，戴守亮为副组长；谢永豪为驻前国民党绍兴卫生院军事代表组长，吴平为副组长；朱逸民为驻前国民党省立绍兴医院军事代表正组长，柳野为副组长。6月1日，又任命梁耀东为省立绍兴中学军事代表，艾绍信为驻绍兴《民国日报》社军事代表。6月11日，派员接管绍兴县立图书馆。同月，浙东行署还接管了绍兴县救济院。

在接管过程中，接管人员对单位、企业原有人员采取包下来的政策，将人员、物资、账簿、合同、契约、票据等编造清册，并向上级机关办理交接。接管工作主要在5月底至9月间进行。在接管任务繁重、接管干部缺乏、时间紧要求急的情况下，绍兴市（县）委、政府在市军管会领导下，抽调人员，成立接管组织，学习相关接管政策，认清接管的目的和意义，发动并依靠群众，按照系统接收的精神开展工作，使整个接管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工厂企业正常开工，学校照常上课，群众情绪稳定，大多数留下的旧职人员能安于职守，听候安置，社会基本安定。

县城的接管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是绍兴县地方党组织成为执政党后进行城市工作的首次实践。县城接管的平稳完成，为绍兴县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经济恢复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编者按：党的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工业化基本实现，信息化水平大幅提升，城镇化质量明显提高，农业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成效显著”，也就是“新四化”。而农业现代化表现在农业基础设施、农业机械、农业科技、农业生产组织等方面。其中农业生产组织是农业现代化建设中很重要的因素，是基于农业生产力水平，使农业生产得以顺利开展的保证，是适应农业生产现代化发展和产业化、市场化发展的重要保证。是促进农业现代化的主体。它伴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全过程，并不断自我完善和发展。《农业企业化》一文是作者长期关注农业发展，并进行思考的收获，为纪念建党90周年所作。文中有一些独到的见解，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的参考价值。今在此刊登出来，供交流，望提出宝贵意见。

试探中国（发达地区）农业发展的企业化之路

——关于浙江绍兴县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改革的后续思考

□ 欧 文

摘 要：在中国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农业发展出现了通过土地股份合作的形式走向规模生产和经营的现象，这实际上是一种企业化的发展趋势。农业发展的企业化在中国特别是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既具有必然性、必要性和可行性，更具有解决“三农”问题的深远意义。所以，要制定农业发展的企业化规划，更要创造条件大力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企业化进程，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民公民化和农村城镇化。

关键词：农业发展；企业化；道路；试探

“三农”问题一直关系着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关系着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因此一直是党和政府极

其重视和要解决的问题。在中国历史进入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今天，“三农”问题已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薄弱环节和瓶颈，党和政府在新的规划中对“三农”问题作进一步的分析，并作出更为科学全面的部署。更为科学有效地解决“三农”问题，已成为我们着力思考和实践的课题。农业发展的企业化，尤其是大力发展中小型农业企业，是当今时代和农村改革开放的需要，是积极推进农业现代化从而更科学有效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方法和途径，是一种具有必然性的趋势。

一、农业发展企业化之路的必然性、必要性和可行性

这里所说的农业发展企业化是指农业经济的主体由农户向农业企业转变以及逐步按企业要求开展农业经济活动的过程。所以，农业发展企业化有以下几层含义：一是农业发展企业化首先是农业经济主体由农户向企业转变，这应成为中国农业发展的主角，二是农业经济活动逐步按企业要求进行，三是农业发展企业化是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根据情况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才能真正成功。

农业发展企业化之路具有必然性、必要性和可行性。在当代世界经济中，企业是通过协作方式进行生产和交易，以实现财富增值最大化的社会经济组织。目前，在中国深化农村改革，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和农村建设，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实践中，农业发展企业化有其深刻而充分的原因。首先，农业发展企业化尤其是大力发展中小型农业企业是农业生产力发展特别是生产社会化的必然产物。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讲，企业作为一种以协作为特征的社会化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即近代的产物。在以石器为代表的生产力基础上，由于生产率极其低下，人类只有集体劳动才能开展生产活动以勉强维持生存和发展，所以，那时集体劳动的生产组织根本不可能是企业形式。随着金属工具的使用，特别是铁器的使用，生产力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私有制也产生，个体劳动不仅有可能，而且有必要，于是个体的简单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成为一种主要的生产方式。我国历史上生存了两千多年的自给自足的封建生产就是这种生产方式。资本主义革命以后，特别是工业革命以后，以机器为代表的社会化大生产占统治地位，相对复杂的工场手工业过渡到机械化大生产，企业成为一种主要和基本的生产方式和经济组织。改革开放时，由于我国生产力水平总体较低，且不平衡，特别是广大农村还是以手工劳动为主，加上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原则和特殊情况如人口众多，耕地缺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仅是一种必须，符合生产力状况，而且是一种可能，符合我国实际，这是冲破历史循环和现实束缚的创举。实践证明，这一改革是正确的，使中国走上了符合自己实际的农

业发展之路，即中国特色的农业发展之路。中国农业不可能也不会走上菲律宾的农业现代化之路，实践告诉我们要吸取他们的教训。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走中国特色的农业、农村发展和现代化之路，是我们唯一正确的选择。

经过30年的改革发展，一方面一系列适合国情的农业机械发明、引进和应用使中国农业生产力水平得到较大提高，农业的社会化服务也全面开展；另一方面中国农业的基础仍然比较薄弱，现代化程度整体不高，而且人多地少，自然条件差异很大，不平衡问题仍然存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农业生产特别是农业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中国经济发达的地区，农业的生产力水平更高，农业的专业化、规模化和商品化程度更高。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我们要坚持适合国情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使之进一步提高、完善、壮大，成为“现代小农”，另一方面在条件具备的地方，按专业化、规模化和最优化的原则组织起来，发展成现代化的经济单位，使农业真正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农业发展的企业化，着力发展适合国情的中小型农业企业就成为一种必然选择。

其次，农业发展企业化，尤其是大力发展中小型农业企业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效益，降低生产成本以实现财富最大增值的需要。在社会分工日益细化和市场经济日益完善的条件下，生产和交易只有通过协作组织起来，才能避免内耗，进一步提高效率，才能降低成本，进一步提高效益，从而实现财富增值的最大化。所以，发达国家在现代化农业的基础上组建大型农业企业或公司就是很自然的事了。目前，在国际上占垄断地位的ABCD四大农业企业或公司更是为了获取高额利润存在。近年来在国际粮价暴涨的情况下，它们成为最大的得益者。虽然我们强烈谴责这种杀人不见血的经济行为，但我们可以从中吸取很多经验和教训。

其实，企业作为经济组织有很多优点和特点。它具有组织的严密性，使效率和效益最大化或最优化。它具有较强的自我增值能力，往往表现为扩大再生产能力。它还具有较强的自我循环功能，不仅具有较强的自我修复能力，还具备较强的抵御外来干扰的能力。这正是个体经济和“现代小农”经济所欠缺能力的。历史上，封建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式之所以在经济繁荣时开始走下坡，或在经济困难、自然灾害、战乱时缺乏自救能力，其原因之一就是它缺乏稳定性和自我发展能力。一旦小农经济遭破坏，那么封建经济就丧失了基础，社会就动荡不定，政权就要更替。中国历史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小农经济周而复始的过程。我们一定要打破这种历史循环，一方面坚持土地的公有制形式，另一方面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积极探索适应国情的现代农业发展之路。在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摸索出更加行之有效的形式和途径，实现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和农村现代化。农业发展企业化，尤其是大力发展中小型农业企业可以为我国农业的进一步发展注入一股新的动力和活力，可以提高生产效率发展农业，提高生产效益实现农民增收，从而改变农业增长方式为农村现代化开辟出一条更加广阔的道路。

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情况下，虽然农民的积极得到充分的调动，土地得到了充分使用，农业生产得到了发展，温饱问题的解决也有了基础，但农业规模有限，只能是简单生产，农业生产的效率和效益仍然不高。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民感到“自己种粮不如买粮”等，农民的收入靠农业也没有大幅度的提高，并过上富裕的生活。由于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已不满足于从事农业和农业收入。在坚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允许土地承包权的流转，实现土地的集约使用，规模经营，提高效率和效益，为现代农业的发展，农民过上富裕生活创造良好条件。从2010年绍兴县受表彰的农业企业的情况看，在绍兴县凡按企业要求开展生产及经营活动的农业经济，与没有按企业要求开展生产和经营活动的相比，在生产发展和经济效益提高方面都具有明显的优势，而且愈按企业规范开展，农业经济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方面就愈有保证。

第三，农业发展企业化，尤其是大力发展中小型农业企业符合我国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实际，适应农民生活现状。中国的农民是一群富有首创精神的劳动者。他们不仅创造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农业生产方式，而且在实践中他们又不断丰富、完善和发展它，出现了各种具有一定规模的专业户。近年来，在生产实践中，他们根据经济形势的发展，把分散耕作的土地以股份的形式统一起来，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集中经营，既保证了土地使用权，享受股份收益，又转变了农民的身份，成为农业工人或其它行业的劳动者，实现了农民收入多元化，农村经济多样化。这样农业因集中经营而发展，农民因此增加了收入，农村建设也因此而获得了新的机遇。从2007年9月开始，中国十强县之一的浙江绍兴县选择王坛镇南岸村作为试点，开展建立土地股份合作社改革试点。到2010年年底，绍兴县已成立了56家土地股份合作社，总入股面积40282亩，占全县全部水田面积的17.51%，入股农户22264户，占全部农户数的12.36%。改革实践证明，土地股份合作社是中国发达地区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改革的一种主要形式。但农村土地股份合作社往往是村民委员会和农民土地使用权的结合体，具有明显的管理色彩和农民自治性质，所以，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农业生产和经营组织。从目前情况看，农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只能是一级流转。也就是说，农民是农村土地使用权的直接拥有者，他们有权把土地交

给他人使用，也有权收回。土地流转的只是用于农业的使用权，而不是由土地使用权衍生出来的抵押权、买卖权等。农民的收益也只是由土地使用权出让而获得的补偿。否则，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就会走上“不归之路”，一系列问题都将由此产生。至于随着经济发展，农民成为现代公民，那需要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需要一个逐步完善配套的过程。

如何使土地的集中经营使用能得到持续发展，农民的收入能得到持续增长，农村建设步入现代化轨道，关键就取决于如何集中生产经营、使用以及所提供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农业发展的企业化，尤其是大力发展中小型农业企业，实行企业化生产经营是改善集中生产经营，提高社会化服务的落脚点之一。从绍兴县进行土地股份合作社改革后的农业生产和经营情况看，农业发展的企业化成为一种必然选择。具体地说有三种情况：一是在土地股份合作社的形式下，直接由合作社按分工和协作相统一的原则集中生产和经营。农户既可以拿到入股的收益，又可以在合作社根据需要参加农业生产劳动，获得劳动报酬。这取决于合作社生产和经营的效益，如果亏损又得不到补偿，那么下一年度的生产和经营就将难以继续。这种生产和经营的方式并不多。二是在土地股份合作社的形式下，由善于生产和经营的农户集中统一生产和经营，也就是扩大的农业生产承包经营。农户既可以拿到入股的收益，又可以在承包的大户根据需要参加农业生产劳动，获得劳动报酬。当然这取决于大户生产和经营的效益，如果效益较好的，那么就能不断承包经营。这种生产和经营方式占大多数。三是在土地股份合作社的形式下，由独立的农业企业集中统一生产和经营。农户既可以拿到入股的收益，又可以在独立的农业企业根据需要参加农业生产劳动，获得劳动报酬。当然这取决于独立的农业企业生产和经营的效益，如果有良好的经济效益，那么这种生产和经营就能继续进行下去。这种方式也不多。总之，不管哪种生产和经营方式都与经济效益密切联系，都于经营管理密切联系，都与社会化服务密切联系，一句话都具有企业化的特点。

近年来，在农业经济中出现的问题，如“三鹿”奶粉事件，进一步说明农业已不是农业自己的事情，关系到整个社会和国际声誉。究其原因，既有农业经济自身的因素，如生产经营者的素质不高、组织松散等，又有体制机制问题，如价格机制、质量监管体制等。所以，农业的健康发展不仅需要农业自身努力，特别是提高它自身的组织性、自律性，更需要整个社会和国际因素的帮助，尤其是提供必要的社会化服务，如生产规范、科技支持、质量监管、基础设施、价格补贴、绿色化肥农药饲料、农业种子和机械、农业保险、农民培训等等。农业发展的企业化，大力发展中小农业企业，是克服农业自身问题和困

境，走出一条现代化大道的有效举措、方法和途径。实行企业化经营，大力发展中小型农业企业有助于改善农业组织结构，有助于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有助于增强农业的自我、自主发展能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走上自强之路，有助于提高农业的社会化程度和自律性，并为社会化服务提供充满希望和发展前途的服务对象，最终生产出质优量足价廉、安全卫生绿色的农产品，满足国内外人民的需求。

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所作出的决定，允许农村土地在坚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合理合法流转，为农业的规模经营，农民的持续增收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也为农业经济的企业化打开了绿灯。因为农业发展的企业化是农业规模经营，农民持续增收的有效载体和出色的承担者。而中小型农业企业更是适合我国生产力水平、经济水平和劳动力素质等实际情况的社会经济组织。

二、开辟中国特色的农业发展企业化之路

首先，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实践证明，中国的建设必须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走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实践基础上，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农业现代化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走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之路。经过三十多年的实践，中国农业已经走上了具有特色的道路，也只有继续走这条道路，才能开辟出一个崭新的天地，开创中国农业发展的新时代。所以，在农业发展企业化过程中，我们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创新创业，探索出有中国特色的农业企业。

其次，这是中国农业自身发展的需要。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特殊的历史和现实。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情况复杂的国家，更具有自身的特殊情况。在当今国内外形势下，这种特殊性就更加明显，既是她的局限，又是她的优势。从农业发展的角度讲，国大人多地少，各地生产条件差异大，单一的企业形式不适应实际需要，各种农业企业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和局限。只有从我国农业自身发展的实际出发，才能建立起促进农业进一步发展的农业企业。

第三，这是吸取国外农业现代化经验教训的结论。后发国家建设的有利条件在于有先发国家的经验教训可以吸取。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中国农业的现代化整体上是滞后的。所以，当我们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时有各种经验教训可以吸取，有成功的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有东方日、韩的成功经验，更有许多教训，如菲律宾。中国有强大的制度优势，巨大的农业需求，勤劳聪明的人民，只有从实际出发，吸取它们的经验和教训，

就一定能走出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之路。

第四，中国特色农业企业体制是一个以农民利益为基础为的多层次多形式的结构。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谁是农业企业化的利益获得者，这是首先要回答的问题，也是农业企业化的根本问题。农民是农业生产的主要承担者，是农业经营活动的主角，是农业基本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和使用者。所以，农民应是农业发展企业化的主要参加者，也是农业发展企业化的主要利益获得者。如果否认这一点，那么农业企业化就会犯方向性的错误，不仅经济得不到发展，还会发生社会性乃至政治性错误，成为第二个菲律宾。只有以农民利益为基础，发动农民，依靠农民，提高农民，解放农民，同时调动国内外各种社会力量参与，那么农业企业化不仅能顺利推进，而且能推动农业乃至整个社会现代化建设的发展。

由于各地生产力水平不一样，生产条件各不相同，所以，在农业企业化过程中允许不同层次农业企业的存在，不能搞一刀切。对喜欢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户，按农业企业化的标准和社会化的待遇继续予以支持，保证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正常进行，对于联合承包的农户或扩大承包的农户要给以更大的支持，让他们成长为“现代小农”。目前，随着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的扩大，我国要重点按农业企业化的要求大力发展中小型农业企业，并按农业社会化的政策予以大力支持。至于大型农业企业有条件的也要鼓励和支持，特别是参与国际竞争的农业企业，国家更要大力扶持。另外，由于各地生产和社会生活条件各不相同，所以，在农业企业化过程中肯定会出现各种形式的农业企业，要允许各种形式的农业企业并存。

第五，中国特色农业企业是一个以生产基础的多种经济要素有机组成的功能多样的经济组织。中国的“吃饭”问题只有依靠自己的生产才能解决，这一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农业企业必须以生产为基础。如果放弃这个基础，那么农业企业化就会丧失根本，走上歧途，犯下历史性错误。当然，由于中国农业发展起点较低，总体还比较落后，所以，在农业企业化过程中要组织多种经济要素参与，组成有机整体，包括民间的、国家的、国外的经济要素，还有人才、技术、资本、品牌、市场等经济要素。因此，中国农业企业的功能也将是多样的，可以是生产性的或经营性的，也可以是综合性的，当然要以生产性为主。大量的将是生产性中小型农业企业。

三、实施农业发展企业化工程积极推进农业现代化

实施农业企业化，着力发展中小型农业企业，对我国农业现代化乃至整个社会的现代化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充分发挥土地使用权流转的作用。农

村土地通过流转一旦与农业企业结合，就能提高它的使用效率，使土地的集约使用成为实现，更好地发挥它对农业生产的作用。第二，有助于发挥企业对农业生产的优势，形成规模优势，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益，适应市场经济的形势。第三，有助于实施规范化生产，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和品质，有助于生产名牌产品。第四，有助于农业科技的应用，农业机械的使用，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力。一旦农业企业建立，农业的发展将从主要依靠扩大面积求增长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促发展的新阶段转变，农业的增长方式也将发生重大转变，与人口、环境的矛盾将相应缓和。第五，有利于对农业生产的管理，有助于农产品的质量和安全监管，提高生产过程的安全性，提高农产品的安全和卫生标准，有助于绿色食品的生产和流通。第六，有助于国家支持农业的各项政策落实到位，提高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水平和实效。总之，实施农业企业化工程，将大大提高我国农业的现代化水平，大大提高我国社会现代化服务的水平，这对于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民公民化、农村城镇化，从而更科学有效地解决“三农”问题，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具有长远而巨大的意义。

在实施农业企业化过程中要拟订规划，为农业企业化工程提供实施的总目标、要求和步骤。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就农业企业化的总目标、要求和步骤作出决定，为具体实施这项工作提供决策依据。要制订农业企业化标准和配套政策措施，明确具体要求、界限和奖励措施。决定作出后，组织人员就农业企业的规范制订具体标准。为保证工作的顺利开展，必须制定相应的政策，明确界限，并采取措施鼓励农业企业化工作。要制定实施计划，有领导地开展农业企业化工作。根据条件和可能，制定具体实施计划，先试点后推广，先易后难，有领导地开展农业企业化工作。一旦农业企业化工作顺利开展，那么必将转变我国农业的增长方式，必将让中国农业真正走上依靠内部增长动力的持续发展之路，使农业企业化工作真正成为推动农业现代化的有效举措、方法和途径，中国农业发展必将上一个新台阶，必将开创农业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并对我国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积极而深远的意义，保证现代化建设稳定、健康、快速地发展，真正实现科学发展和“三步走”目标。

实事求是地对待市县志书的篇幅问题①

——以《绍兴县志》《海盐县志稿》等为例

□ 颜越虎

摘　要：市县志书的篇幅是修志的热点和棘手问题。一味笼统地提控制志书篇幅会给强化志书的资料性，提高志书的使用价值，巩固志书的独特地位等方面带来负面的影响。要实事求是看待篇幅较长和篇幅较短市县志书的得失，实事求是看待市县志书编纂者在处理志书资料性与篇幅关系方面所做的努力，实事求是看待志书篇幅与志书利用的关系，实事求是地处理好市县志书的篇幅，让市县方志编纂者积极主动地处理好篇幅问题，编纂出以足够篇幅保证志书资料性的高质量的地方志书。

关键词：市县志书；篇幅；资料性；实事求是；编纂

自首轮修志以来，市县志书的篇幅问题一直是方志界的热门话题之一，也是许多地方志工作者尤其是市县志书的主编们面临的棘手问题之一。毫无疑问，认为市县志书篇幅过大，应该大力控制志书篇幅的观点占绝对优势。其实，笔者认为这个问题远没有这么简单，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味笼统地提控制志书篇幅会给强化志书的资料性，提高志书的使用价值，巩固志书的独特地位等方面带来负面的影响。邓小平同志指出："实事求是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②实事求是同样应当成为我们对待市县志书的篇幅问题的准则。

一、实事求是看待篇幅较长和篇幅较短市县志书的得失

在许多人的脑子里，篇幅短的志书就是优秀的志书，篇幅长的志书就相对次之。而实际上情况往往不是这样。

①在本文撰写过程中，绍兴县史志办公室、海盐县史志办公室以及梅森、颜小忠、梁建楼、傅振照、郁惠祥、施国庆、马建中、王建飞、姚虎良、林志龙、钱永兴等先生和王卫明女士给予诸多指导与帮助，谨此致谢。

②邓小平：《坚持党的路线　改进工作方法》，《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78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我们不妨来看两部篇幅差距很大的首轮市县志书。谈到这个问题，就会牵涉到对首轮修志的总结问题。笔者觉得如果要总结首轮修志教训的话，设置许多禁区无疑是最值得反思的教训之一，而篇幅上的规定当是其中的一个。

1985年7月15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印发了《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该《规定》要求，“在一般情况下，县志以控制在三十万至五十万左右为宜，市志控制在一二百万至四五百万左右为宜，省志字数最好控制在一千万字以内。”[①]这是最早的有关志书篇幅的官方权威意见。在该《规定》的指导下，出现了一批如《象山县志》这样篇幅较短的志书。《象山县志》分为6个部分，50章，书末设附录。全志57万字，1988年4月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方志学家傅振伦先生在该志序言中说道：《象山县志》“横排纵写，凡六门，五十章，章统节，节驭目，时经事纬，各有条贯。以文为主，穿插图表，文省便览。……允称完善之作。”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原秘书长郦家驹在1990年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也指出：“《象山县志》相当精炼”，“极有特色”。[②]《象山县志》于1993年获浙江省地方志优秀成果一等奖。

应当说，像《象山县志》这样当时被认为“完善之作”的志书，其实存在着很大的不足，主要表现在资料性的不足上。《地方志工作条例》指出：“地方志书，是指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③]可见，资料性是地方志的第一属性。志书的资料需要广泛收集，需要认真考订，也需要精心提炼。就资料与志书篇幅的关系而言，虽然篇幅与资料性并不一定能划等号，但资料性需要一定的篇幅来保证则是不言而喻的。《象山县志》主编林志龙先生曾不止一次和笔者谈起首轮《象山县志》的遗憾，他觉得最大的遗憾就是篇幅太短，导致志书的资料性不足。《象山县志》原稿有200多万字，定稿时根据有关规定，删节到50万字左右。林志龙先生形象地比如其整个过程就像是丰满鲜活的血肉被一一削去抽干，最后只剩下一副骨架。这样的志书其资料性的不足可想而知。

另一部志书就是《绍兴县志》。上世纪90年代初，《绍兴县志》启动编纂时，主编傅振照先生对志书的篇幅也心存疑虑，难以把握。为此，特地向著名历史地理学家、《绍兴县志》顾问陈桥驿先生请教如何确定《绍兴县志》的篇幅。陈桥驿先生认为，绍兴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经济繁荣，可以入志的内容很多，修《绍兴县志》，有多少内容就确定多大篇幅，不必拘泥于“三十万至五十万左右”的框框。这是一颗“定心丸”。后来的事实证明，陈桥驿先生的这一关于志书篇幅确定的指导思想是非常正确的，对强化《绍兴县志》的资料性，保证《绍兴县志》的质量起到了关键性的引导作用。《绍兴县志》分4册，42编，书末设索引，共409万

①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编《地方志工作文献》，第71页，方志出版社2009年版。
②林志龙：《方志体例回眸》，《学诚斋集》，第255页，2005年内部印行。
③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编《地方志工作文献》，第3页。

字，1999年5月由中华书局出版。《绍兴县志》被公认为代表首轮修志水平的优秀志书之一，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它的资料性。魏桥先生在该志序言中说道："资料是志书的基础，志书的价值在于是否有全面、系统、翔实的资料，尤其可贵的是能够核实、订正人们忽视的一些差错和占有珍贵的独家资料。……鉴于此，《绍兴县志》在资料工作上狠下功夫，花了许多时间大量收录、精心选择古今各类资料，为全书打下了厚实的基础。"400多万字的《绍兴县志》，是首轮修志中篇幅最大的县级志书之一，也是以足够篇幅保证志书资料性的一个成功范例。可以设想，假如《绍兴县志》也是50万字左右，那么，二三百万字的可贵资料，也就会像林志龙先生所形容的那样，"丰满鲜活的的血肉被一一削去抽干，最后只剩下一副骨架"，哪里还谈得上什么资料性，谈得上什么精品佳志。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问题，我们不妨选择两部志书中有关医疗卫生部分列表作一比较。

象山县志				绍兴县志				
内容			文字量	内容				文字量
医疗				卫生机构（有小序190字）	医院机构	施医局药局	公济药局	114
							同义施医局	76
							公义中西医局	76
							和济药局	76
							仁济药局	76
							绍兴县临时治疗时症中西医施诊局	114
							绍兴卫生牛痘施种局	76
							同善施医局	152
							凌霄社施医局	266
							仁寿施医社	76
	主要医院	县第一人民医院	341			综合性医院	绍兴县第二医院	874
		县第二人民医院	186				绍兴县卫生院	380
		县中医院	217				绍兴县人民卫生院	152
							绍兴县第一医院	418
							绍兴县第四医院	798
							绍兴市（县）第五人民医院	228
						专科医院	绍兴市（县）中医院	195
							绍兴市（县）传染病医院	266
							绍兴妇幼保健院	228
							绍兴市精神病教养院	190
							绍兴县第三医院	418
						卫生院（所）		722
						保健站		760
						私人医院诊所		646
						部门医院医务室		456
					卫生保健机构	绍兴县妇幼保健所		228
						绍兴县卫生防疫站		342
						绍兴县职工保健院		190

象山县志			绍兴县志				
内　容		文字量	内　容				文字量
医疗			卫生机构（有小序190字）	医学教育及科技情报机构	绍兴卫生学校		190
					绍兴县卫生进修学校		418
					绍兴县医药卫生科技情报站		266
				其他机构	绍兴县急救站		114
					绍兴县城关镇环卫站		152
					若干年份卫生机构、床位数（表）		912
					若干年份各类卫生技术人员（表）		772
	医疗设备	620			卫生部门所属机构主要医疗仪器(表)		950
	中　医	620	医疗事业（有小序76字）	中医	发展源流		1824
					理论研究		2204
					专科世家	石门槛钱氏女科	456
						下方寺“三六九”伤科	532
						胡氏伤寒专科	380
						顾氏伤科	380
						傅氏内科	266
						马氏外科	266
	西　医	572		西医	传入与发展		722
	医疗技术	775			医疗技术（有小序342字）	内　科	532
						外　科	418
						妇产科	266
						儿　科	152
						五官科	304
						口腔科	266
						传染病科	228
						灼伤科	228
						骨　科	190
						放射科	304
						检验科	380
						特检科	532
						理疗科	152
						其他科室	380
					护　理		798
医疗	中西医结合	248	医疗事业	中西医结合			1102
	医疗制度	589		医疗制度	公费医疗（含表）		1330
					劳保医疗		342
					合作医疗		342
				医学科研			988
卫生防疫	公共卫生、饮水卫生、食品卫生	1395	（有小序76字）预防保健	公共卫生（有小序190字）	环境卫生（有小序342字）	农村水改	608
						管粪改厕	456
						监督检测	456
					食品卫生		912
					劳动卫生		912
					学校卫生		798
					健康教育		646

象山县志			绍兴县志				
内　容		文字量	内　容				文字量
卫生防疫	疾病防治	738	预防保健（有小序76字）	疾病防治	传染病（有小序608字）	霍　乱	266
						麻　疹	228
						疟　疾	228
						钩端螺旋体病	190
						病毒性肝炎	418
						肺结核病	380
						麻风病	418
	地方病防治	496			地方病（有小序266字）	吸血虫病	1368
						丝虫病	266
						肺吸虫病	760
						姜片虫病	418
						碘缺乏病	190
妇幼保健	新法接生	310		妇幼保健	接　生		760
	妇女保健	186			妇女保健	婚前健康检查	342
						围产期保健	456
						妇女劳动保护	456
						妇女病防治	418
	儿童保健	217			儿童保健		646
				人口死因（有小序76字）	死因顺产		456
					死因分析		380
					人均期望寿命		114
	机构设施	310					
医药	中草药材	341	药材药品（有小序114字）	药材资源	野　生		342
					种　植		760
	药品生产	217		药品生产	药店制药		228
					药厂制药		456
					医院制剂		418
	药政管理	93		药政管理	药品质量管理		798
					麻醉(毒、剧)药品管理		
	药　店	465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两志文字量上的悬殊差异。再摘录上述内容中的几条来作一比较，分析两部志书的资料性。

“外科”条：

《象山县志》第553页记载：“外科，能做肝、胆、胃、肠、甲状腺、颅脑、泌尿及骨科等手术。”

《绍兴县志》第1701页记载：“外科　民国元年（1912），绍兴基督教医院始设外科，并施行下腹部手术。七年，绍兴病院首次施行截肢手术。30年代，绍兴福康医院创设手术室，时称割症室，对3例脓胸患者施行胸廓成形术。40年代，施行胃肠吻合术及膈神经压榨术。建国后，先后施行胃次全切除术、十二指肠总胆管吻合术、胰腺癌根除术成功。1954年，第二医院首次应用赛璐珞球（乒乓球）胸膜外或骨膜

外填充治疗肺结核、肺切除治疗肺肿瘤。1959年，该院施行左肝切除术，应用瓣膜扩张器进行心脏二尖瓣分离手术及在低温麻醉下血管吻合术治疗法乐氏四联症。1962年，设肿瘤专科及肿瘤病房。1966年，设泌尿外科。80年代起，应用MTC—1型微波施用器治疗肝癌，开展门脉高压H搭桥术、常温下血流阻断右半肝规则切除术、直肠癌腹骶手术保留肛门括约肌术、股血管自体血管移植修复术等。1990年后，先后施行先天性心脏病（室缺）体外循环直视手术、巨大脑膜瘤摘除、左肾上腺皮质瘤根治术及脑外科手术。”

前者仅29字（含标点符号，下同），后者410字。什么时候设立外科？什么时候开始能做什么手术？哪家医院能做这些手术？这些手术包括哪些具体项目？等等，从前者的记述中读者无从知晓，因为信息量很小，资料性很弱；从后者的记述中则可以了解得比较清楚，因为它的信息量较大，资料性较强。

“中医”条的差距更大：

“中医，能诊治内科、儿科、妇科疾病，进行推拿、按摩、针灸等。”这是《象山县志》第553页中的记述，共29字。问题同前。

《绍兴县志》中对“中医”的记述达6300字[①]，中医在绍兴的发展源流、绍兴的中医理论研究、绍兴的中医专科世家等情况记载得十分详尽，资料性很强。

当然，笔者以《绍兴县志》为例来加以阐述，并不是说《绍兴县志》尽善尽美，但该志的成就的确能够说明一些问题。

其实，以足够篇幅保证志书资料性的情况以往也不鲜见。最著名的当属民国《鄞县通志》。该志由张传保、赵家荪修，陈训正、马瀛纂，于民国22年（1933）创修，26年纂成。全书在1951年印制完成。共36册，51编，分为舆地、政教、博物、文献、食货、工程等6志，并附地图一函，计26幅。全志（不计地图）约550万字。陈桥驿先生曾指出：“此志不仅篇幅浩大，资料完备，而且内容新颖，称得上是地方志步入现代科学的嚆矢。”[②]《鄞县通志》之所以在国内外获得好评，主要在于它的资料性，它拥有极其详实可靠的资料。该志在北美、日本等地极受推崇，如美国著名汉学家施坚雅就“认为他在斯坦福大学建立宁绍研究室，除了这个地区在中国的重要性以外，十分有利的条件是这里的雄厚资料基础，而其中特别令他鼓舞的是民国《鄞县通志》。他认为这是中国地方志中的杰作，使他大大增加了对宁波近代城市发展及其进行深入研究的兴趣和信心。”[③]又如日本著名汉

①参见《绍兴县志》，第1695～1699页，中华书局1999年版。
②陈桥驿：《民国〈鄞县通志〉与国外汉学家的研究》，《陈桥驿方志论集》，第243页，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③陈桥驿：《民国〈鄞县通志〉与国外汉学家的研究》，《陈桥驿方志论集》，第245页，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学家斯波义信在他的巨著《宋代江南经济史之研究》一书的后编《宁绍亚地域之经济景况》中，特别设立《宋以后之宁波》一章，其中论述宁波的经济概况、都市组织、职业组织与文化、都市不动产、课税与管理、宗教与都市生活、以宁波为核心的商业组织等节下，从该文文后注释中频频引用的《鄞县通志》，该志的价值就令人肃然起敬[①]。他们之所以认为“这样的方志才能使研究者左右逢源，才具有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②]，就是因为《鄞县通志》极强的资料性。

回过头来看首轮县级志书，没有一部篇幅超过《鄞县通志》，而《鄞县通志》作为在国内外最受推崇的志书之一，尽管它长达550多万字，但人们丝毫不认为它篇幅过长，正是它500多万字的篇幅容纳了大量的可贵资料，才使得的它成为一代名志。既然民国时期的县志可以达到500多万字的篇幅，那么，今天我们编纂县级志书也完全可以达甚至超过到这样的篇幅，关键就看有没有资料性。

从上述志书编纂的实践及其经验、教训中可以看出，一味强调大力控制志书篇幅的观点是有失偏颇的，以足够篇幅保证志书资料性的观点必须得到应有的尊重，并应当在实践中得到合理运用。

二、实事求是看待市县志书编纂者在处理志书资料性与篇幅关系方面所做的努力[③]

由于工作的关系，笔者一直比较关注《海盐县志（1986～2005）》的编纂工作，而海盐县史志办公室在2007年被定为浙江省二轮修志创优工程试点单位之一，2010年又被确定为全国第19家二轮修志工作试点单位。因此，以《海盐县志（1986～2005）》的编纂为例，来探讨实事求是看待市县志书编纂者在处理志书资料性与篇幅关系方面所做的努力这个问题，应该是具有典型意义的。

《海盐县志（1986～2005）》志稿经过反复修改，其终审稿设置专志49卷，志首设总述和大事记，志末设附录，总字数约278万字。专志采用暗分部类的办法，分为6个部分。第一部分环境部类，共10卷（第一至第十卷）：政区，人口，自然环境，杭州湾与钱塘江，土地管理，环境保护，城乡建设，交通，水利，邮政、电信。第二部分经济部类，共13卷（第十一至第二十三卷）：经济总情，步鑫生与海盐衬衫总厂改革，农业，工业，秦山核电，经济园区，建筑业、房地产业，商业，对外

①参见陈桥驿：《民国〈鄞县通志〉与国外汉学家的研究》，《陈桥驿方志论集》，第245～246页，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②陈桥驿：《民国〈鄞县通志〉与国外汉学家的研究》，《陈桥驿方志论集》，第245页，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③本部分内容参考、引用了海盐县史志办公室提供的《以二轮修志试点为契机，扎实推进〈海盐县志（1986～2005）〉编纂工作》一文和马建中、王健飞、姚虎良等先生提供的有关资料，特此说明并向上述单位和个人鸣致谢。

经济、区域合作，旅游业，金融业，财政、税务，经济综合管理。第三部分政治部类，共11卷（第二十四至第三十四卷）：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地方人民政府，政治协商会议地方组织，民主党派、工商联，群众团体，军事，公安，检察，审判，司法行政。第四部分文化部类，共6卷（第三十五至第四十卷）：教育，科学技术，文化，历史文化遗产，医疗卫生，体育。第五部分社会部类，共8卷（第四十一至四十八卷）：民政，人事，劳动与社会保障，精神文明创建，居民生活，风俗、宗教、语言，人物，艺文。第六部分各镇概况，共1卷，即第四十九卷。最后为附录。

在修志过程中，海盐县史志办公室十分注重志书的资料性，强调对有存史价值的资料搜集齐全，记述厚实。一是事物的基本要素力求记完整；二是宏观性要项内容、重点资料多作保存，如经济部类中凡反映一地宏观整体经济、区域经济和产业经济内容的资料尽量努力收集齐全；三是有时代、地方、专业特色的事物尽可能浓墨重彩；四是基本统计数据尽可能20年不缺，并在主要统计表格后注明资料出处和统计口径，以保证资料的存史价值和使用价值。特别值得肯定的是，为了强化志书的资料性，海盐县史志办公室非常注重做好资料长编，这既是提高资料的可信度、保证志书质量的一个有效举措，也是众多修志单位有意无意忽视的一个问题。众所周知，资料长编是把征集、搜集上来的原始资料经过筛选归类、考证核实后，按志书篇目的要求，以时间为顺序进行编排的一种资料形式。它既是志书编纂的基础、考证的依据，又是比志书更全面、更具原始性和资料性的完整的资料汇辑。在二轮修志过程中，海盐县史志办公室要求各单位按规定编辑资料长编。事实证明，只要是资料长编编辑到位，这些单位不仅修志进度较快，而且初稿质量较高。即使后期有的篇目进行了较大调整，资料也基本够用。相反，资料长编编辑不到位的单位，往往需要经过多次反复，不仅费时费力，而且质量不高，遗漏较多。一旦篇目有所调整，工作量就更大。由此可见，在修志工作中，必须抓好资料长编的编辑工作，只有这样才能为强化志书的资料性、提高志书质量打好坚实基础。

面对在高质量资料长编基础上编写而成的初稿，海盐县史志办公室建立了由上一轮《海盐县志》正、副主编和修志骨干组成的评稿组，对经过编辑修改后形成的志稿逐卷进行内部评审，反复删削字数，锤炼打磨文字，以提高志稿的质量。在此基础上，形成370.53万字（系不含随文照片的纯文字量）的初审稿。初审之后，根据专家的意见进行修改，形成319万字的复审稿（系不含随文照片的纯文字量）。复审之后，又作了较大的缩减修改，形成278万字的终审稿（系含随文照片所占版面文字量）。如第十三编“农业”，初审稿中有15万余字，共9章44节，其中对水稻、油菜、棉花等作物均设节记述，下设“品种”、“栽培技术”、“施肥技术”、“病虫害防治”、“规模经营”等

条目，写得过细，既占篇幅，又没有较强的地方特色。在修改形成复审稿时，海盐县史志办编辑人员对该编做了较大规模压缩，水稻、油菜、棉花等由节降为目，水稻种植区具有共性的内容，记述时只点到为此，文字量压缩了近一半；其次是对不同编的同一内容记述采取详略互见等等办法，在略写处注明详见处，有的甚至删节，如农民负担，初审稿中单设一节记载，而在第十一编“经济总情”中也有记述，内容相近，修改时，把两处内容合到一处，第十三编中删去了农民负担一节；初审稿中“农业服务机构”设两个目，对各县级农技机构一一作介绍，有2000多字，而同一内容在第三十六编“科学技术”中也有涉及，考虑各编相对平衡，在第十三编中的“农业服务机构”中只作概括介绍，文字量约为原来的五分之一，其中一目“县级机构”修改后为：

“1986年，有县级农技机构15个，农技人员101人。1988年2月，设立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2005年县级农技机构有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简称县农技推广中心）、县畜牧兽医站、县蚕桑管理站、县水产技术推广站、县林果特产技术推广站（简称县林特站）、县农机监理站、县农业合作经济经营站（简称县农经站）和县农业机械化技术学校等8个农经局事业站，共有农技人员101人。另有县良种场、县蚕种场2个县属农技服务事业单位，共有农技人员13人。全县114名农技人员中，有高级职称16人，中级职称43人；有大学本科学历49人，大学专科29人，中等专科33人；列入海盐县第五批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业人才5人。”

至形成复审稿，第十三编“农业”压缩至9章35节，9.4万字。

从初审稿到终审稿，志稿文字量减少了100多万，这中间包含了海盐县史志办公室编纂人员大量辛勤的劳动，也体现了他们在处理志书资料性与篇幅关系方面所体现出来的正确理念。可以说，编纂者们每删一字，都在为既减少志书篇幅，又突出志书资料性而煞费苦心，都在为提高志书的质量呕心沥血。这样的努力不应当被忽视、被抹杀。一味笼统地提大力控制志书篇幅的说法似乎在在向人们表明，志书篇幅应当控制而没有得到控制，是地方志编纂者没有花应有的功夫。从《海盐县志（1986～2005）》的编纂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广大市县志书的编纂者为此进行着不懈的努力。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地予以评价和肯定。

三、实事求是看待志书篇幅与志书利用的关系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志书篇幅加大，固然可以增大志书储存的信息量，但却妨碍了志书的阅读使用，试想一下，各级领导同志，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中，如何挤时间去卒读一部数以千万字计的地情鸿篇巨著?”[①]有的还举出了实例，“广西某地级市一位新上任的市

①陈泽泓：《控制篇幅与续志创新的思考》，《中国地方志》2001年第5期。

长，为了尽快了解该市的历史概况，便找市志来看，而市志篇幅太长，近200万字，一时看不过来，就请市地方志办公室把市志中记述的主要地情浓缩成4万字～5万字，以便阅读、掌握要情。”①

这牵涉到志书篇幅与志书利用的关系问题。修志为用这是地方志编纂的根本目的，但怎么用却是很有讲究的。我们知道一部方志，极少会有读者从头至尾去“卒读”，一般情况下，人们都是根据自己的需要，阅读其中的某些部分，查找有关资料。其实这又回到了前面的问题，即志书的资料性问题。而像施坚雅、斯波义信等人，作为中国地方志的大用户，即使如《鄞县通志》这样的大部头志书，也会反复查阅，甚至反复“卒读”，只要资料性强，志书的篇幅再大，也丝毫不会影响其阅读和使用的兴趣。至于领导干部阅读志书，他也是普通读者，关注的也应该是志书的内容，只要真正是工作需要，他也一定会挤时间去看、去查，而不会在乎志书篇幅的长短。

四、实事求是地处理好市县志书的篇幅

王铸人在《论说书籍篇幅的长与短》中指出：“人们著书立说，作诗撰文，应当根据内容的需要，宜长则长，宜短则短，这是顺理成章的。图书和文章不是越长越好，当然也不是越短越好。”②

志书也一样，不同的市县可记的内容多寡不一，志书篇幅的长短不同，这是很正常的。所以，如果再规定整齐划一的字数，那会显得非常不切实际（据笔者了解，在第二轮修志中，一些省仍然对市县志提出了一刀切的文字量规定或要求，可以说，这是一种带有唯心主义色彩的要求）；而一味笼统地强调大力控制志书篇幅，也会在很大程度上束缚志书编纂者尤其是主编们的手脚，导致志书的资料性不强，留下新的“林志龙式的遗憾”。

在论述志书篇幅的一些文章中，常常有人提及胡乔木同志要求编志书应像打电报一样，以此作为重要的论据，其实这是断章取义、“为我所用”的引用，没有全面反映胡乔木的有关要求。胡乔木曾经指出：“地方志的价值，在于它提供科学的资料。在这个范围内，应该要求地方志做到一句也不多，一句也不少。如果说不能做到后一点，至少要做到前一点。”③“第三点意见，就是地方志的分量。我想，地方志应做到详细，同时也应做到简略。所谓详细，指它所应讲到的方面都讲了；所谓简略，就是指每个方面的说明要像打电报、编辞书那样的精炼，要惜墨如金。作为一部实用性的文献，不能分量太大，分量太大引起种种不便，这是一种希望，一

①蓝日基：《突出重点内容　严格控制篇幅》，《广西地方志》2011年第5期。
②王铸人：《论说书籍篇幅的长与短》，《编辑之友》1992年第5期。
③胡乔木：《在第一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编《地方志工作文选》，第120页。

种既不容易达到而又必须达到的奋斗目标。”[①]从上面这两段话中可以看到，胡乔木首先强调的是志书要“提供科学的资料”，然后要求“在这个范围内”（指在“提供科学的资料”的前提下）考虑志书的篇幅；在篇幅与资料性的关系上，他更强调的是“多”，而不是“少”，特别要求在做不到“多”（即“一句也不少”）的情况下，至少做到“少”（即“一句也不多”）；他首先要求“详细”，然后要求“简略”，这仍然是在强调志书的资料性；他并不笼统地要求志书篇幅不能大，当然，他强调志书的分量（篇幅）不能“太大”。如果志书能做到既有很强的资料性，又篇幅适当（即把握好度，不至于分量“太大”），那是最理想的。

说到底，志书的篇幅仅仅是一个表象问题，表象背后的实质是一个资料性问题。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离开了资料性，或者说丧失了资料性，志书再简短，也是没有意义的。如韩邦靖编纂的《朝邑县志》文采焕然，被收入《四库全书》，是明代方志“尚简派”代表作之一，但全志不到6000字，内容极其单薄。且不论其资料的可靠性，仅从记述的角度上讲，《朝邑县志》失之太简，“这样的志书又有何价值呢？这样的‘简’又有何可称颂之处呢？”[②]。这样的志书肯定不是我们所要追求和推崇的。反之，如果资料有价值，一部县志500万字也不嫌多，民国《鄞县通志》就是最好的明证。

我们应当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放手让市县方志编纂者积极主动地处理好篇幅问题，使之不再困扰他们的思想，束缚他们的手脚，从而让他们编纂出以足够篇幅保证志书资料性的高质量的地方志书。

①胡乔木：《在第一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编《地方志工作文选》，第121页。
②习方圆：《〈武功县志〉与〈朝邑县志〉述评》，《陕西史志》2004年第1期。



“王阳明在绍兴”考释

□ 钱茂竹

摘要：文章立足于王阳明在绍兴的重要史迹，着重围绕“世居山阴”、“王氏墓地”、“新建伯府”、“阳民洞天”、“书院讲习”等史迹的兴衰变迁，勾勒了王阳明与绍兴密不可分的关系，在考释的同时牵涉了一些历史人物与之在绍兴史迹的联系，从而揭示了绍兴地域对王阳明哲学的形成、发展以及对后世影响的作用。

王阳明，明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清代学者邵廷采称他是“一代安国家、定社櫻元臣”，“气象类孟子、明道，而出处建功之迹近于伊尹。”（《明儒王子阳明先生传》）在人文荟萃的绍兴历史上，他是一位杰出的先哲与乡贤。

王阳明在世57年，10岁以前住出生地余姚，10岁时随父王华举家迁回山阴（今绍兴）。在57年的生涯中，他的足迹几遍南方各省，但有十四五年时间却全在家乡山阴度过。绍兴成为他事业的起点，学问的顶点，也成为他安身长眠之地。现将王阳明绍兴史迹考释如下。

一、“世居山阴”考释

王阳明，名守仁，字伯安，1472年生于余姚龙泉山瑞云楼。一般人包括《明史》本传在内，只知道他为余姚人，殊不知他的本籍在山阴，他的祖先和他本人长期留居山阴。对于王阳明世居山阴，地方文献有明确的记载。王守仁，“本山阴人，迁居余姚后，仍还原籍”（嘉庆《山阴县志卷首·皇言》）。“本籍山阴，迁居余姚，后复还山阴。”（嘉庆《山阴县志卷14·乡贤》）“先生世居山阴，后徙姚江，其居里旧有专祠以奉。”（嘉庆（山阴县志卷21·坛庙））那么这个“居里”与“专祠”在哪里呢？

（一）东光坊旧居。《王阳明全集·年谱》述王华中状元后，“常思山阴水佳丽，又为先世故居，复自姚徙越城之光相坊居之。”嘉庆《山阴县志卷首·皇言》亦云：“其故居在山阴东光坊谢公桥之后，祠亦在焉。”明刻本《王阳明先

生全集》附录：其父王华“中了状元，恋鉴湖山水，归还本籍，定居于东光坊光相桥侧畔。”为何称“复还山阴”、“归还本籍”？原来王阳明祖上世居之地就在山阴。《年谱》云：王阳明先祖为王羲之，自琅琊迁至山阴定居。晚年虽移居剡溪金庭山，但其子王徽之、献之等均在山阴长居不变。据傅振照和邵九华先生在《王阳明先世和后裔考略》文中引明刻本《王阳明先生全集·附录》所载《王氏家谱》称：王阳明曾祖因避祸迁居余姚，“二世而返（山阴）故居”。曾祖为高祖之误。因王阳明高祖王与准在永乐年间举遗逸不起而“遁”，“遁”到余姚避祸，故号遁石翁。所谓“二世”即经历曾祖槐里子、祖父竹轩公两代，至父亲王华时而“复还山阴”。又，还本籍时，竹轩公犹在，故从高祖“遁石翁”起到祖父竹轩公亦可称“二世而返”。山阴东光坊本为王阳明祖上世居之地，故言“本籍”。今考，光相桥与谢公桥均在，东光坊应在今下大路一带，即光相桥以东，谢公桥之后，具体见“新建伯祠”考。

（二）新建伯祠、阳明先生祠、王文成祠。清乾隆时悔堂老人《越中杂识》：“王文成祠在府治北二里。”嘉庆《山阴县志卷21·坛庙》：“王文成祠在府北二里东光坊。”查嘉庆《山阴县志·今城分治图》内有“王阳明祠”，其东为小能仁寺、药王庙，西为至大寺、越王庙、光相寺。在今环城北路南侧，即下大路又查光绪壬辰（1892）绘制《绍兴府城衙路图》载有“王文成公祠”地点在光相桥越王祠以东，其旁为徐公祠和关帝庙。图上明确标示，此为“大路下岸”。至此，王阳明旧居和王文成祠的具体地址为今下大路西段、光相桥以东无疑。

王阳明旧居与专祠的变化情况较为复杂。先是，王阳明50岁时即正德十六年（1521）十月二日，因平定江西反贼功绩卓著，朝廷封王阳明为新建伯，光禄大夫柱国，兵部尚书。但当王阳明死时，权臣进谗，这一封号被剥夺了。《年谱》云：“是时朝中有异议，爵荫赠谥诸典不行，且下诏禁伪学。”《明史》本传云：“帝及下诏停世袭，恤典俱不行。”邵廷采《明儒王阳明先生传》：“下公卿议，停恤典、世袭，诏禁伪学。”当时没有纪念他的专祠。过了近10年，到嘉靖十六年（1537）御史周汝员临绍，根据学子士人的要求，才在府北二里东光坊王阳明里居建祠，并取名为新建伯祠。《年谱附录一》：“十六年丁酉十月，门人周汝员建新建伯祠于越。是年汝员以御史按浙。先是师在越，四方同门来游者日众，能仁、光相、至大、天妃各寺院，居不能容。……师殁后，同门相继来居，依依不忍去。是年，汝员与知府汤绍恩拓地建祠于楼前。取南康蔡世新肖师像，每年春秋二仲月，郡守率有司主行时祀。”从这里说明这个新建伯祠的建立，还与当时绍兴知府、三江闸的营造者汤绍恩有极大的关系；也说明这个祠与原旧居是同一个地点，只不过在旧居楼前拓地建祠，以让门人瞻仰，有司祭祀。王阳明的冤案要到40年后即穆宗接位后（1567年），才得以平反改正。“隆庆初，廷臣多颂其功，诏赠新建候，谥文成。二年予世

袭伯爵。”（《明史》本传）“隆庆初，始赠新建侯，谥文成，赐葬祭。”（邵廷采：《明儒王子阳明先生传》）那末此时周汝员何以建“新建伯祠”以祀王守仁呢？原来，当王阳明50岁被晋封为新建伯时，圣旨内述：“三代并妻一体追封，给与诰卷，子子孙孙承袭。”（《年谱》）于是在次年即嘉靖元年（1522）二月十二日，父华70岁时，“朝廷推论征藩之功，进封翁及竹轩、槐里公，俱为新建伯。”翁即海日翁，阳明父王华，竹轩名天叙为阳明祖父，槐里名世杰为阳明曾祖，“自槐里子以下，两世皆赠嘉议大夫，礼部右侍郎，追赠新建伯”（《年谱》），所以周汝员建的这个“新建伯祠”，可说是一祠四人，四代人俱为新建伯，虽然当时王阳明还未平反，但建祠以祀之是可以的，既可避免权奸染指，又可满足门人与学子的要求，甚为巧妙而得体。

由于东光坊是王阳明家世居之地，所以后来的地方官员对此处加倍重视，多次修葺，成为明清时代绍兴的重要胜迹景点，并根据当权者对阳明学说的认识程度多次更改名称。还在嘉靖三十一年（1552），提学使薛应旗视学绍兴，他仰慕王阳明，自称“后学”，晋谒新建伯祠。“因思先生所以振起乎俗学，著存乎人心”，“辟思路之榛芜，阐吾道之精一，真有继往开来之德，不止勤事捍患之功”，故“会先生及门之士议易今额，直书曰阳明先生祠”。这是从阳明学说的地位来取名改名的，而不专在平叛捍患建功完勋这一角度取祠名。当时绍兴知府梅守德即改“新建伯祠”为“阳明先生祠“。从此，东光坊王阳明世居之地才成为王阳明之专祠。特别到隆庆元年诏赠新建候，谥文成，明年复伯爵，认为王守仁“具文武之全才、闻圣贤之绝学”，“伟节奇勋”、“竭忠尽瘁”，“身频危而志愈壮，道处困而弥深”，“绍尧、孔之心传，微言式阐；倡周、程之道术，来学攸宗”（《年谱附录一》），把王学推为道学之正宗，并让王阳明从祀文庙，“终明之世，从祀者止守仁等四人”（《明史》本传）。隆庆二年（1568）王阳明“子正亿得嗣伯爵”，“正亿卒，子承勋嗣，承嗣卒，子先道嗣”（邵廷采：《明儒王子阳明先生传》。子孙繁衍，勋爵世袭，祀祠不绝。至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绍兴知府李铎大加修理，并改“阳明先生祠”为“王文成祠”，用王的谥号，更示高山仰止之情，还规定“有司春秋动地丁致祭”。他又请了当时名士马如龙撰碑文。马如龙，字见五，陕西绥德人，康熙二十四年（1685）为杭州知府。马如龙《王阳明祠碑记》曰：“先生世居山阴，后徙姚江，其里居旧有专祠以奉烝，尝岁久陟剥不治。太守李君崇尚文教，倡率僚属、士绅重修建，庙貌聿新，祀典孔肃，属余勒石以纪之。”（嘉庆《山阴县志卷21·坛庙附》）

从新建伯祠到阳明先生祠到王文成祠，名称改易，其地如一，历代修葺，史不绝传。在明代万历年间有一次较大的修理，绍兴著名学者陶望龄（1562～1609）还写有《重修阳明先生祠碑记》，文中论述先生祠堂“肇建于嘉靖十六年，时御史周公汝员实成之”。“岁既

久，像设榱桷，丹青弗严，阶城陵夷，垣圮庭秽。御史皖鲁岳方公……鸠工饬新之。当时山阴县令余君出赎金若干两，于是整个祠堂‘夷者圭，败者坚，黯者涣’，登先生堂，为之改观易虑”（《歇庵集》卷6，转引自《全集》卷40）。在工程完竣之日，适巡抚都御史甘紫亭视师海上，道越，“乃用牲于祠，大鸠其郡缙绅文学之士，登坛讲道”。可谓盛况空前，“闻者洒然”。王文成祠最荣耀一次是清乾隆十六年（1751），这年三月，乾隆帝南巡至杭州特转道山阴，谒王文成祠，并题词额曰：“名世真才”。悔堂老人《越中杂志·祠记》曰：“乾隆十六年，翠华南幸，遣左副都御使胡宝泉致祭，御书祠额曰：‘名世真才’。”嘉庆《山阴县志卷首·皇言》亦作如是记载。唯有的记载具体时间为乾隆四十九年（1784）。这是最高统治者对王守仁的最高褒奖。至乾隆五十二年（1787），礼部侍郎、提督学政朱珪，应王守仁九世孙生员昆泰、昆潮之请，又补撰墓表，著名书家梁同书书之，五十七年郡守李亨特勒之石，并作跋语。从王文成祠的变迁中，可以看出历代官府包括皇帝和朝廷重臣在内对王阳明世居之地是相当重视的。

二、“王氏墓地”考释

王阳明“本籍山阴”，“世居山阴”，还可以从其父母和本人墓葬得到证明。我国自古有归葬传统。楚怀王客死于秦而归葬，许多封疆大吏千里扶榇而归葬，诚如屈原《哀郑》中云：“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王阳明父子墓葬亦如此。王华，字德辉，晚称海日翁，成化十七年（1481）赐进士及第第一人，仕至南京吏部尚书，进封新建伯。他为人刚正不阿，清白自守，“学一出于正，书非正不读”，“俭素自持，货利得丧，不屑为意”（杨一清：《海日先生墓志铭》）。当时宦官刘瑾弄权，营营者争趋其门，独有华耿介不往。70岁时，其母尚在，粗衣淡食，百岁而终，华“犹朝夕为童子嬉戏以悦亲，左右扶掖，不忍斯须去侧”（同上），确为“至孝”也。王华死后，葬于山阴。《越中杂识·陵墓》云：“明吏部尚书王华墓，在府城西南十五里二十二都徐山，墓碣勒：‘皇明成化辛丑状元、南京吏部尚书，晋封新建伯龙山府君，暨德配累赠一品夫人郑太君之墓。孝男王守仁同弟守俭、守文、守章奉祀’。”要说明的是，王华夫人郑氏仅41岁先王华36年逝去，原附葬穴湖，已而改殡石泉山，至王华殁，才卜地葬于同穴。其人渊静孝悲，与王华奋发于贫困，以纺绩奉于公母，至王华身贵，犹恭俭不衰。今考，徐山在绍兴市南18里处，为天柱峰背茅山，“乃卜地于天柱峰之阳而葬先生焉”（陆深：《海日先生行状》），为绍兴县兰亭镇徐山。1528年十一月王守仁病死于安南舟中，其时子仅2岁，即由门人王瓒、钱德洪等，根据守仁嘱托“扶徐归越”，“士民远近遮道，哭声振地，如丧考批”（《年谱》）。次年二月丧至越，十一月“葬先生于洪溪”。“洪溪去越城三十里，人兰亭五里，先生所亲择也。”（同上）王守仁“墓在山阴洪溪”。一“新建伯溢文成王守仁墓在兰亭

山”（《浙江通志》），“在府城南二十里花街洪溪”（嘉庆《山阴县志·卷14、卷16乡贤》）。今考，王守仁墓在兰亭洪溪，背靠鲜虾山，坐北朝南，前临洪溪，四周群山环抱，左右两山紧靠墓地，似绍兴民间太师椅情状，两侧山涧平行流至洪溪，水声潺潺，常年不息，人称此处“抖水鲜虾”，为一风水宝地。墓后及两侧山上古木参天，郁郁葱葱，前有良田数丘，景色宜人。王守仁墓与其父华墓仅一个山头，如此相近，示日夕侍候之意。初时，其墓由湛若水作墓志铭。墓分上中下三层，上层为墓主体部分。长眠着王守仁夫妇，中层是拜台，下层较大，曾建有小庐，为亲属和学生守丧之处。据《越中杂识·陵墓》载，明末以后，墓地荒凉。康熙五十四年（1789），郡守俞卿曾作大修，“乾隆五十二年，文成九世孙增生、昆泰、昆潮等，以墓碑岁久无成，请文于学政朱公珪，朱公为补撰墓志铭，侍讲梁公同书书之，郡守铁岭李公亨特，立石并勒跋于墓阴。”但以后墓地长久荒芜，残碑四散。至1981年，绍兴县专门成立王守仁墓修复委员会，日本友人闻讯也出钱资助。今考，重修后的王阳明墓，占地面积1150平方米，保持明代建筑风格。墓区顺山坡而上，分三层，气势雄伟，最上层为墓茔，坐北朝南，圆形石砌，高3米，径10米，其中石壁高1.5米，墓碑上横写“明王守仁先生之墓”。前有祭台，中层及下层均为平台，石刻围栏，且逐层扩大。墓下为兰亭中学。王阳明墓距王羲之兰亭仅5里，距兰亭国家森林公园及度假区亦仅2里，靠西即是绍兴至诸暨汽车道，北可通过市区上杭甬高速公路或沪甬铁路，南可直达诸暨市。

从王阳明与其父王华的墓葬情况，可以进一步证明王阳明“世居山阴”的历史结论。

三、新建伯府考释

山阴东光坊新建伯祠为其父王华和祖上旧居，当然也是他幼年和青少年时的住地，但在绍兴还有一座较大官邸为王阳明居宅，这就是今日绍兴市区北海街道王衙弄21号的故宅，也称伯府。它的来历是：成化十七年王华中了状元后，思山阴系先世故居，即从余姚搬至山阴东光坊王氏旧宅，但旧宅小而旧，故择地新建状元府，地点即在今上大路南，西小河西，吕府之南。这个状元府大约建了5年，较为阔绰。至正德十六年和次年嘉靖元年，王阳明与其父祖相继为新建伯，这时就称为伯府，以后连续7年，王阳明均在越地讲学，对伯府作进一步的扩建。据考，当时伯府周二里百二十步，规模恢宏，建筑考究，梁架均用楠木，为绍兴首府。与它紧毗的是嘉靖年间礼部尚书吕本的府第，吕府是一处建筑群，有十三座厅堂组成，俗称“吕府十三厅”，所有建筑均以封闭院落为单位，布局谨严，洁构合理，至今是我省仅有的两处明代建筑群之一，为省重点文保单位。伯府在吕府之北，由于构建格局更为完善，用料更为上乘，故有“吕府十三厅，不及伯府一个厅”的说法。可惜伯府被焚于太平天国期间，现尚存石牌坊、饮酒亭、王衙池和观象台。据绍兴文管处调查，石牌坊为

王衙弄21号，即今称“王阳明故居”处，原为四柱三间，现存三柱二间、其石门框高3.8米，宽6.6米。现王衙弄19号原系伯府饮酒亭，坐西朝东，共五间，人称“邵王家台门”。在王衙弄与大仓弄之间、饮酒亭之前有王衙池，它是伯府花园中一个池，原名为碧霞池。“府东南侧建有碧霞池，碧霞池一乱天泉，萦缭四壁。”（嘉庆《山阴县志拾零钞》，转引自傅振照《王阳明“天墓证道”新探》）查清末《绍兴府城衙路图》上尚有“碧霞池”标记。现存王衙池已较缩小，尚池长35.2米，宽25米，池西北角还有亭柱遗迹。据长居此处的老年居民回忆，在1958年大办钢铁前，碧霞池上有庭台楼阁，水榭回廊，四周香樟参天，翠柏遮阳。在王衙弄近处，近年将土堆重行修筑，在台上建房数间，成居民游乐之所。从上述遗迹可以看出，当年王阳明与其父并为新建伯后，府第是十分恢宏显赫的，东光坊旧宅是他早年和父母乃至祖上生活的地方，而伯府则是他后来的住处，但都是王阳明“本籍山阴”、“世居山阴”的明证，这是毋庸置疑的。

四、“阳明洞天”考释

据《年谱》称，孝宗弘治十五年(1502)，王阳明“告病归越，筑室阳明洞中，行导引术”。康熙《会稽县志·卷4山川志》亦云：“王文成守仁为刑部主事时，以告归结庐洞侧，默坐三年，了悟心性，今故址犹存。其谪居龙场也，尝名其东洞曰小阳明洞天，以寄思云。”原来，王阳明自10岁随父回迁山阴后，就在山阴故宅和京师攻读经史，以后17岁结婚，21岁乡试中举，22岁会试下第，27岁闻道士谈养生等，都在老家山阴，及到28岁中了进士授刑部云南清吏主事这个闲官，被刘瑾排斥后，就引病归越。到家后，他息交绝游，谢门读书，结庐于会稽山下一僻静处，钻研学问。当时他已“渐悟仙、释二氏之非”；又曾为宋儒格物之学，“取竹格之，沉思其理不得”；既而又“自念辞章艺能不足以通至道，求师友于天下又数不遇”(均见《年谱》)。在“心持惶恐”之中，到阳明洞中默坐慎思，探索出路，终于初步形成了他的心学，即“致良知”、“致知格物”的哲学体系。所以阳明洞与王阳明的思想，王阳明的一生事业有极大的关系。后来他自称阳明子，人称阳明先生，以至名（守仁）字（伯安）隐而号（阳明）显，都来源于这三年的默坐，来源于会稽山的阳明洞中的“了悟”。那末这阳明洞在何处呢?

在绍兴城东南、会稽山东北方有一山峰叫宛委山，一名石签山、玉荀山，现为会稽山旅游度假区。那里有一大巨石，中有大罐，宽可容十多人，这就是古来有名的阳明洞。

关于阳明洞，古籍记载甚多。它是道家三十六洞天之一。北宋真宗校正道家典藏，命张君房总其成。张在众多道家著作中撮其要万余条而成书，名为《云岌七签》，共分七部122卷。《四库提要》评曰：“道藏精华，亦大略具于是矣。”这部书把神仙所居率在名山洞府之中，并命之为“洞天”，称道教，有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均有七仙治

之。而会稽山阳明洞天为三十六洞天之第十洞天，云为极玄太元洞天。《龟山白玉经》又云会稽山阳明洞系“仙圣天人都会之所”。这里在历史上有许多神异的传说：《史记》记禹治水，在宛委山得金简玉书，于是治水成功。司马迁曾“上会稽，探禹穴”。康熙《会稽县志·卷16祠祀志》又云，阳明洞有龙瑞宫，道书云为黄帝所建，曰侯神馆。南朝宋尚书孔灵产精于道学，改奏为龙瑞宫。唐时，置怀仙馆。唐开元二年，果有黄龙出现，于是再次敕为龙瑞宫，并让贺知章作《龙瑞宫记》。贺的《龙瑞宫记）就勒石于阳明洞的飞来石上，至今犹清晰可见。这一巨石斜扑而出，世称石自安息飞来，故名。宫记在巨石上，高4米，宽8.8米，行15字，共11行，楷书，端庄而挺拔，雄浑透俊秀，是我国古代摩崖之珍品，现为省重点文保单位。中唐时，元镇为越州刺史兼浙东观察使，曾于长庆四年（824）春分之日，在此投金简，并作诗纪事：“偶因投秘简，聊得泛平湖。”白居易和云：“去为投金简，来因挚玉壶。”两人的诗将阳明洞附近的风景胜迹禹庙、禹穴、香炉峰、石帆山、若耶溪等均摄入眼底，成为洞天福地一大长卷。以后在大和二年(828)，元威明也投简阳明洞天，咸通年间唐彦谦又探迹阳明洞，他们均有诗歌咏这一洞天的历史和优异的环境。阳明洞下的若耶溪被道家列为七十二福地的第十七福地，故此处可谓是洞天福地，山水相映。

就在这样一个充满神异色彩的地方，王阳明“默坐三年、一了悟心性”，初步确定了他的思想学说，为以后的龙场大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然在这三年中，也有小规模的外出讲学、与友人聚会的活动，但大部分时间在这阳明洞中深思勤研，精鹜八极。可见，阳明学派全部学说的肇始在会稽山阳明洞天，是先有阳明洞天的洞名才有王阳明这个名号，才有阳明哲学这一哲学名词，并因而扩大开去，才有其他地方的阳明洞、阳明书院的名称。今日，绍兴会稽山旅游度假区重点保护这千古名洞。

五、“书院讲学”考释

王阳明是哲学家，又是一个教育家，他的教育活动与哲学体系的形成和传播是紧密结合的。他在南方各省从事军事、政治的斗争，总是同时进行着教育与讲学的各项工作：于艰难竭蹶之中，受聘主办贵阳书院；在平定闽赣之乱后，在江西立社学、举乡约，修濂溪书院；在平定宁王宸濠之叛后，求录陆象山子孙、门人于白鹿洞，办书院讲学。在他愤而辞官、丁艰返乡后，更在绍兴开始了他大规模的书院讲学活动。

《年谱》云：自嘉靖元年（1522）王阳明51岁返乡起至嘉靖七年（1528）57岁止，均在越地讲学，办书院，授受门徒，成了他教育活动最集中、成绩最辉煌的时期。考王阳明一生讲学活动有23年，大多在军务政务之余，而这一次集中了7年时间，是专门进行的，因此是他教育生涯的高潮。同时，这次办学规模最大，人数最多，影响也最广。王阳明教育家、思想家的形象树立在这阶段。第三，更重要的是，这次教育活动

也是他整个哲学思想体系最后完成的阶段，是他的学说广为流传并进而形成哲学流派的阶段。

王阳明在绍兴的教育活动是多方面的，主要是办书院。《年谱》记：嘉靖三年，先生“辟山稽书院，聚八邑彦士，身率讲习以督之”。又云除当时绍兴府所属八个县子弟竞先来书院外，还有南北各省人士闻风齐奔越城受教，以至房舍狭小拥挤不下。“宫刹卑隘，至不能容。盖环坐听者三百余人。”“郡守南大吉以座主称门生……先生与论学有悟。”据《越中杂识》记，稽山书院有两处，一在今卧龙山西岗，一在今延安路西端舍子桥。他的主要弟子王畿、钱德洪等均入学听课。知府南大吉拜他为师，问学多次，受教殊深。后来在卧龙山上建“明德堂尊经阁”，王阳明应邀作《尊经阁记》。《年谱》又云：嘉靖四年，由于门徒日益增多，先生又增设一书院，“十月立阳明书院于越城”，“门人为之也，书院在越城西郭门内光相桥之东”。王阳明哲学的精髓，著名的“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为恶是格物，就是在这时向王畿、钱德洪传授的。从此他的学说更致完善，流布更为广泛。查康熙《会稽县志》“府城图”上有“阳明书院”，地址就在今下大路，东为东狱庙、能仁寺，西为光相寺。其实阳明书院即在东光坊之新建伯祠。《年谱》云，后12年，巡按使、门人周汝员建祠于楼前，即新建伯祠。除了在绍兴主办稽山书院、阳明书院外，他又在余姚龙泉山中天阁建阳明书院，授徒讲学。总之，这六七年间在绍兴办书院讲学，盛况空前。

在办书院的同时，他还广招门徒，设问答疑，又关心当时县学府学的办学事业、地方文教和社会民情习俗的改革，提出见解，作出品评，写有《山阴学堂记》、《亲民堂记》、《浚河记》、《预备仓记》等，系统阐发了他的教育思想和社会改革思想。在这几年办学中，他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学说体系，特别表现在完成了他的主要著作《传习录》整理与出版工作。《年谱》记，当时绍兴知府南大吉在薛侃所刻《传习录》三卷的基础上，又增补二卷，共五卷，在绍兴出版。一时争相传诵，使王阳明心学理论系统又完整地出现于世，并远播中外。嘉靖七年（1528），王阳明奉命离开绍兴总督两广军务和江西平乱，让其弟子王畿、钱德洪主持书院，不想竟卒于回归途中。但阳明书院的事业，他的弟子们在那里继续学习、深思和整理老师的谈话和讲学内容，依然还有好几年，所以才有上文所述到嘉靖三十一年（1552）提学使薛应旗改为“新建伯祠”为“阳明先生祠”之举，因为这里本是阳明书院所在，是王阳明学说最后完成的地方。

李钟岳与『大通党案』

□ 黄斌

摘要：辛亥志士徐锡麟与鉴湖女侠秋瑾于1906年底密议皖浙同时起义，徐锡麟安庆起义失败后，时在浙江绍兴府主持大通学堂的秋瑾于1907年6月被捕遇难，“大通党案”震惊当时。秋案的直接主使是时任浙江巡抚张曾敭与绍兴知府贵福。山阴知县李钟岳被迫参与秋案审讯，因李钟岳素仰秋瑾才学而有意袒护秋瑾，使之免于死罪，终因迫于压力徒劳无功。秋瑾遇难后数月，李钟岳在杭州寓所自缢殉道。

关键词：李钟岳；秋瑾；皖浙起义；大通党案；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期间，有数以千万计的革命志士死于非命，他们的壮举，引起了众多有识之士的同情和觉醒，而“鉴湖女侠”秋瑾的死则最大限度地激起了汉族人民的反抗情绪。秋瑾作为一介女流，以“危局如斯敢惜身，愿将生命作牺牲”（秋瑾诗《赠蒋鹿山先生言志》）的豪情，投身反清革命，于1907年7月15日在绍兴轩亭口从容就义。在秋案（史称“大通党案”）的背后，还有一个与之相关的人物却并不为世人所知，此人就是身处黑暗官场却良心未泯，亲自拘捕监杀秋瑾又负疚自尽的山阴知县李钟岳。秋瑾就义3个月后，参与秋案“审理”的李钟岳因悲情难抑，自缢殉道。

一　秋案之始

1906年底，在上海办理《中国女报》的秋瑾返回家乡浙江山阴县，接替徐锡麟主

持暗为革命据点的大通师范学堂，任学堂督办，主持校务，积蓄革命力量。当时，担任山阴知县的是山东人李钟岳。

李钟岳（1855～1907），字崧生、申甫，号晴岚，山东省安丘县辉渠乡人。他出身贫寒，自幼勤奋，十几岁便博览群书，能诗善文，18岁中秀才，39岁考中举人，43岁中进士第18名，从此入仕为官。任内，他在兴办教育、平粜救荒等方面颇有一些政绩。光绪三十三年（1907）正月，李钟岳由衢州府江山县调任绍兴府山阴县，任内遇上了革命党人秋瑾以大通学堂为掩护密谋反清举义（史称“大通党案”）这一重要历史事件，受上司指派，他直接参与了拘捕、审讯和监斩秋瑾的全部过程。

秋瑾到绍兴后，为了麻痹地方当局的注意，隐蔽革命意图，采取了虚与委蛇的策略。在大通师范学堂开学典礼上，特意邀请了绍兴知府与山阴、会稽知县以及绍兴府教育会会长参加。典礼上，秋瑾发表演讲，希望同学们奋发向上，刻苦学习，担负起救国救民、振兴华夏的革命重任。典礼结束时，参加仪式的会稽知县李瑞年对秋瑾说，学生们血气方刚，为师长者应善加诱导，切勿擅言“革命”二字，并说这两字乃乱党魁首孙文谬创，秋女士怎么也挂在嘴上了。秋瑾却笑对李瑞年说，“革命”二字，若说是孙中山创言，倒是张冠李戴了，实是出自儒家经典《易经》。当时在旁的李钟岳接口道，《易经》言“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哉”[①]，“革命”两字源出于此。

大通开学后，秋瑾常身着男装，佩刀挂枪，骑着骏马，带领学生去城外大校场训练，引得沿途市民争睹大通女督办的风采。当然，也有人说三道四。有些老秀才就议论开了，一个说：“抛头露面，招摇过市，成何体统。”另一个摇头长叹：“牝鸡司晨，天下大乱啊！”旁边的一位看客却接口说：“雄鸡不啼枉为雄鸡，人间不也多有枉称男儿的么？值国蔽民穷兵弱之际，秋女士不避男女之嫌，挺身而出勇任大通督办，为国家培养英才，巾帼胜过须眉，令自诩男子汉大丈夫者汗颜！”这位看客正是山阴知县李钟岳。

李钟岳还曾独自到大通学堂拜会秋瑾，并提出一连串问题：何为西学，何为西技，列强何以能如此强大，小小的日本何以能欺凌我地大物博之中华……秋瑾就自己所知，作了详细介绍。李钟岳洗耳恭听，不禁感叹：“古人云，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今日体会深矣！”此后，两人常有来往，屡有诗词互赠。李钟岳常以秋瑾的“驰驱戎马中原梦、破碎河山故国羞”，“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等诗句激励儿女，“秋瑾以一女子而有高绝文章、高尚气节，胜尔等多矣！”爱才之情，溢于言表。

早在李钟岳到山阴上任前的光绪三十二年（1906）冬，秋瑾与打入安庆巡警学堂任会办的徐锡麟在上海集会，密

①杨权注释：《易经》第145页，云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议分别在浙江和安徽同时起义，推翻满清政权，并约定由秋瑾负责组织浙江起义，徐锡麟负责发动安徽起义。后秋瑾于光绪三十三年正月从上海回到家乡山阴。大通学堂原为徐锡麟、陶成章等创办，是光复会训练干部、组织群众的革命据点。秋瑾到大通学堂后，为了积蓄革命力量，成立了“体育会”，招纳会党成员和革命青年，进行军事训练，培养军事人才，同时积极联络浙江各地会党，组织“光复军”，推举徐锡麟为首领，自任协领，计划于农历六月初十（7月19日）在浙皖两地同时举事。不料7月初，浙江武义县光复军首领、龙华会巡风聂李唐因言语不慎被捕，严刑拷打之下供出本县组织，又供出大通学堂学监赵卓是总部联络员。祸不单行，浙江金华、兰溪的会党也因为起事不顺而遭到破坏，各地失事，无不牵涉到大通学堂。与此同时，安徽有个叫叶仰高的党人在上海被捕后，招认有个化名为“光汉子”的革命党头领已混入安庆官场担任重要职位，安徽巡抚恩铭下令徐锡麟查拿。徐锡麟一看要查拿的人名正是自己的化名，估计自己的真正身份行将暴露，在来不及通知秋瑾的情况下，提前在光绪三十三年五月廿六（7月6日）巡警学堂的毕业典礼上起义，打死了观礼的恩铭。但因行动仓促，孤立无援而失败，徐锡麟等骨干壮烈牺牲，起事旋即遭到镇压。清吏从搜得的文书中，发现秋瑾系徐锡麟的同党，而且是浙地首领，于是火速转报浙江巡抚张曾敭。

此前，张曾敭接到浙江武义县的警报，于7月10日密电绍兴知府贵福：“据金华嵩守电，称武义获匪聂李唐等，供出党羽甚众。内有赵宏甫（赵卓），缙云人，在大通学堂司账，勾通大通学堂党羽，希图接应起事，请敕查拿。”[①]此电在安庆事发前。安庆事发后，被捕的徐锡麟之弟徐伟供称徐锡麟妻子王振汉曾游学日本，与秋瑾倡言革命，指控直接指向了大通学堂主持人秋瑾；又在此间，绍兴劣绅胡道南等人也向知府贵福密报，告称大通学堂将于7月19日发难。贵福一听到“革命”两字，极为惊恐，在他得知徐锡麟事后，又色厉内荏，竟夸大其词，电告张曾敭：“大通体育会女教员革命党秋瑾，及吕逢樵、竺绍康等，谋于六月初十日起事。竺号酌仙，平阳党首领，羽党万人，近已往嵊县纠约来郡，请预防”[②]，并请求派兵援助。张曾敭接到警报，即于7月11日派兵300多人由浙江新军标统李益智及第一标第一营管带徐方诏带领前来绍兴，查封、围剿大通学堂，捉拿秋瑾、赵卓等人。

二　围攻大通

杭州派兵赴绍前，清政府唯恐新军与革命党人暗中联络，临行前进行了搜身检查，引起官兵骚动，事情被杭州武备学堂的学生闻知，立即前往绍兴报信。7月12日，秋瑾已经获悉清军从杭来绍的消息，但尚不知道绍兴劣绅告密以及安

①②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第三册第4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庆徐伟招供的详情，因而对起义计划已经泄露的险情还不明了，以为“己系女人，毫无证据，即被捕亦无妨”[①]。当此紧急关头，秋瑾立即指挥师生掩藏武器，焚毁名册，疏散学生，然后回家处理革命文件、信札。在此生命垂危之际，秋瑾没有首先考虑个人，而是把安全让与同志，把危险留给了自己。

由于大通学堂校址在山阴县境内，贵福便命令到任不到半年的山阴县令李钟岳负责查抄大通学堂。出身书香世家的李钟岳仰慕秋瑾才学，因此，“事变虽起，犹思竭力保护之”[②]。山阴士绅也深知李钟岳爱护地方之苦心，数十人相聚县署，恳求保全地方。李钟岳告诉他们：“即诸君不来，我亦决不能鲁莽从事。”[③]于是立赴府署，向贵福陈述“该校并无越轨行动，不可武力摧残，惊动地方；容俟暗中调查，是否确实，再定办法。”[④]贵福心虽不悦，但起初也未十分拒绝。李钟岳回山阴后与众士绅商议，一时苦无善策，只有故意按兵不动，拖延时间，好让该校师生逃走。午后，贵福再次在府署召见李钟岳，予以严词斥责：“抚宪命令，汝延不执行，是何居心？限汝立刻率兵前往，将该校师生，悉数击毙，否则我即电告汝与该校通同谋逆，汝自打算可也。”[⑤]言讫将浙抚二次催促围抄电令掷给李钟岳，拂袖而去。李钟岳迫不得已，回县署告诸士绅：“情势至此，我已不能阻止，惟尽力之所至，少伤民命耳。”[⑥]

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四日（7月13日）下午4时许，在贵福的监视下，李钟岳会同抚标兵管带率新军300人，前往大通学堂捉拿“乱党”。他一面为秋瑾说情，一面促秋瑾速离。秋瑾未及离去，清兵蜂拥而至。军队荷枪实弹包围大通学堂之时，李钟岳在学堂门外向士兵大呼“但加逮捕，弗许伤害”。他又急中生智，密谕差役捕男释女。但当时秋瑾已女扮男装，与少数学生持枪抵抗。为了避免士兵开枪伤人，李钟岳故意乘轿走在最前面，让清兵跟随其后，进入学堂，他又下令兵丁不许乱射，只许捕人。于是，当场拘捕秋瑾、程毅、徐颂扬、钱应仁、吕植松、王植槐、石宝煦和蒋纪云等师生8人，押至县署。随后，贵福又命令将“人犯”提至府署，系于卧龙山女监内。

三　三堂会审

秋瑾等人被捕后，先是押在山阴狱中，贵福要李钟岳严刑拷问，推其本意恐怕是他不想担当诛杀志士的恶名，所以企图借李的手杀秋瑾。

7月13日晚上，秋瑾在绍兴知府衙门接受第一次审讯，即所谓的“三堂会审”。主审为贵福，陪审为会稽县令李瑞年、山阴县令李钟岳及省兵管带徐方诏。大堂上，秋瑾神色自若，坚贞不屈，只承认自己有家庭革命、夫

①谢震：《王君季高行述》，《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第469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②③李江秋：《秋瑾殉难记》，《山东文史资料选辑第25辑》第1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④⑤⑥李江秋：《秋瑾殉难记》，《山东文史资料选辑第25辑》第2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妇革命，否认参加推翻清政府的政治革命。初审无果，贵福十分无奈，便借李钟岳劝阻用刑、慢慢开导的建议，顺手把审讯推给了他，命李钟岳将秋瑾等人押回山阴县署继续审讯，并告诫：“明日务必审出结果，要有供词，如不招认，大刑伺候，不得姑息！”李钟岳将秋瑾带回山阴县监狱，却叮嘱狱卒，好生供给膳宿，不得虐待，以免妨碍审讯。

当晚，贵福连夜起草《恳请将秋瑾先行正法》呈文，发给巡抚张曾敭，欲将秋瑾先行处死，以绝后患：“查看该匪亲笔讲义，斥本朝为异族，证据确。余党程毅等，亦供秋瑾为首，惟尚无起事准期。若竺匪一到，恐有他变。恳请将秋瑾先行正法，余匪讯有实据，再行回禀。”[①]此电文显示出他至少明白三点：秋瑾是不会招供的，对她打主意是枉费心机；她的组织和她的同志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一定会有行动；秋瑾是浙江反清力量的带头人，是清朝的最大威胁。这种认识使贵福不需掂量就定下了杀害秋瑾的狠心。所以审讯情况如何，供词如何，物证多少，已与杀秋瑾的定局无关了。但李钟岳似乎丝毫不知贵福的居心。

7月14日上午，贵福责令山阴县对秋瑾进行第二次审讯，主审为山阴县令李钟岳。李钟岳提审秋瑾，但未按常规在县衙大堂审讯，而是令人将秋瑾带到花厅，即县太爷怡情养性和接待客人的厅堂。李钟岳同情秋瑾的遭遇，把作为清廷政治犯的秋瑾当作客人对待，这是很不容易的。他先是询问秋瑾的身世，秋瑾以诚对诚，把自己幼年读书习武，冲破家庭羁绊留学日本，回上海创办《中国女报》，主持大通，谋求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诸事详细叙说。

李钟岳见问不出什么名堂，又不愿用刑，便说，秋女士可否写份供词？这是贵福一定要的。又说，写什么，由秋女士酌定。秋瑾点头答应：“为不使李大人为难，可以写几句。”秋瑾蘸墨落笔，写了一个“秋”字，稍停了一下，顺笔续成“秋雨秋风愁煞人”七字，表达了对国家民族前途的担忧，对革命受挫的痛心，这就是后来广为流传的秋瑾的绝命书。秋瑾遇害两星期后，张曾敭曾致电贵福：“报纸中载：该匪当堂书‘秋雨秋风愁煞人’七字，有无其事？有即送核。”当日，贵福复电：“七字在山阴李令手，已晋省。”[②]可见实有其事。

李钟岳“复令自述经历”，秋瑾乃“索钢笔及蓝色墨水，信手挥写，都三千言，越一小时而毕”[③]，援笔疾书，文不加点，立就《秋瑾自述》供状，主要陈述其生平历史和申诉此次被捕之冤，揭露清廷罪孽，宣传革命学说。整个“审讯”过程持续两小时之久，室内寂静异常，形同会客。此情形被密探报

①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第三册第4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②秋宗章：《大通学堂党案》，《秋瑾史料》第104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③秋宗章：《六月六日和李钟岳》，《辛亥革命浙江史料续辑》第458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于贵福，贵福大怒，气势汹汹地责问李钟岳：“为何不用刑讯，反而待若上宾?”李钟岳直言说，秋瑾乃一学问高深的读书女子，又证据不足，碍难用刑。李钟岳向贵福复命并呈上《秋瑾自述》，贵福只看了个开头，就大发雷霆说，这算什么供词？拂袖离座，斥责李钟岳，如此执迷不悟，等着吃好果子吧。

当天上午，贵福又命李钟岳赴城外查抄秋瑾的娘家。为了防止查出秋瑾革命的证据和连累更多的人，李钟岳故意不让手下人搜查秋瑾居住的小楼，草草收兵，结果无获而归。（补叙一笔：民国25年即1936年，李钟岳之子、民国日报名记者李江秋，专赴杭州，与秋瑾之弟秋宗章相见。秋告诉他：“先姊在家，独居一小楼，所有与先烈来往信件，均藏其中。六月初四大通被查抄时，全家均逃难，故一切未及掩藏。令父李钟岳先生在查抄前，已问明小楼为秋女士所居，故意不令检查，否则必连累多人”，此举足以证明李钟岳救人于难的苦心。）

贵福因秋瑾没有供词，势难构陷党狱，逮捕革命党人，对李钟岳的审讯结果又甚为不满，于是于14日夜间对秋瑾实施第三次审讯。贵福指派幕僚余某对秋瑾进行刑讯逼供。审讯者凶残地动用了天平架、跪火链等酷刑，大堂上惨不忍睹。秋瑾咬牙闭目，神色自若，大义凛然，坚贞不屈。前后三次审讯，秋瑾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只承认办理大通学堂事宜，坦承主张“男女革命”，而非“政治革命”、“种族革命”，也没有泄露皖浙起义的计划。秋瑾在凶残的敌人面前保护了革命党人，维护了革命机密，捍卫了光复事业。贵福得不到秋瑾供状，黔驴技穷，只得指使爪牙捏造供词，强捺秋瑾指印匆匆结案。

14日半夜，贵福给巡抚张曾敭《恳请将秋瑾先行正法》的呈文来了批复，复电照准，令将秋瑾就地“正法”。

四　泪洒刑场

7月14日深夜，贵福怀疑李钟岳偏袒秋瑾，有意为她开脱，在得到浙江巡抚同意“将秋瑾先行正法”的复电后，在绍兴府署召见李钟岳，出示了张曾敭手谕，令其立即监斩秋瑾。贵福命令：“合亟订封密饬，扎到该县，立即遵照……监提该女犯秋瑾到案，当堂验明正身，绑赴市曹，监视处斩……”[①]李钟岳马上表示异议，案情尚未查核清楚，又无真实凭证，遽然处死，于法于理均不公允，乃据理力争道：“供、证两无，安能杀人？”贵福厉声训斥道：“此系抚宪之命，孰敢不遵？今日之事，杀，在君；宥，亦在君。请好自为之，毋令后世诮君为德不卒也。”[②]有史料说：“既而斩决秋女士，竭力阻拒，几至冲突。”[③]应是可信的。然而他的争

①秋宗章：《大通学堂党案》，《秋瑾史料》第101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②《辛亥革命浙江史料续辑》第459页。
③《辛亥革命浙江史料续辑》第324页。

执是无效的，杀人的命令已下，口舌之争已属无谓。李钟岳知大势已去，已无可挽回，又无力回天，只得口称“遵命”退出，怏怏返回县署，思忖良久，终无两全之策，内心之痛不言而喻。心想此案如交他人，白白使秋瑾女士受辱，不如由自己经办到底，也好成全秋女士的成仁之志。至少，由他监斩还能力保秋瑾不受凌辱并能尽力成全她的要求。

7月15日凌晨，李钟岳把秋瑾从狱中提出，一脸悲戚地说，我李某本欲救秋女士不死，然上意决要杀你，我位低言轻，愧力争不果，不得已奉命执行，盼秋女士谅解。秋瑾责问道：“予犯何罪至此？欲一见贵福，死无憾。”李钟岳无奈地说：“吾极知汝冤，无回天力，奈何！且事已至此，见贵福胡为者？”[①]秋瑾不再坚持，并劝慰李钟岳，“为难李大人了，深自感戴。”接着，她慨然而言：“以我的血唤召同胞齐起，早成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大业，夙有所备，酣畅之至！”李钟岳说：“请问秋女士，执行在即，还有什么事要托办吗？”秋瑾思索片刻，缓缓说道，有三事尚望周全：一、准其写家书诀别；二、临刑不得脱去衣服；三、不能以首级示众。[②]在那个黑暗的年代，杀人要砍头，如果是女子还要剥去衣服，似乎都成了习惯，秋瑾并不畏惧死亡，她只想捍卫一点点做人的尊严，不要身首异处，不要在被杀之后把纯洁的躯体暴露在这个罪恶的天地之间。李钟岳，一个小小七品县令，答应了后两个要求，成全了她最后的两个愿望，使她从容走向绍兴轩亭口。凌晨3点，执刑任务已不容再缓，于是李钟岳将秋瑾提至大堂，对秋瑾说：“余位卑言轻，愧无力成全，然死汝非我意，幸谅之也。”[③]说完，这个父母官当场“泪随声堕”，身边的吏役也都“相顾恻然”。秋瑾对这位父母官的暗中保护深表感激。

这时，贵福到了，催促李钟岳迅速执行，把秋瑾押往轩亭口刑场。凌晨4点，在贵福心腹的监视和催促下，李钟岳被迫押秋瑾步行至绍兴轩亭口赴刑。至刑场，秋瑾步下囚车，神情安详，她视死如归，引颈受戮，壮烈献身，一代女杰英勇就义，终年33岁。

李钟岳随即复文贵福：“监提该女犯秋瑾到案，当堂验明正身，绑赴市曹，监视处斩讫。除程毅等听候本府宪台提讯，并缉获余匪究办外，理合备文申报。仰祈宪台鉴核。”[④]秋瑾被杀，贵福又令李钟岳去秋家搜查军火，当然是什么也没有查出。在整个秋案过程中，贵福在没有供证的情况下急于将秋瑾就地“正法”，实为担心夜长梦多、事久生变，更害怕革命党人劫狱，同时也反映出满清统治阶层害怕革命，采取残酷镇压的方式迫害革命

①郭延礼编：《秋瑾研究资料》第328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②郭延礼著：《秋瑾年谱》第114页，齐鲁书社1983年版。
③《辛亥革命浙江史料续辑》第459页。
④《辛亥革命浙江史料续辑》第460页。

党人的卑劣手段。

秋瑾作为一介女流，不仅被满清统治者遍施酷刑，而且以谋反的罪名被斩首示众，弃尸街头，昭示了清末封建统治的血腥与野蛮。秋瑾牺牲后，全国各地的报纸纷纷予以报道，秋案一时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千夫所指，奇冤难雪。

五　负疚自愆

李钟岳在刽子手举刀落下时紧闭双眼，不忍目睹。绍兴知府贵福本就妒忌李钟岳的清白名声，又对李钟岳千方百计袒护秋瑾、屡屡抗命的行为极为不满，后因探悉李钟岳对秋瑾有“杀你非我本意”一语，大怒，当即电请浙抚，历数李钟岳在秋瑾案中的消极表现，要求把李钟岳撤职治罪。秋瑾就义后仅三天，厄运就降临到了李钟岳头上。浙江巡抚张曾敭在7月17日批复，以庇护乱党头目的罪名，罢免了李钟岳山阴知县之职，令去省城杭州等候查办。

李钟岳离开绍兴那天，百姓有感于这位父母官勤政爱民、清正廉明，有绅民数百人，集于县衙前热诚相送，又乘船数十只，送至距城30里的柯桥，仍恋恋不舍，才依依挥泪而别。李钟岳愧疚地对送行的人说：“去留何足计，未能保全大局，是所憾耳!”[①]山阴县文案李振川，深为李钟岳的遭遇不平，愤而请辞，追随故主去了杭州城。

李钟岳离职后寄住杭州。在杭州寓所里，他终日闷闷不乐，反复念叨“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之句，对秋瑾之死深感内疚。他曾对人说：“越中自明季以还，宿儒大师，先后讲学，隐托经义故训，藉严华夷之辩，光复之宜，涵濡于后学者至深。革命说兴，其迎而与合者，大抵皆优秀分子，纵罹法网，犹将宥之于世；至若谳狱不具，本无死法，扼于权要，未由平反，人虽谅我，其如良心责备何!”[②]闻者虽有慰藉于他，但他不能释然。丢官弃职，李钟岳并不介意，悬在心头的唯有秋瑾被害，自己力不从心，救其不成，反成了监杀秋瑾之人。作为杀害秋瑾令的执行者，李钟岳痛感自疚。他深深地懊恼愧疚，痛苦难安，经李振川等友人和家人多方劝慰，都不能使之消解，反而越加郁愤，竟然萌生了以身殉道的念头，以使世人明了自己的衷怀。他将秋瑾的遗墨“秋雨秋风愁煞人”紧紧藏在身边，日夜不离，不时拿出来默诵，每每涕泪交流，无限伤感。

一天，李钟岳走到后天井里的井边，徘徊一阵后，往下便跳。不料，井口太小，卡住腰际，家人发现了，把他拖拉了出来。自后，家人时时提防着他，他走到哪里就跟到哪里。但是半个月后的一天下午，他还是找到一个短暂的空隙，将绳索搭在了后园

①政协山东省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山东文史资料选辑》第25辑第4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②《山东文史资料选辑》第25辑第11页。

的树上，幸亏李振川和家人及时赶到，将他救下。自此以后，李钟岳似是回心转意。话多了，膳宿正常了，脸上还有了些笑容，当然也不再展诵“秋雨秋风愁煞人”了。

光绪三十三年九月廿三（10月29日），李钟岳与家人共进早餐后，踱入书房看儿子这两天写的文章，细细评说指点，多有勉励之言。继而唤李振川同去客厅对弈。当日他棋技发挥出色，时间不长已胜券在手，高兴得谈笑风生。李家上下无不欣喜传告，都以为他真正大彻大悟珍惜生命了。李振川支撑残局一阵后，终于认输，说是要去方便了。若是以往，他定要叫人代为照看一下李钟岳，而近时李钟岳的神情已很正常，估计不会有意外了，所以就径自出去了。片刻后，李振川回客厅，见本来敞开的门已关上，推门一看，立时大叫，原来李钟岳已自缢梁上！众人闻声赶到，七手八脚放下李钟岳。其时，他已气绝身亡，终年53岁。此时，距秋瑾遇难尚止百日，“身后萧条，几不能棺殓”。①

李钟岳自尽的消息传出后，浙江士民无论识与不识，无不哀痛惋惜，杭州城乡士绅前往吊唁者三日不绝。上海《中外日报》、《申报》、《新闻报》等媒体争相报道，一时舆论哗然，社会各界纷纷谴责绍兴知府贵福与浙江巡抚张曾敭，为李钟岳鸣不平。上海还将秋瑾一案编成新剧《六月雪》演出，为秋瑾和李钟岳鸣冤，痛骂张、贵。自此，秋瑾的革命事迹得以广泛传播，残杀革命志士的刽子手张曾敭和贵福也在全国民众的一片讨伐声中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不久，张曾敭在一片唾骂声中病死，贵福也在民国后改名换姓，不敢堂而皇之地做人。

六　留芳青史

李钟岳是一个有良心的命官，他在审理“大通党案”的过程中因同情革命党而被撤职。他在革职离任前，抡起杀威棒捣毁了陈设在公堂上象征公平正义的天平架，一边猛烈打击，一边高声大骂当局者为禽兽，并留下了“若借此想见好上台，便是禽兽”这样的话。李钟岳始终走不出秋瑾的阴影，他被秋瑾巨大的悲情所击倒，目睹秋瑾的死、贵福他们的横暴而无能为力，最终还是解不开良心的纠葛。他为保持人性的光泽而自守，虽然无力匡扶正义，却在黑暗的官场中呈现出一抹黯淡的亮光。

李钟岳自杀的根本原因是自疚于秋瑾案。他身处官场，却天良未泯，不唯唯诺诺，惟命是从，既不肯逼供，查抄军火又无功而返，最后竟然还提出无证供不可杀人，因此得罪了顶头上司，贵福、张曾敭他们当然容不下他，他也最终难逃被撤职的厄运。

1912年7月21日、22日，民国肇始，《民主报》连续报道当年《西子

①郭延礼编：《秋瑾研究资料》第513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湖滨之血泪》、《新浙江潮》主笔王卓夫说：“李公为专制时代良吏，既因秋案如是，乃附祀秋祠以光泉下，该社均表同情。”[①]（秋祠即杭州的秋瑾祠，该社即专门纪念秋瑾的秋社）《续安丘新志》载：“浙人追思之，及秋案昭雪后，乃为立祠西湖上，岁时祀之。”[②]秋、李两家遂成为至交。

辛亥革命成功后，民国成立，“秋案”昭雪，真相大白。孙中山亲笔为秋瑾女士题写“巾帼英雄”四个大字，并书楹联一副：“江沪矢丹忱，感君首赞同盟会；轩亭洒碧血，愧我今招侠女魂。”浙江革命先哲褚慧僧先生与秋瑾生前挚友吴芝瑛、徐寄尘女士于1912年在西子湖畔建秋瑾墓和鉴湖女侠祠，感于身为逊清知县的李钟岳，同情支持秋瑾，又想方设法营救，最终以身殉道，以生命伸张正义，为示崇德报功，特将李钟岳的“神位”祀于祠中，上题“清山阴知县李钟岳之神位”，下书“李钟岳先生，山东安丘县人，秋案中有德于女侠”，永享祭奠，以纪念李钟岳保护秋瑾和为秋瑾殉道的悲壮义举。从此，李钟岳与秋瑾两位志士一并奉祀。

①民主报记者：《西子湖滨之血泪》，《秋瑾研究资料》第601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②李守民主编，山东省安丘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安丘县志》第663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越缦堂联话辑注》(三)

□ 邓政阳

五十八 光绪三年八月初六日戊子。昨日得敖金甫[①]柬，以明日为其太翁八十一岁称觞，因作书询其字曰庚渠[②]。今日书楹帖祝之云：

计大椿[③]年以千百算；

教小杜律[④]为邦家光。

又赠云门[⑤]尊人鉴庭总戎燮楹联云：

弢钤[⑥]嗣功[⑦]，踵绘于阁；

礼乐教子，遂名其家。

总戎为宁远大将军，谥勇毅，图形紫光阁。弼公先生廷之元孙。韶州总兵尚彬先生经文之曾孙。咸丰中以永州镇总兵署湖南提督，忤左相国为湖广总督官，公劾罢。

【注释】

①敖金甫：敖册贤，字金甫，又字典。四川荣昌人。清咸丰三年（1853）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截取知府。著有《椿荫轩诗钞》。

②庚渠：敖翊臣，字缚卿，一字庚渠。四川荣昌人。道光二年（1822）举人，大挑借补珙县训导，保升知县，选广东丰顺县知县，调补澄海县。后知广东石城、吴川、永安等县。

③大椿：《庄子·逍遥游》：“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以八千岁为秋。”后用以喻指父亲。

④小杜律：指汉杜延年所订的法律。《后汉书·郭躬传》：“父弘，习《小杜律》。太守寇恂以弘为决曹掾，断狱至三十年，用法平。”李贤注：“杜周，武帝时为廷尉、御史大夫，断狱深刻。少子延年亦明法律，宣帝时又为御史大夫。对父，故言‘小’。”

⑤云门：樊增祥（1846～1931），原名樊嘉、又名樊增，字嘉父，别字樊山，号云门，晚号天琴老人，湖北恩施人。清光绪三年（1877）进士。历任渭南知县、陕西布政使、护理两江总督等职。曾师事张之洞、李慈铭，为同、光

时著名诗人，诗作艳俗，有“樊美人”之称。著有《樊山文钞》、《樊山公牍》、《樊园五日战时记》等。

⑥弢钤：古代兵书《六韬》和《玉钤》的并称。后因以称用兵的谋略。明袁宗道《封知县刘公墓志铭》：“遂屏掷帖括，改学弢钤。“

⑦嗣功：谓接续或取代他物的功用。《宋书·孔琳之传》：“故圣王制无用之货，以通有用之财，既无毁败之费，又省运置之苦，此钱所以嗣功龟贝，历代不废者也。”

附：曾纪泽《曾纪泽日记》载：光绪三年八月五日。写一联寿敖金甫之尊人，撰句云：“近对岷山开寿域，多裁宫锦制斑衣。”

五十九 光绪三年十月二十日辛丑。为子宜[1]书楹帖，撰联句云：

治经[2]得家法[3]；

吐词[4]皆天芬。

为秋菱[5]书楹帖，撰联句云：

秋树齐芬，独让幽桂；

菱花并影，双照圆蟾。

【注释】

①子宜：见二十四②。

②治经：研究经学。《晋书·食货志》：“天之所贵者人也，明之所求者学也，治经入官，则君子之道焉。”

③家法：概言其家学渊源。明末清初，绍兴有蓬莱诗社，由孙如法弟孙如洵和上虞人徐咸清共同创建。如洵长子以衡及如法嗣子有闻均为诗社成员。有闻有《桐竹庐诗文集》八卷行于世。如法孙兆熙、茂荪、兆勋合编有《孙氏世乘》三卷；兆勋编有《姚江孙氏传文》四卷。五世孙谊有《毗陵逸诗钞》二十三卷。六世孙大夏著有《红草轩稿》、《小如舟诗钞》两种。九世孙福田有《话雨山房文集》行世。十世孙廷璐号琴士，与同郡王兰士、胡香士齐名关中，号为“越州三士”。廷璋字仲嘉，号莲士，与兄廷璐同为道光、咸丰年间绍兴“益社”成员。为诗务馋锼隐僻，千锤百炼，必于奇丽，与陈寿祺、王平子合称“越三子”，越缦尝将其倡和之什诗汇刻，名为《越三子集》。又有《井眉经说》、《井眉丛说》、《亢艺堂诗文集》、《玉井词》、《勉熹堂诗集》、《莲华居士遗集》、《宰邡集》等。而孙咏裳则为十一世。

④吐词：发言。亦谓写作诗文。汉王充《论衡·问孔》：“使此言意不解而文不分，是谓孔子不能吐辞也。”此处为写作诗文之意。

⑤秋菱：钱桂蟾（1855～?），号秋蔆，又号荇香，北京人。原籍苏州。昆曲旦角。事详越缦所撰《花部三珠赞》。

六十 光绪四年（1878）十月初八甲申。先本生王父蕴山[1]府君，少本生王母顾恭人二岁，咸丰辛亥，顾恭人[2]卒。府君挽联云：

六十载夫妻无时暂别；

七一年人世送尔先归。

次年壬子三月豫[3]题圹联云：

受天地生成七十年，赢得白水盟心[4]，青山埋骨；

告儿孙春秋一二祭，须趁梅花未落，枫树初红。

府君最爱梅花及红树也。是时，府君康强无恙，踰月竟卒，盖前知者。

【注释】

①蕴山：李钰（1779～1852），字蕴山，候选州同知，敕赠儒林郎，覃恩貤赠中宪大夫户部郎中，加三级。李慈铭本身祖父。工诗。

②顾恭人（1781～1851），敕封安人，覃恩貤赠恭人。

③豫：同“预”。

④盟心：泛指对人盟誓。

六十一 光绪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丙申。夜书春联。大门云：

但来投刺[①]皆佳客[②]；

暂自栽花[③]作寓公[④]。

又枋间短联云：

己有孚象[⑤]；

卯曰春门[⑥]。

厅事云：

常爱书窗满晴日；

偶缘客坐得新闻[⑦]。

堂柱云：

随分[⑧]读书吾事了；

多方种树此心长。

房扉云：

梅蕊渐消寒九九；

桃花双结闰三三。（明年闰三月）

【注释】

①投刺：投递名帖。清陈康祺《郎潜纪闻》卷五：“明季士大夫投刺率称某某拜，开国犹然，近人多易以‘顿首’二字。”

②佳客：嘉宾；贵客。唐杜甫《宾至》诗：“竟日淹留佳客坐，百年粗糲腐儒餐。”

③栽花：晋潘岳任河阳县令时，在县中满栽桃李，传为美谈。后因以“栽花”称扬县令。清陈维崧《秋霁·送江辰六之任益阳》词：“江山未老，又逢仙令栽花到。”

④寓公：古指失其领地而寄居他国的贵族。后凡流亡寄居他乡或别国的官僚、士绅等都称“寓公”。宋范成大《东山渡湖》诗：“吾生盖头乏片瓦，到处漂摇称寓公。”此处为越缦自指。

⑤己有孚象：《说文》：己，中宫也，象万物辟藏诎形也。己承戊，象人腹。越缦至此无子嗣，其心可见一斑。

⑥卯曰春门：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冒也。二月万物冒地而出。律书曰。卯之为言茂也。言万物茂也。律历志。冒茆于卯。天文训曰。卯则茂茂然。释名曰。卯，冒也。载冒土而出也。盖阳气至是始出地。象开门之形。字象开门也。莫饱切。古音在三部。故二月为天门。卯为春门。万物已出。凡卯之属皆从卯。

⑦新闻：新近听来的事。社会上新近发生的事情。唐李咸用《春日喜逢乡人刘松》诗：“旧业久抛耕钓侣，新闻多说战争功。”

⑧随分：依据本性；按照本分。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镕裁》：“谓繁与略，随分所好。”周振甫注：“随分所好，跟着作者性分的爱好。分，性分，天性，个性。”

六十二 光绪五年（1879）三月初八壬子。夜为子缜[①]书楹联云：

古谊[②]缣编搜坠汉；

闲情花叶斗朝云。

为霞芬[③]书楹联两联。一云：

霞呈宝镜双花靥；

芬染银炉百福云。

首尾藏其名字也。

一云：

绿鹦款语宜春榭；

玉燕新巢称意花。

切其新居也。

为扶云书楹联云：

扶花吹絮春庭乐；

云影霞光绮户多。

为郑子霞[4]妹夫书楹联云：

寿献金萱无量佛[5]；

春添珠树宁馨儿[6]。（宋人诗：室无阿堵物，门有宁馨儿。）

其母年将八十，且祝其生男也。

【注释】

①子缜：陶方琦（1845～1884），字子缜，一字子珍，清浙江会稽人。光绪二年（1876）进士，官授翰林院编修，督学湖南。著有《淮南许注异同诂》、《字林考逸补本》、《汉孳室文钞》、《兰当馆词》等。

②古谊：古贤人之风义。清陈康祺《郎潜纪闻》卷一：“古谊忠肝，跃然纸上。”

③霞芬：朱靄云，字霞芬，乳名恩子。昆曲名旦。光绪二年（1876）被选为“菊榜状元”，享名后立堂号“云和堂”，造就诸多名旦，梅兰芳、王蕙芳、朱幼芬等均出身于此。事详越缦所撰《花部三珠赞》。

④郑子霞：郑清标（1841～?），李慈铭长妹夫。《光绪庚辰同年齿录·李慈铭履历》：胞妹长，适候选县丞郑清标。联话中称为“子霞”，疑为其字。

⑤无量佛：阿弥陀佛的意译。西方净土的教主，佛教净土宗的信仰对象。《观无量寿佛经》：“见无量寿佛者，即见十方无量诸佛。”

⑥宁馨儿：晋宋时俗语，犹言这样的孩子。《晋书·王衍传》：“衍，字夷甫，神情明秀，风姿详雅。总角尝造山涛，涛嗟叹良久，既去，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媪，生宁馨儿！’”后用为对孩子的美称，犹言好孩子。

六十三 光绪五年三月二十九日癸酉。为敦夫[1]书楹帖且撰句云：

文高东海传雄赋；

居共西河是醴泉[2]。

以与敦夫同居西郭，止隔一河，故用《南史·陆慧晓传》语。

【注释】

①敦夫：鲍临（1835～?），字仲怡、敦夫、镜予。清浙江山阴人。同治十三年（1874）进士，改庶吉士，授编修，历官司业。

②醴泉：典同五十六②。

六十四 光绪五年五月初四日丁丑。绂丈[1]以初六日七十初度，伯寅[2]来告不称寿，不受礼物。因为家庆图序骈文一首，写横帧以诒之，且书楹联十六字云：

箴聃[3]大节，本之学问；

韦平[4]代业，中有神仙。

【注释】

①绂丈：潘曾绶（1810～1883），原名曾鉴，字若甫，号绂庭，清浙江吴县人。道光二十年（1840）举人。历官内阁中书、刑部尚书。父丧终，不复出。后以祖荫贵，就养京师，优游文史，宏奖后进，布衣萧然，无异寒素。

老病杜门，仅与李慈铭相往还。工诗文和词。著有《兰陔书屋诗集》。

②伯寅：潘祖荫（1830～1890），字东镛，号伯寅。咸丰二年（1852）进士。历官大理寺少卿、光禄寺卿，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工部尚书，刑部尚书等职。著有《攀古楼彝器图释》，《滂喜斋丛书》、《功顺堂丛书》。

③篯聃：彭祖与老聃的并称。传说二人均极长寿。晋嵇绍《赠石季伦》诗："远希彭聃寿，虚心处冲默。"

④韦平：西汉韦贤、韦玄成与平当、平晏父子的并称。韦平父子相继为相，世所推重。《汉书·平当传》："汉兴，唯韦平父子至宰相。"颜师古注："韦谓韦贤也。"

附：王闿运《湘绮楼日记》载，光绪九年二月十七日，作潘绂翁挽联：紫薇仙吏最高年，早翛然富贵丛中，闲话蓬莱水深浅；黄阁同班传盛事，更怅望升平门下，春风桃李梦低回。

六十五　光绪五年九月二十五日乙未。

为何达夫[①]篆十二字楹帖：

谦卦[②]六爻[③]皆吉；

恕[④]字终身可行。

【注释】

①何达夫：待考。《日记》"何达夫来，新改江西知县，来辞行。"

②谦卦：谦卦是《易经》六十四卦之第十五卦。孔颖达注：谦者，屈躬下物，先人后己，以此待物，则所在皆通，故曰亨。而小人行谦则不能长久，惟君子有终也。

③六爻：《易》卦之画曰爻。六十四卦中，每卦六画，故称。《易·系辞上》："六爻之动，三极之道也。"孔颖达疏："言六爻递相推动而生变化，是天、地、人三才至极之道。"后因以指占卜。

④恕：是为人处事之要，是人值得终生奉行的高尚品德。将心比心谓之诚，推己及人谓之恕。此含义最早见于《论语·卫灵公》："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案：此联亦见于清儒金缨《格言联壁》。由于金缨生卒不可考，故难知此联到底是谁所作。

六十六　光绪五年十一月初一庚午。

张香涛[①]以妇丧来赴，已三娶矣。王廉生之妹[②]也。前日嘱云门来乞挽联，今日书予之云：

蜀锦浣桃花，正画筴西来，绣帨东至，指官阁猩棠开日，翟帔催妆，话昔贤三娶邀封，偕老将同欧兖国[③]；

宫眉[④]伴莲烛，奈金蜨[⑤]甫睟，玉燕[⑥]重怀，趁蓐房黄菊斜时，鸾钗遽判，赢垂老六如[⑦]补偈，悼亡还续魏城君[⑧]。

香涛任四川学政时，亲迎于妇翁龙安太守署，生两女以娩后亡。

为弢夫[⑨]书七言楹帖云：

笛谱已销隋苑[⑩]月；

经帏[⑪]长映赤城霞[⑫]。

皆有本事也。

【注释】

①张香涛：见四十九②。

②王廉生之妹：王懿荣的妹妹、四川龙安知府王祖源的女儿王氏。张之洞

也三娶。王廉生之妹即为其第三位夫人。

③欧兖国：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谥文忠。北宋吉州庐陵人。曾继包拯接任开封府尹，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死后赠太子太师，谥文忠，追封兖国公。一生三娶。第一位胥夫人，为胥偃之女。后继娶集贤院学士、谏议大夫杨大雅之女。第三任夫人薛氏，是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薛奎第四女。

④宫眉：谓妇女依宫中流行样式描画的眉毛。唐李商隐《蝶》诗之三："寿阳公主嫁时妆，八字宫眉捧额黄。"

⑤金銮：白居易女儿的名字。后借指幼女。清王继香《〈小螺庵病榻忆语〉书后》："古人如昌黎志女拏之圹，乐天哀金銮之辞，有此郁伊，无此悱恻也。"

⑥玉燕：传说中预兆生育贵子的白燕。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梦玉燕投怀》："张说母梦有一玉燕自东南飞来，投入怀中，而有孕生说，果为宰相，其至贵之祥也。"后作贺人生子的颂语。

⑦六如：即六如亭。苏轼第三任妻子王朝云逝后。苏轼一直鳏居，再未婚娶。遵照朝云的遗愿，苏轼将亡妻葬于惠州西湖孤山南麓栖禅寺大圣塔下的松林之中，并在墓边筑六如亭以纪念，撰写的楹联是"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

⑧魏城君：指王弗，苏轼的结发妻。四川眉州青神人。其先后被朝廷追封为"魏城君"、"崇德君"、"通义郡君"。弗逝后，苏轼依父亲苏洵言"于汝母坟茔旁葬之"，并于坟茔手植三万株松以寄哀思。苏轼《安节将去作小诗十四首送之》其八："东阡在何许，寒食江头路。哀哉魏城君，宿草荒新墓"。此处代王廉生之妹。

⑨弢夫：王弢夫（1842~1904），讳彦威，字弢甫，原名禹堂，字渠城，小字士廉，晚号藜盦。清浙江黄岩人。清同治九年（1870）举人。曾任工部主事，军机处领班章京，江南道监察御史，太常少卿等职。著有《外交始末记》、《枢垣笔记》、《扈从笔记》、《秋镫课诗屋日记》、《藜盦丛稿》等。

⑩隋苑：园名。隋炀帝时所建。即上林苑，又名西苑。故址在江苏省扬州市西北。杜牧《寄题甘露寺北轩》诗："天接海门秋水色，烟笼隋苑暮钟声。"

⑪经帏：汉唐以来帝王为讲论经史而特设的御前讲席。清制，经筵讲官，为大臣兼衔，于仲秋仲春之日进讲。清陈康祺《燕下乡脞录》卷二："康熙十年二月，肇举经筵大典于保和殿，以孝感熊文端公为讲官，知经筵事。"

⑫赤城霞：赤城山在浙江天台县西北，山上赤石并列如屏，望之如霞，"赤城栖霞"为天台八景之一。

案：书弢夫楹联，据手迹有跋曰：弢夫老弟同年由省觐还都，白华之馨，温乎玉色，绛帐之乐，铿尔朱弦，迺以邗沟柳枝，有小杜之恨，燕台琼树，尠何戡之欢。棋局难平，钱囊已尽，怒然有余思也。属书楹帖为述其意，聊以广之，惟弦正焉！

六十七 光绪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癸亥。

夜书春帖子。大门云：

春生门巷[1]传佳语[2]；

老恋京华[3]读异书[4]。

客坐云：

轩窗燕坐[5]亦堪画；

宾主清谈多入诗。

室户云：

履屐随宜见经济；

草花无处不精神。

楣联云：

庚贝是续；

辰会是昏。

夜大雪复积三四寸。付春联钱七千二百。

【注释】

①门巷：门庭里巷。《后汉书·郎顗传》：“公府门巷，宾客填集。”

②佳语：吉祥的话。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九：“徽宗尝乘轻舟泛曲江，有宫嫔持宝扇乞书者。上揽笔亟作草书一联……俄复取笔涂去‘犯钩陈’三字，曰：此非佳语。”

③京华：京城之美称。因京城是文物、人才汇集之地，故称。晋郭璞《游仙诗》之一：“京华游侠窟，山林隐遁栖。”

④异书：珍贵或罕见的书籍。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典籍》：“秘书监牛宏表请分遣使搜访异本，每书一卷，赏缣一疋，校写既定，本还其主，由是人间异书，往往间出。”

⑤燕坐：安坐；闲坐。《仪礼·燕礼》“宾反入，及卿大夫皆说屨升，就席。”郑玄注：“凡燕坐必说屨，屨贱不在堂也。”

六十八 光绪六年（1880）七月二十五日辛卯。

晡食燕屑粥一小碗，小觉可支，即起，坐庭中作书写桑柏侪[1]尚书八十寿联云：

生正献[2]飨，致七十政[3]；

稽皋陶[4]寿，盖百余年。

【注释】

①桑柏侪：桑春荣（1802~1882），字柏侪，清浙江山阴人，寄籍直隶宛平。清道光十二年（1832）进士。历官河南道监察御史、四川道监察御史、云南布政使、兵部右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尚书等职。卒后加太子少保衔，谥“文恪”。著有《秋审实缓比较汇案》。

②正献：古代祭祀，向受祭者行献爵献帛之礼。与向配飨者行献爵献帛之礼的“分献”相对而言。清朱大韶《实事求是斋经义·宗庙之祭无九献辨》：“天子诸侯之祭礼虽亡，以散见于《戴记》者求之，堂上四献，室中三献，正献凡七。”

③致七十政：《公羊传·宣公元年》：“退而致仕。”何休注：“致仕，还禄位于君。”唐白居易《不致仕》诗：“七十而致仕，礼法有明文。”致仕，谓辞去官职。

④皋陶：也作“皋繇”。传说虞舜时的司法官。《书·舜典》：“帝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

六十九 光绪六年九月三十日乙

未。

为梁星海[①]书楹联赠之，句云：

珠襦[②]甲帐[③]妆楼记[④]；

钿轴[⑤]牙签[⑥]翰苑书[⑦]。

以星海濒行索之甚力，故书此为赠。且举其新婚、馆选二事，以助伸眉。

夜书先六世祖天山[⑧]府君家训楹联：

多积德，多读书，多吃亏，以多为贵；

寡意气，寡言语，寡嗜好，欲寡未能。

【注释】

①梁星海：梁鼎芬（1859～1919），字星海，一字心海，又字伯烈，号节庵，广东番禺人。光绪六年（1880）进士。历官直隶州知州、武昌知府、湖北安襄郧荆道、湖北按察使、布政使等职。

②珠襦：镶嵌金、银、玉、贝等物的卷轴。《汉书·霍光传》：“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帐中。”颜师古注引晋灼曰：“贯珠以为襦，形若今革襦矣。”

③甲帐：汉武帝所造帐幕。饰琉璃珠、夜光珠等珍宝者为甲帐，以居神；其次为乙帐，以自居。清吴伟业《读史有感》之三：“昭阳甲帐影婵娟，惭愧恩深未敢前。”

④《妆楼记》：唐张泌所著，内容为古代流行服饰、美容、美发。

⑤钿轴：镶嵌金、银、玉、贝等物的卷轴。唐白居易《妻初授邑号告身》诗：“弘农旧县受新封，钿轴金泥告一通。”

⑥牙签：指书籍。宋陆游《冬夜读书示子聿》诗：“绝胜锁向朱门里，整整牙签饱蠹鱼。”

⑦《翰苑书》：《翰苑群书》的简称。宋洪遵编。主要讲唐代翰林内容的古籍。

⑧天山：李登瀛（1646～1730），字俊升，以字天山，号梅溪。康熙五十一年（1712）进士，充武英殿纂修官，授内阁中书，任江西安仁县知县，兼鄱阳县知县等职。

附：民国赵元礼《藏斋诗话》评曰：李越缦先生之先人家训楹联云：“多积德，多读书，多吃亏，以多为贵；寡意气、寡言语、寡嗜好，欲寡未能。”此确是老先生语。若今之所谓智者，对于“多吃亏”三字，必有是非之辨，不以徒吃亏为是也。

七十 光绪七年（1881）三月初九辛未。

撰云门[①]尊人鉴庭总戎挽联云：

述祖[②]绘麒麟，自束发[③]从戎[④]，遍历蛮烟瘴雨[⑤]，百战致旌麾，赢得谤书盈箧[⑥]，定远[⑦]生还，空看苔卧绿枪[⑧]，尘韝金甲，让群儿熟胛[⑨]封侯，洒泪湘天，未了枕戈[⑩]遗恨在；

传家有熊骥，以立身为教，分治朱武[⑪]顾文[⑫]，变声[⑬]叶[⑭]翁博[⑮]，讵知珠树[⑯]偏凋，僧弥独秀，刚喜玉堂香惹，花县[⑰]春生，待百里艺[⑱]兰视膳[⑲]，惊心风木[⑳]，尚迟奉檄讣音[㉑]来。

即买白绫二丈书致云门。

【注释】

①云门：见五十八④。

②述祖：遵循祖训。唐柳宗元《送从兄称罢选归江淮诗序》：“矧吾兄有柔儒之茂质，恢旷之弘量，敢无敬乎；有述祖之美谈，安道之贞节，敢无慕

乎!”

③束发：古代男孩成童时束发为髻，因以代指成童之年。汉贾谊《新书·容经》：“古者年九岁入就小学，蹑小节焉，业小道焉；束发就大学，蹑大节焉，业大道焉。”

④从戎：投身军旅。三国魏曹植《杂诗》之二：“类此游客子，捐躯远从戎。”

⑤蛮烟瘴雨：指蛮荒地区的烟雨瘴气。亦指蛮荒地区。《明史·刘可训传》：“可训将孤军，出入蛮烟瘴雨者多年。”

⑥谤书盈箧：一方面是说人或事遭到很多人的非议，典见《战国策·秦策二》：魏文侯令乐羊将，攻中山，三年而拔之，乐羊反而语功，文侯示之谤书一箧，乐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

⑦定远：东汉班超的封号。班超早年家贫，为官佣书，尝投笔叹曰：“大丈夫无它志略，犹当效傅介子、张骞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研间乎?”后奉使西域，立功，封定远侯。事见《后汉书·班超传》。唐王昌龄《箜篌引》：“何用班超定远侯，史臣书之得已不?”后亦喻称驻守或出使西北边疆地区的使者、大臣等。

⑧绿枪：即绿沉枪。古代诗词中常见的枪名。以绿沉竹制成的枪。宋赵德麟《侯鲭录》云：“绿沉事，人多不知。老杜云：‘雨抛金锁甲，苔队绿沉枪。’”另也有解释为“以绿色为装饰的枪”、“用精铁制成的枪”。

⑨熟胖：《新唐书·回鹘传下》：“骨利干处瀚海北……其地北距海，去京师最远，又北度海则昼长夜短，日入亨羊胖，熟，东方已明，盖近日出处也。”后用以比喻光阴快速流逝。宋欧阳修《谢观文王尚书惠西京牡丹》诗：“尔来不觉三十年，岁月才如熟羊胖。”

⑩枕戈：枕着武器。戈，泛指武器。谓杀敌报国，志坚情切。唐杜甫《壮游》诗：“枕戈忆勾践，渡浙想秦皇。”

⑪朱武：指三国吴郡朱氏善武，代表人物朱桓，吴郡四大家族朱氏子弟，智勇双全。

⑫顾文：指三国吴郡顾氏善文，代表人物顾雍，吴郡四大家族顾氏子弟，为人持重，长于文治。

⑬变声：谓发出各种不同的声音。晋陶潜《与子俨等疏》：“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復欢然有喜。”此处指樊增祥所学多。

⑭叶：通“协”，和洽。

⑮翁博：同“滃渤”。盛大宽广。《荀子·乐论》：“筦龠发猛，埙篪翁博。”王先谦集解引俞樾曰：“翁当为滃。《文选·江赋》曰：‘气滃渤以雾杳。’翁博犹滃渤也。”此处喻樊增详学识宽广。

⑯珠树：喻俊才。宋陈与义《次韵光化宋唐年主簿见寄》之一：“梦中犹得攀珠树，别后能忘倒玉山。”此处指樊增祥的哥哥樊增祹。据刘成禺《世载堂杂忆》载：大儿子樊增祹“学问切实，高于樊山”，只可惜天不永年，未臻其至。张之洞督学湖北时刻印选本，

曾选入增祯文多篇。不幸的是，增祯因病早逝。

⑰花县：晋潘岳为河阳令，满县遍种桃花，人称“河阳一县花”。见《白孔六帖》卷七七。后遂以“花县”为县治的美称。

⑱艺：种植。《说文》：艺，种也。

⑲视膳：古代臣下侍奉君主或子女侍奉双亲进餐的一种礼节。语本《礼记·文王世子》：“文王之为世子，朝于王季日三。鸡初鸣而衣服，至于寝门外，问内竖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食上，必在视寒暖之节，食下，问所膳。”

⑳风木：比喻父母亡故，不及奉养。典出《韩诗外传》。宋刘宰《分韵送王去非之官山阴得再字》：“桃李春正华，风木养不待。”

㉑讣音：报丧的信息、文告。宋韩琦《祭少师欧阳公永叔文》：“忽承讣音，且骇且悲，哀诚孰诉，肝胆几堕。”

七十一　光绪七年三月初十壬申。

为敦夫[①]撰云门[②]尊人挽联并书之云：

系籍[③]掌欹飞[④]，杀贼立功，继建和门[⑤]旗鼓[⑥]，乃世将道家所忌，归去骑驴，闲招旧部渔樵，翠峡花前同一醉；

感恩[⑦]仍士伍[⑧]，读书教子，不求杜曲[⑨]桑麻[⑩]，幸文明[⑪]武节[⑫]兼施，和声鸣鹤，讵料蓬山出入，灵椿天上已千秋。

【注释】

①敦夫：见六十三①。

②云门：见五十八⑤。

③系籍：编入名籍。清方苞《教忠祠祭田条目序》：“狱辞上，蒙恩免死，系籍汉军。”

④欹飞：汉武官名。少府属下左弋，自武帝太初元年改名为“欹飞”，掌弋射。清龚自珍《己亥杂诗》之四五：“一队欹飞争识我，健儿身手此文官。”

⑤和门：此处指军营之门。《文选·颜延之〈阳给事诔〉》：“金柝夜击，和门昼扃。”李周翰注：“和门，军门也。”

⑥旗鼓：喻指首领；典型。此处为“典型”之义。清袁枚《随园诗话》卷七：“马观察维翰……与卢雅雨同年，一时号‘南马北卢’，亡后，卢哭之云：‘前辈典型亡北斗，中原旗鼓失南军。’”

⑦感恩：感怀恩德。《三国志·吴志·骆统传》：“飨赐之日，可人人别进，问其燥湿，加以密意，诱谕使言，察其志趣，令皆感恩戴义，怀欲报之心。”

⑧士伍：亦作“士五”。士卒。引申指军队。

⑨杜曲：地名。在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南，樊川、御宿川流经其间。唐大姓杜氏世居于此，故名。杜甫《曲江三章五句三首》其三：“自断此生休问天，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将移住南山边，短衣匹马随李广，看射猛虎终残年。”

⑩桑麻：即桑麻田。唐代在土地分配方面实行均田制，农民丁男授永业田二十亩，还附住宅地。永业田沿用北魏“桑田”、“麻田”的称谓，合称“桑麻田”。贵族与各级官僚也授永业田，数额远比农民大。永业田属私有田，可以

传给子孙，可以买卖。

⑪文明：谓文治教化。前蜀杜光庭《贺黄云表》：“柔远俗以文明，慑凶奴以武略。”

⑫武节：武德。使用武力应遵循的道义准则。《文选·张衡〈东京赋〉》：“文德既昭，武节是宣。”薛综注：“言文武之教，无处不临。”

七十二 光绪七年四月二十七戊午。

作唁竹筠[①]丁外艰[②]书，并撰其尊人宾谷[③]封翁挽联云：

乡里称善人，早谢科名付儿辈；

神仙正中寿[④]，先持幢节返真曹。

以白绫一丈书之。

【注释】

①竹筠：许景澄（1845～1900），原名癸身，字拱辰，号竹筠，一作竹筠。清浙江嘉兴人。同治七年（1868）进士。历任出使德国大臣、礼部侍郎等职。著有《许竹筠出使函稿》、《许竹筠诗稿》、《许文肃公集》、《奏疏录存》等。

②丁外艰：同“丁父忧”。遭逢父亲丧事。《旧唐书·王丘传》：“（丘）俄又分知吏部选事，入为尚书左丞，丁父忧去职。”

③宾谷：许丙熹，字宾谷。例贡生。许景澄之父。

④中寿：中等的年寿。古时说法不一。有言九十以上，有言八十岁，有言七十岁。有言六十岁。

七十三 光绪七年十月初六乙丑。

夜撰子缜[①]太夫人挽联，以绫二丈书之，云：

鞠帨早传经[②]，有犀奁伏女[③]，尚书掌家，孟子（太夫人为同县樊先生廷枚女，先生著有《孟子注疏校补》、《四书释地补》等书。其兄廷简有《尚书大传》辑本）佐熊丸，官阁[④]青灯，果见联题蕊榜[⑤]，归奉绯鱼[⑥]，上苑[⑦]春浓先小宋[⑧]；

津梁久从宦[⑨]，记鹣舫[⑩]零陵[⑪]，兰膳故治，花钗（夫人曾随其翁仙槎[⑫]先生永州太守任，及夫子海琴[⑬]先生兴化太守任）又燕翼[⑭]，湘江画篠，岂期未御版舆[⑮]，遽骖元鹤，广寒秋满待如来。

【注释】

①子缜：见六十二①。

②传经：传授经学。唐杜甫《秋兴》诗之三：“匡衡抗疏功名薄，刘向传经心事违。”

③伏女：西汉经学家伏胜的女儿。曾奉父命传《尚书》于晁错。《汉书·儒林传·伏生》：“使掌故朝错（即晁错）往受之。”颜师古注引汉卫宏《定古文尚书序》：“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晓也，使其女传言教错。”

④官阁：官署。清孙枝蔚《寓句容道观寄简王阮亭扬州》诗：“扬州官阁梅开未？正忆新诗远寄看。”

⑤蕊榜：传说中道教学道升仙，列名蕊宫。后指科举考试中揭晓名第的榜示为“蕊榜”。

⑥绯鱼：即绯鱼袋。指绯衣与鱼符袋。旧时朝官的服饰。唐制：五品以上佩鱼符袋，宋因之。唐韩愈《董公行状》：“入翰林为学士，三年出入左右，天子以为谨愿，赐绯鱼袋。”《续资治通鉴·宋高宗绍兴十二年》：“右承

奉郎、赐绯鱼袋张宗元为右宣议郎、直秘阁。”

⑦上苑：皇家的园林。南朝梁徐君倩《落日看还》诗：“妖姬竞早春，上苑逐名辰。”

⑧小宋：指宋祁。宋陈录《善诱文·活蚁魁天下》：“比唱第，小宋果中魁选。章献太后临朝，谓弟不可以先兄，乃以大宋郊为第一，小宋祁为第十。”

⑨从宦：指家属跟随在任内。清曾国藩《陈岱云妻易安人墓志铭》：“吾妻从宦五年，既殁而敛，求袒衣，无一完者，吾之贫可知也。”

⑩鹢舫：船。

⑪零陵：古地名。在今湖南宁远东南。相传舜帝葬于此。《史记·五帝本纪》：“（舜）南巡狩，崩於苍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为零陵。”

⑫仙槎：陶际尧（1788～1853），又名际清，字瞻云，号查仙，一作槎仙。浙江会稽人。嘉庆二十四年（1819）进士。官湖南常德府同知，尚未起行，适逢永州太守入觐，改调永州，继调常德。编有《会稽陶氏族谱》。仙槎疑为越缦笔误。

⑬海琴：陶良翰，字海琴，号邵庵，浙江会稽人。道光二十三年（1843）举人，官至福建兴化知府。工楷法，好诗。著有《求放心斋文》、《怡云精舍诗稿》。

⑭燕翼：指辅佐。《后汉书·郑兴传》：“昔张仲在周，燕翼宣王，而诗人悦喜。”宋陆游《逆曦授首贺太皇太后笺》：“坤厚资生，母仪燕翼。每道先朝之家法，助成圣主之性仁。”

⑮版舆：亦作“版輿”。一种木制的轻便坐车。《文选·潘岳〈闲居赋〉》：“太夫人乃御版舆，升轻轩。”李善注：“版舆，车名……一名步舆。”

七十四 光绪八年（1882）夏四月丙辰朔。

撰益吾[①]太夫人[②]挽联，以绫二丈书之曰：

茹蘗补彤编，溯一生画荻[③]劬劳[④]，合六堂[⑤]胄子[⑥]笙诗[⑦]，同斟寿斝[⑧]；

含饴[⑨]盼黄壤[⑩]，愿此后艺兰蕃衍[⑪]，继三世国师家法，追慰亲心。

【注释】

①益吾：王先谦（1842～1917），字益吾，晚号葵园，世称葵园先生。清湖南长沙人。同治四年（1865）进士。授国史馆编修、翰林院侍读、国子监祭酒、江苏学政等职。著有《新旧唐书合注》、《同治东华续录》、《虚受堂文集》等。

②太夫人：鲍氏（1808～1882），王先谦之母。湖南长沙善化县人。事详《越缦堂文集》之《王母鲍太夫人墓志铭》。

③画荻：宋欧阳修四岁而孤，家贫，母郑氏以荻管画地写字，教其读书。事详《宋史·欧阳修传》。后以“画荻”为称颂母教之典。

④劬劳：劳累；劳苦。《诗·小雅·蓼莪》：“哀哀父母，生我劬劳。”

⑤六堂：指明清国子监所设之率性堂、修道堂、诚心堂、正义堂、崇志堂、广业堂。

⑥胄子：国子学生员。晋潘尼《释

奠颂》：“莘莘胄子，祁祁学生。”

⑦笙诗：《诗·小雅》中《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六篇仅有篇名，而无文辞。宋朱熹于集传中称此六诗为“笙诗”。

⑧寿斝。祝寿的酒杯。宋苏辙《宣徽使张安道生日》诗：“从公淮阳今几年，忆持寿斝当公前。”

⑨含饴：谓哺育幼儿。形容亲子之情。清吴伟业《题钱黍谷画兰》诗之二：“北堂萱草恋王孙，膝下含饴阿母恩。错认清郎贪卧雪，生儿彊比魏兰根。”

⑩黄壤：犹黄泉。清洪棨园《悬乔猿·岛别》：“休思量，滩头戏嬉枝头望，故山风月任徜徉，只怕你主人不日归黄壤。”

⑪蕃衍：繁盛众多。清戴名世《祭钱云瞻文》：“方伯子侄极为蕃衍，而余辈外弟兄落落不过数人。”

七十五 光绪八年四月初六辛酉。

撰合肥相国[①]李太夫人[②]挽联，以绫书之云：

槐鼎[③]熊茵，甲第双迎武韩国[④]；

鞠衣[⑤]蜜印[⑥]，养堂专祭定夫人[⑦]。

上语用《旧唐书·李光弼传》语，李母，韩国太夫人李氏，而颜鲁公临淮武穆王碑言，太夫人为大将军武楷固之女，盖以同姓讳之也，与今事适合。下语用《晋书·列女传》虞潭母武昌侯太夫人孙氏事。余与敦夫、介唐、光甫、爽秋合送素幛挽联，报其去年十二金之赠也。幛题“帝问起居”四字。

【注释】

①合肥相国：李鸿章（1823~1901），本名章桐，字渐甫，一字子黻，号少荃，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清安徽合肥人，世人尊称李中堂，亦称李合肥。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淮军创始人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卒后谥“文忠”。著有《李文忠公全集》。

②李太夫人：李氏（1880~1882），清安徽合肥人。清道光十八年（1838）进士李文安之妻。李家人口众多，李氏勤于主内，其思想言行对李鸿章兄弟等为人处世产生过重要影响。其思想言行详见《李鸿章全集》（第九册）。

③槐鼎：比喻三公或三公之位。亦泛指执政大臣。槐，指三槐；鼎，国之重器，又有三足。《后汉书·方术传序》：“故王梁、孙咸名应图录，越登槐鼎之任。”

④武韩国：指唐李光弼之母。母李氏，有须数十茎，长五六寸，以子贵，封韩国太夫人，二子皆节制一品。光弼十年间三入朝，与弟光进在京师，虽与光弼异母，性亦孝悌，双旌在门，鼎味就养，甲第并开，往来追欢，极一时之荣。详见《旧唐书·李光弼传》。

⑤鞠衣：古代王后六服之一，九嫔及卿妻亦服之。其色如桑叶始生。《周礼·天官·内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褕衣、揄狄、阙狄、鞠衣、展衣、缘衣。”郑玄注：“郑司农云：‘鞠衣，黄衣也。’鞠衣，黄桑服也。色如鞠尘，象桑叶始生。”

⑥蜜印：用蜂蜡刻的官印。古时贵

官死后追赠爵位、职位时所用。《晋书·山涛传》："（涛）薨。……策赠司徒，蜜印紫绶，侍中貂蝉，新沓伯蜜印青朱绶。"

⑦定夫人：指晋虞潭之母。教子报国。卒谥定夫人。其事详见《晋书·列女传》。

附：俞樾《春在堂全书》载俞樾寿李太夫人七十联：起居八座，亦多寿、亦多男，先百花生日，祝慈荫长春，凤舞鸾歌，遍浙水东西、洞庭南北；文昌六星，有上相、有上将，以万石家风，佐熙朝景运，玉昆金友，比荀龙减二、贾虎增三。花下板舆来，自皖而两浙、而三吴、而潇湘洞庭，数千里瞻拜慈云，凤鸟舞、鸾鸟歌，颂无量寿佛；床头朝笏满，有子为宰相、为节度、为观察转运，五百年特钟间气，玉策贤、金策圣，作中兴名臣。（太夫人生六子。长君筱泉中丞方抚吾浙，次公少荃相国以大学士、肃毅伯督两湖，家门之盛甲海内。己巳二月三日，为太夫人七十生日。余与相国为甲辰乡榜同年，而又承中丞知爱，延主讲席，故为二联，一致中丞，一致相国也。）又代许信臣前辈作：入鼎鼐，出封疆，看膝前将相成行，武达文通，佐一代中兴大业；月初三，春未半，祝堂上佛仙齐寿，玉牙金齿，开八旬漫衍遐龄。

挽李伯太夫人联：贤母之名，定自朝廷，降明诏褒扬，荣在重重芝诰外；诸侯之孝，异乎士庶，赞庙谟挞伐，谋成五五垂庐中。（太夫人乃小荃制府、少荃相国之母也。光绪八年二月卒于两湖节署，特降诏书，有贤母之褒，海内荣之。时海外又小有龃龉，朝廷方倚相国为重，优诏夺情而相国固辞，未知能如所请否也。）

王堃《自怡轩对联缀语》卷上载，王堃挽李太夫人联：皖灵辉宝婺，钟郝垂型，教子成盖世勋名，南北丰功双督显；仙籍证瑶妃，蓬壶返驾，享年荷遐龄福禄，春秋颐寿九旬长。

李伯元《南亭联话》卷一载，李伯元代友挽李太夫人联：有令子为周室负扆之臣，聚天宠一门，八坐起居承爱日；维武昌是陶母安舆所莅，怅春晖三月，满城瞻望失慈云。

王闿运《湘绮楼日记》载，王闿运挽李筱泉母：慈云起南岳封中，酿作甘霖遍寰海；贤母数中兴第一，只凭俭德训家庭。

李篁仙《天影庵联语》载挽合肥李太夫人联：中朝首座太夫人，尊陪南岳，记春来桃熟，抠衣五莆堂前，犹询寿母起居，寝阁沉深低落日；当代高门旧名氏，亲叩西平，溯老去椿灵，酹酒百花洲上，重感使君恩遇，江楼凄恻送慈云。

翁同和《翁同和日记》载翁同和挽李太夫人联：八十三年，极人世富贵尊荣，不改勤俭行素志；大重一德，为贤母咨嗟震悼，要全忠孝济时艰。

七十六　光绪八年四月二十二日丁丑。

撰瞿子九[①]尊人春陔[②]年丈挽联云：

卅载溯兴廉[③]，盛年早谢朝班，蓬岛金莲看后耀（以辛亥举人官邢部主事）；

一编传却扫[④]，它日兼资国史，零

陵[5]银管续先贤（著有《扬州记》十余册，寇乱时由湘寓扬也，专志兵兴以来朝野事）。

即以屈绚布书致子九。

【注释】

①瞿子九：瞿鸿禨（1850～1918），字子九，号止盦。同治十年（1871）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历官翰林院侍讲学士、浙江学政，四川学政，刑部左侍郎，江苏学政，礼部右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等职。

②春陔：瞿元霖（1814～1882），原名纬，字仲望，号春皆，一作春陔，晚自号天逸老人。咸丰元年（1851）举人，官刑部主事。著有《苏常日记》、《天逸道人存稿》。

③兴廉：奉行廉洁。《宋史·欧阳守道传》："化之以廉，而彼不兴廉，吾惟有不贵难得之货、不厚无益之藏。"

④却扫：不再扫径迎客。谓闭门谢客。三国魏王粲《寡妇赋》："阖门兮却扫，幽处兮高堂。"

⑤零陵：见七十三⑪。

七十七 光绪八年五月二十二日丁未。

得周荇翁[①]书赠所书画纨扇一柄，楹帖一副。画作《春江夜泊图》，甚疏秀。楹帖集《汉书·刘向传》赞，《后汉书·郑康成传》语云：

直谅多闻，古之益友[②]；

经传洽孰，称为纯儒[③]。

老辈虚怀，惭愧无地，又以所著《汉书注校补》五册属阅，即作书复谢，犒使二千。

【注释】

①周荇翁：周寿昌（1814～1884），字应甫，一字荇农，号友生。清湖南长沙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进士。由编修累迁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光绪初罢官居京师。著有《思益堂集》、《汉书注校补》。

②直谅多闻，古之益友：语出《汉书·刘向传》："……呜虖！向言山陵之戒，于今察之，哀哉！指明梓柱以推废兴，昭矣！岂非直谅多闻，古之益友与！"

③经传洽孰，称为纯儒：语出《后汉书·郑玄传》："……玄质于辞训，通人颇讥其繁。至于经传洽孰，称为纯儒，齐、鲁间宗之。"

附：朱一新《拙盦丛稿》载朱一新挽周荇农联：刘臻汉圣，高密经神，书成谁与编摩，记曾闻大义微言，吾无隐乎尔；洛社耆英，韩文山斗，公去亦何所憾，只留得感恩知己，下以恸其私。

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载曾纪泽周挽荇农挽联：得英才而教育，化雨及时，经公丈席玉成，桃李春风多快士；悲父执之凋零，疏星向曙，矧我瓣香师事，蒹葭秋水正伊人。

七十八 光绪八年六月二十五日己卯。

撰李若农[①]师太夫人挽联，以绫书之云：

彩服[②]换銮坡[③]，常虑黄中[④]先母老；

珠幢返兜率[⑤]，先看宝志抚孙来。

【注释】

①李若农：李文田（1834～

1895），字畬光，一字仲约，号芍农，别号若农，广东顺德人。清咸丰九年（1859）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官至礼部右侍郎，江西学政、翰林院侍讲学士、礼部左侍郎等职。晚清著名史学家、金石学家、书法家和藏书家。著有《元秘史注》、《元史地名考》等。

②彩服：犹彩衣。指孝养父母。清周亮工《延医不得寄舍弟靖公》诗：“乱里弓衣怜幼弟，危途彩服愧双亲。”

③銮坡：唐德宗时，尝移学士院于金銮殿旁的金銮坡上，后遂以銮坡为翰林院的别称。清赵翼《彭芸楣尚书挽诗》：“同试銮坡赋独工，清班扬历到司空。”

④黄中：贾黄中（945～1001），也称黄中，字娲民。沧州南皮人。后周显德三年（956）进士。授职校书郎和集贤殿校理，又提升为著作佐郎。常担忧自己先母而老。后卒，其母果无恙。详见《宋史·贾黄中传》。

⑤兜率：亦称“兜术天”。梵语音译。佛教谓天之第四层叫兜率天。唐白居易《祭中书韦相公文》：“灵鹫山中，既同前会；兜率天上，岂无后期?”

七十九 光绪八年九月初二乙酉。

撰羊敦叔[①]母许太夫人挽联云：

来以养日[②]，去以景风[③]，阅历五朝寡高行；（年八十三，生卒皆于五月。）

如柏之贞，如松之寿，哀荣八坐太夫人。

以重绫一丈六尺书之。

又撰王可庄[④]修撰尊甫子恒[⑤]比部挽联云：

长我仅三年，有子有孙，喜见大魁先法护（年五十七，有二子，次子仁东[⑥]亦举乡科，有孙七人）；

题名同两世，善承善教，恨无一面识荆州（比部之父尚书文勤公[⑦]与族父芸圃[⑧]观察公，道光己丑同年翰林）。

以屈绚布书之。

【注释】

①羊敦叔：羊复礼（1840～?）字干生，一字敦叔，又字敦夏，号辛楣、心梅，又号褆庵，海宁人。同治三年（1864）举人。官至广西泗城府知府。著有《海昌诸家诗文钞》、《六唐人斋藏书录》、《蚕桑摘要图说》、《辛楣诗钞诗余》等。

②养日：指夏至。代指五月。白昼最长，故称。养，通“羡”。《大戴礼记·夏小正》：“时有养日。养，长也。”

③景风：八风之一。南风。代指五月。唐李白《过汪氏别业》诗之二：“星火五月中，景风从南来。”

④王可庄：王仁堪（1849～1893），字可庄，一字忍庵，号公定。福建闽县人。清光绪三年（1877）进士。授职翰林院编修。历官内阁中书、山西学政、江苏苏州府知府。

⑤子恒：王传璨（1826～1882），乳名兑，字流谦，一字子恒，福建闽县人。福州府学附生，议叙主事，籤分刑部奉天司行走，诰授中宪大夫。

⑥仁东：王仁东（1852～1918），字旭庄，一字刚侯，晚号完巢。福建闽县人。光绪二年（1876）举人。初任内阁中书，后官南通知州、江安督粮道、苏州粮道兼苏州关监督。著有《完巢剩稿》。

⑦文勤公：见五十⑩。

⑧芸圃：见五十⑨。

附：胡君复《古今联语汇选二集·哀挽二》载：闽县王可庄修撰仁堪，视学山西，其封翁殁于都门。修撰闻讣，凡五日奔一千一百里，归治其丧。屠伯熙侍读挽联云：太行匹马，奔丧五日而来，有子如斯，先生不死；沧海横流，抗论千秋之上，其人不作，吾辈焉依。

八十 光绪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甲辰。

撰桑文恪[1]挽联，以细氍布书之云：

扬历[2]亚三孤[3]，正逢苹宴重开，又见文孙[4]绳祖武[5]；

神明阻百秩，匪特梓乡失望，亦嗟畿侑[6]陨灵光。

【注释】

①桑文恪：见六十八①。

②扬历：谓显扬贤者居官的治绩。后多指仕宦的经历。清龚自珍《〈阮尚书年谱〉第一序》：“公扬历清华，洊升卿士，熟于载笔之礼法，娴于内庭之故实。”

③三孤：指少师、少傅、少保。《书·周官》：“少师、少傅、少保曰三孤。”孔传：“此三官名曰三孤。孤，特也。言卑于公，尊于卿，特置此三者。”《明史·职官志一》：“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正一品；少师、少傅、少保为三孤，从一品。掌佐天子理阴阳，经邦弘化，其职至重。”

④文孙：见四⑤。

⑤绳祖武：谓先人的遗迹、事业。武指步武，足迹。《诗·大雅·下武》：“昭兹来许，绳其祖武。”郑玄笺：“戒慎其祖考所履践之迹。”

⑥畿侑：亦作畿辅，京都附近的地方。《南齐书·王融传》：“若来之以文德，赐之以副书，汉家轨仪，重临畿辅，司隶传节，复入关河。”



绍兴陶堰秋官里牌坊研究

□ 陆菊仙

绍兴市区东16公里、与上虞市毗邻的历史文化古镇，乃绍兴县陶堰镇。早在2500年前的春秋时代，越国重要的水上运输热线——“山阴古水道”就横穿镇境。东汉永和五年（140），会稽太守马臻构筑鉴湖，不仅使这里成为我国第一座人造水库的组成部分，还因堰北有陶姓定居，便以“陶家堰”来命名这段湖堤堰坝，简称陶堰，并一直沿用至今。南宋鉴湖湮废后，境内平畴沃野，河湖密布，成为绍兴著名的鱼米之乡。明清时期通过科举，这里孕育出了一批高官重臣。近现代更是名士俊彦迭出，享誉海内外。陶堰因而荣戴“江南人才名镇”[①]桂冠。而这一桂冠的获得，有赖于其下辖的陶堰村陶氏家族的杰出贡献。

这个家族自元末从江西浔阳迁至陶堰堰南定居。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陶在铭等编纂的《会稽陶氏族谱》全面记录了陶氏家族迁徙、繁衍、发展和科举兴旺的历史。其始迁祖陶岳，字宗杨，生五子。其三子名义，字子宜，明代诸生（秀才），后赴台州任鹭州书院山长（校长），病故后葬临海大塘湾。成化元年（1465），六世孙陶性中举，开启了陶氏科举中式的序幕。此后陶氏的莘莘学子在“学而优则仕”的封建时代，把考状元作为跻身仕途的唯一路径。十年寒窗，最终考取功名的就有上百人。统计数据表明，陶氏在明清两朝先后有42人中进士，109人中举人（其中42人联捷为进士），涌现了多位吏部、兵部和礼部尚书等中央高级官宦，其他各级官员则遍布全国各地，成为会稽名副其实的望族。正所谓“十年窗下

①朱顺佐、张能耿：《江南人才名镇——陶堰》，浙江大学出版社1993年5月第1版。

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族人们为了光宗耀祖，更为了激励后辈在科举路上继续前行，经地方政府报请、皇帝恩准而建造的牌坊多达40余座（不以单体建筑计），遍布绍兴城乡。而名闻遐迩的秋官里牌坊（见图1）便是其中的5座，它们是陶氏家族取得科举辉煌成就的实物见证。

一、秋官里牌坊的基本情况

秋官里牌坊（文保单位名称为“秋官里进士牌坊”）位于陶堰镇陶堰村西上塘自然村，现为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以单体建筑计算，它由1座主牌坊和2座副牌坊组成，平面近似反向的“凹”字形，系全石仿木结构，会稽石质。

主牌坊，里人称之“秋官里坊”，坐北朝南，为四柱三间三楼式，方柱委角。每柱下端有两块枷锁形的夹柱石，凸起部分雕饰成覆盆状。通面阔7.9米，通高约9.5米；歇山顶，正脊两端饰鸱吻，屋面雕饰瓦垅、勾头、滴水和戗兽，并用斗栱承托。正楼平身科设五铺作斗拱四攒，角科设二攒。东西次楼平身科设五铺作斗拱二攒，角科设一攒，象鼻昂，翼角起翘。龙门枋局部雕刻莲瓣纹。顶头拱承托镂空卷草纹雀替。

明间正楼脊下设双龙护卫的圣旨牌一块，其上阴刻竖书楷体“弘治三年，赐进士出身”字样。字板南面阴刻横书楷体“秋官里”三个擘窠大字；上款：“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谢迁书，巡按浙江监察御史陈铨，浙江布政司左参政欧信，浙江按察使司佥事郝天成、陈烜”；下款：“绍兴知府佟珍，同知周惠，通判张骐、邵遵道，推官张正学，大明弘治十四年二月二十日立”。字板北面阴刻横书楷体“湖山毓秀”四个擘窠大字。上款：“赐进士第知会稽县事杨益、县丞李锐、主薄陈瑞、典史熊昌、儒学教谕陈梦麟”；下款：“赐进士知山阴县事杜宏、县丞杨宽、主薄徐鼐、典史丁顺忠”；两字碑上、下落款均为阴刻竖书楷体。补间铺作为一斗三升斗拱四攒。上下额枋分别雕刻牡丹花、卷草、祥云和狮子嬉球、龙首及鲤鱼跳龙门等图案。



图1

东西次间上下额枋分别刻有仙鹤、祥云和瑞菊、卷草、灵芝和麒麟、奔马等图案。

副坊位于主牌坊的东

西两边，与主牌坊相距约12米，里人分别称“下马牌坊”和“上马牌坊”。均为两柱一间，面宽4.6米，残高5.1米，方形委角石柱。龙门枋局部雕饰变体莲瓣纹，其下依次为写字板、下额枋和顶头拱承托的卷草纹雀替。两坊东西两面均有文字和图案。

东副坊（下马牌坊）：东面字板上阴刻横书楷体“乙酉科文魁陶性乙卯科文魁陶璐”十四个大字，上额枋高浮雕仙鹤祥云图案，下额枋当中圆雕狮子嬉球图案，两侧浮雕龙首。西面字板上阴刻横书楷体“弘治乙卯科解元陶谐”九个大字，上下额枋浮雕仙鹤牡丹图，下额枋则浮雕祥云奔鹿图。

西副坊（上马牌坊）：东面字板上阴刻横书楷体“庚戌科进士陶怿丙午科进士陶谐”十二个大字，上额枋刻有凤穿牡丹图，下额枋刻有龙头、狮子嬉绣球图案。西面字板上阴刻横书楷体“丙午科乡进士陶谘陶诰”等字，上额枋雕有仙鹤祥云图，下额枋则刻有祥云、麒麟和凤凰嬉戏图。

二、牌坊的时代、名称和主人

1.“秋官里坊”。该牌坊建于明弘治十四年（1501）。其依据有二：一是牌坊上明确刻有建造年代：“弘治十四年立”。二是《会稽陶氏族谱》卷二十九《祠宇坊表园亭志》中对“秋官里坊”名称、建立年代和为谁而立也有载明：“秋官里坊，宏（弘）治十四年建，为刑部主事陶怿。”陶怿，字习之，号克斋。成化七年（1471），浙江乡试第五十五名。弘治三年（1490）礼部会试第二百三十六名。殿试钦定二甲（第八十一名），赐进士出身，[①]故弘治十四年立的牌坊刻有“弘治三年，赐进士出身”字样。据明代科举制度，会试中式的贡士，须参加由皇帝主持的殿试以获得出身。殿试以一、二、三甲录取。一甲只取三名，分别称状元、榜眼、探花。状元被授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被授予翰林院编修。二、三甲进士，考试合格者，称庶吉士，在翰林院学习。未考取庶吉士的进士，则候补六部任给事中、主事和知县等职。陶怿后授刑部主事。在任期间，秉公执法。“戚里中有杀人者，同列宽之，怿竟正其罪。累迁福建佥事。逆瑾邀赂，怿叹曰：‘不义富贵，于我如浮云。’遂以广东参政致政，归所。著有《克斋稿》。”[②]陶怿进士牌坊名“秋官里坊”，因“秋官”之名源于儒家经典《周礼》记述的“六官”，其中秋官掌刑狱，故刑部被称为“秋官”；而陶堰村是陶怿的故里，故得名。另外，笔者忖度，“秋官里”三字，无声地告知过往行人，这里是当朝或曾为刑部主事陶怿的家乡。陶氏家族那种自豪和骄傲之情，可谓表露无遗。

两座副坊的名称和建造年代，虽然在牌坊中没有明确，但上述陶氏族谱则有确切记载。如东副坊的东面和西面，

①天一阁博物馆:《天一阁藏明代科举选刊·弘治三年进士登科录》,宁波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
②清李亨特、平恕等：《绍兴府志》卷四十八《人物志八·乡贤志五》，乾隆五十七年（1792）刊本。



图2



图3

分别称为“亚魁坊”、“进士坊”（见图2）；西副坊的东面及西面分别称为“解元坊”、“乡进士坊”（见图3），皆建于明正德十一年（1516）。

2.“亚魁坊”。此坊为陶性、陶璐所立。亚魁，查《中国科举辞典》：乡试第一名解元，第二名亚元，三至五名曰经魁，第六名叫亚魁，第七名以后统称文魁。但《会稽陶氏族谱》卷三十二《科甲编年考》（以下各坊主人的科举及任职情况皆据此）：陶性和陶璐乡试中式的名次均为第九名。上述家谱以“亚魁”相称，是无意错刻，还是溢美之辞，见仁见智。而坊中本有“文魁”二字，故应称“文魁”坊。陶性，字复之，号复斋，明成化元年（1465）乙酉科乡试第九名，是陶堰村首个走上科举之路者。但他于中举以后的二十一年间，七次赴京参加会试，均名落孙山，最后抑郁而死。陶璐，字世珍，号葛山，弘治八年（1495）乙卯科浙江乡试第九名，官至湖广鄖县知县。在任上，不以溜须拍马媚上级，不以敲诈勒索苦百姓。因对皇宫大兴土木，颇有微辞，被贬职回家。

3.“解元坊”。此坊为乡试中荣获“解元”衔的陶谐所立。陶谐（1474～1546），字世和，别号南川。弘治八年，乡试中式第一名，获“解元”衔。陶氏家族首次有士子获此殊荣。

4.“进士坊”。此坊为陶怿、陶谐所立。陶怿科举登第情况详见前，此不赘述。陶谐于获“解元”衔的第二年，殿试，登朱希周榜，赐进士出身，为陶堰村第二位二甲进士，选庶吉士，授工科给事中。正德改元，刘瑾〔（1451～1510），陕西兴平人，明武宗时的太监。从正德元年（1506）到五年，操纵朝政，是明代擅权乱政最严重的宦官之一，有“立皇帝”之称，后被凌迟处死。〕乱政，上疏请论其罪，谪戍肃州。刘瑾伏诛，始释还乡。嘉靖元年（1522）复官，任江西按察司佥事，转

河南管河副使。历河南左右布政使，擢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赣、汀、漳军务。寻迁兵部右侍郎，总督两广军务。病卒，赠兵部尚书。隆庆（1567～1572）初，谥庄敏。[①]有《南川漫游稿》十卷，嘉靖十二年刻本，藏上海师范大学图书馆；《陶庄敏公文集》八卷，藏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

5.“乡进士坊”。此坊实为举人坊，因举人别称乡进士，为陶谘、陶诰所立。陶谘，字世臣，号莲塘，成化二十二年（1486）乡试，中第五十六名举人，官至江苏宜黄知县。陶诰，字世荣，号东洲，与陶谘同一年中举，列第八十一名，官至江西浮梁知县。

综合上述情况，我们发现陶堰陶氏于正德年间所立的牌坊，主要记录了其第六代和第七代考取进士、举人的情况，称得上是对本族士子取得功名后的阶段性总结。它有如下特点：两座副坊实际有四个坊名，以科举中式名次或情形相同归为一坊旌表，不能归类的，则单独设坊褒扬。如：陶性、陶璐均为浙江乡试第九名，陶怿、陶谐均列二甲进士，陶谘、陶诰均为同科举人，遂分别合坊旌表。陶谐乡试获“解元”衔，因当时无人与之匹敌，故单独立坊褒扬。如此这般，均体现了当时的地方政府和陶家长辈的良苦用心。

三、秋官里牌坊的基础及建筑形态

秋官里牌坊的立柱周围均无高大的石材夹护，（本县柯岩街道秋湖村、绍兴市镜湖新区西湾、王阳明故居、上虞市松厦镇陆家村、下管镇西桥村、上浦镇渔家渡等地的明代石牌坊也无夹柱石），为何在风雨中屹立500余年依然岿然不动？两座副坊的现状是否就是原貌？带着这两个问题，本人曾赴现场作了调查。

仔细观察“秋官里坊”的4根立柱，其下端均清楚呈现了用长方形厚石板夹住石柱的做法（形似枷锁），它与四周的地面在同一个水平面上，中间部分高于地面约0.10米，雕刻成覆盆的样式，起到夹护立柱的作用。两座副坊的立柱周边已被现代混凝土地面覆盖，故无法了解其做法是否与主牌坊一致。为此，笔者请教了西副坊边上的住户——现年64岁的陈锦华老人。据他告知，两座副坊柱子下端也有夹护的石块，大小、做法与“秋官里坊”基本一样。同时，他还告知笔者，西侧距他家50米远的桥头原有2座四柱三间明代石牌坊，大小、做法与秋官里牌坊相似，也没设抱鼓石。“文革”期间，生产队组织人员把它们拆毁了。在挖掉牌坊基础时，他发现每一根石柱下面有1.5×1.5米见方、长约2米、排列密集的松桩基础，松桩上面再压一块后约0.35米的地盘石（柱顶石），此石离地面约有0.5米，四根石柱被深埋在这个基础上，再被形似木枷锁、厚0.5～0.6米的大石头夹住。地面以上的石柱，用梁坊联结，柱顶再压天盘石（龙门石），这样再大

①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零三《列传》第九十一。

的台风也吹不倒了。他说虽然秋官里牌坊的基础没有动过，情况不是很清楚，但同为明代建造的石牌坊，距离又这么近，估计做法是应该是一样的。听了他的介绍，再联系绍兴一带造桥时，为了使桥基牢固，均把松桩深深地打入地下，上压水盘石的做法（如前几年笔者所在单位维修陶堰泾口大桥时，也发现水盘石下密布大量松桩）。故笔者觉得他的话，还是可信的。

另外，笔者还向陈锦华请教了2座副坊上面是否有檐楼（石屋顶）的问题，开始回答没有看到过有楼，后肯定地说龙门石上没有东西（屋顶）。但对于这个答复，笔者不敢苟同。理由如下：

1.牌坊，作为一种寄寓人们多种情感和特殊象征意义的建筑，分为冲天式和牌楼式两种。冲天式，也叫柱出头式。顾名思义，这类牌坊的立柱是高出龙门枋的，如本县齐贤镇柯北村建于明代的谈氏节孝牌坊。另一类石柱子不出头、上盖楼、最高峰是明楼正脊的，称为门楼式，如本县柯岩街道秋湖村的秋湖石牌坊。从严格意义上讲，冲天式应称为牌坊，门楼式则称为牌楼，现统称为牌坊。从秋官里两座副坊的现状看，石柱没有高出龙门石，即没有做成冲天式牌坊，那它们应该是牌楼的样式。

2.上虞市上浦镇渔家渡村的“榜眼”、“会元”牌坊可以证明秋官里牌坊应为牌楼式的推论。渔家渡村的“榜眼”、“会元”牌坊，建于明正德丁卯年（1507），为二柱一间门楼式，通高6.50米，跨度3.50米，柱下端无抱鼓之类石材夹护。龙门坊上立“榜眼”、“会元”二字石碑，坊下有上下额枋及写字板，额枋上雕刻龙、凤、狮子和牡丹等纹饰。[①]正德为明武宗年号，正德丁卯年即正德二年。而距它百余里的秋官里副坊，建于正德十一年，即晚建9年。现比较两者异同，秋官里副牌坊除了龙门坊以上没有屋面和斗拱外，其结构和纹饰几乎与渔家渡的“榜眼”、“会元”牌坊一致。籍此，笔者认为，渔家渡村与陶堰村在明代同属会稽府，那么在同一个地区，相同时代建造的科举牌坊，即便不是同一批工匠的杰作，但应该也会有许多共性的东西；很难想象在上虞渔家渡是两柱一间门楼式牌坊，而绍兴秋官里建立的牌坊既不是冲天式，也不是门楼式，而是做成门洞式。由此推测，秋官里副坊的形制应与渔家渡村的“榜眼”、“会元”牌坊一致。

3.清光绪《会稽陶氏族谱》载明秋官里两座副坊分别为“亚魁坊”、“解元坊”、“进士坊”和“乡进士坊”。试想，如果副坊没有做成门楼式，那这些坊名就无处可表；如果牌坊上没刻“亚魁”、“进士”等名称，则上述家谱就无从知晓上代的科举情况，并准确地加以记录。因此，笔者以为，目前两座副坊龙门坊以上部分结构，因遇天灾人祸遭毁，今天所见的是它的残貌而已。

①上虞市文物保护管理所:《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不可移动文物登记表·渔家渡石牌坊》,2008年2月登录。

四、秋官里牌坊的文物价值

秋官里石牌坊是绍兴境内保存不多的科举牌坊之一，是研究明代政治制度、科举制度、石作工艺和书法特色的实物例证。它的价值和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为研究明代地方衙门设置、官职制度和官宦情况提供了实物资料。秋官里坊清楚地表明了明代中央和地方行政机构设置情况，记录了弘治十四年浙江省、绍兴府、会稽县和山阴县的任职官吏。当时中央设三公三孤、内阁、六部和监察御史等，地方设置承宣布政使司（俗称省）、府、县三级。[①]如“秋官里”三字，为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谢迁亲书。跟着谢迁署名的有中央和地方的官员。中央官员有代表弘治皇帝巡按浙江的监察御史陈铨，省级官员有浙江布政司左参政欧信，浙江按察使司佥事郝天成、陈烓，绍兴府有知府佟珍，同知周惠，通判张骐、邵遵道，推官张正学。

背面“湖山毓秀”四字，上为会稽县官的落款，下为山阴县官的款落。如会稽知县事杨益、县丞李锐、主薄陈瑞、典史熊昌、儒学教谕陈梦麟，山阴知县事杜宏、县丞杨宽、主薄徐鼐、典史丁顺忠。因此，作为多种文化象征的牌坊，在一定意义上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载体；也因为牌坊上为皇帝恩准、下有中央及地方官吏的出面树立，从而象征了官本位的传统社会中科举入仕的崇高地位和带给整个家族的无上荣光。

2.秋官里牌坊记录了明成化至弘治年间陶性等六人的科举情况，形象地反映了封建时代众多士子在博取功名的路上，从秀才开始，到考取举人、考取进士、再立牌坊的人生追求和肩负着光宗耀祖的神圣使命。“拔身泥滓里，飘迹云霄上”，科举中式的士子们“通过立牌坊完成由‘白衣’到‘公卿’的身份转换，彰显社会地位的迅速提升和家族荣誉的发扬光大。”[②]

3.秋官里牌坊造型庄严巍峨，气势恢宏，对研究明代牌坊构筑技术具有重要价值，是明代高超的石雕技艺和人们对科举登第热切期盼的生动写照。牌坊上，古代工匠通过圆雕、浮雕和透雕等手法形象展示了凤穿牡丹、仙鹤飞翔、麒凤嬉戏、奔马拱日、狮子舞球和鲤鱼跳龙门等欢快场景，其寓意或富贵吉祥、或长乐高寿、或太平盛世或科举入仕、青云直上。其隽永的寓意，体现出古代人们“学而优则仕”、光耀门第、荣华富贵的良好愿景。

牌坊上由谢迁等人题词，皆用台阁体书就，结构稳健，典雅庄重，清秀婉丽，雍容华贵，使书法艺术与牌坊造型、瑞兽名花等雕刻图案有机结合，给人以强烈的视觉震撼。

①左言东编著：《中国政治制度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7月第1版。
②冯帅章：《谈牌坊中的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国社会科学报》第175期。

李慈铭年谱（续十）

□ 傅振照



五十岁

光绪（戊寅）四年（公元1878年）

先生自仲弟卒后，痛知自责，深感读书四十年，余“窃官铜臭”，虽穷甚，而计年“酒食声色”之费不下百金。弟以馁死钜痛之日，余尚“征逐酣饮，流荡不止”，不以自力，靠典质借贷，倚赞友资助过活。因此从这年开始，有所自律，有所振作。

正月初一日，辨“说”字。“《论语》开卷：‘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喜悦之悦，本作说。《说文》说，说释也。说释即悦怿，此为第一义，而以谈说为第二义，本无两音。”并谓“以上

两条皆极浅，而人多不察，今日亦开手记之。”

初三日，为“立春”日，作《戊寅第三岁日立春口号》：

入年三日便交春，綵胜桃符不觉贫。
爆竹暖催梅萼放，烛花红映菜盘新。
侍郎分俸能充馔[①]，中舍贻醪足度旬[②]。
五十尚贪童戏法[③]，不须藜杖强扶人。

初四日阅《论孟校戡记》、理书籍。阅马卓吾《目耕贴易说》。“马氏意主博览，所采均宋儒说，而大旨归于考据，虽心得者少，亦颇有所折衷。计《易》三卷、《书》三卷、《诗》十卷、《周礼》九卷，共二十五卷。盖亦未为完书也。”

初七日，阅胡伯敬《说文管见古韵论》，书《说文释例》书跗。得诗二首：

人日至晚遇雪喜赋[④]

草堂人日正停笺，喜见梅花趁雪天。
三径渐看成月色，万家从此起炊烟。
久劳玉御修清醮，深望珠塍报有年。
为想瑶池王母宴，不誇琼圃对神仙。[⑤]

又戏为人日雪（仿唐人艳体诗将寄子宜、云门、彦清、子缜和之）

锦屏宝帐贴人忙，微雪春生白玉堂。
胜裹金花添冷艳，钗头綵燕飐清光。
定知絮入椒盘咏[⑥]，却恐梅迷钿额妆。
闻道灯山新上色，五云楼阁在微茫。

十六日，先生考“莧”、“苋”之误。“《易》夬莧陆夬夬。虞氏注：莧，说也，读如‘夫子莧尔而笑之莧’。张氏文氏《周易虞氏义》云：字当作莧，今作艸下见，传写误耳。案：张说是也。”详见《日记》第7738～7740页。结论是：“《易》之作苋者，古文马、郑皆传《费氏易》，费氏本以古字号《古文易》（见《经典释文序》，录《隋书·经籍志》），王弼亦用《费（氏）易》。自江左以来，承用《王易》，故陆氏先用闲辩一音以苋为正文也。其作莧者，今文盖施孟相传如是。虞传《孟易》故所据本作莧也。苋训艸，莧训说，各自一家之言，虞义亦颇近迂曲，而《论语》本作莧尔，今作莞尔，无有从艸下见作苋尔者，此学者所当分别也。今陈氏《论语古训》、翟氏《四书考异》、阮氏《论语校勘记》、黄氏《论语后案》诸书作苋，皆非。”

十九日，得词一阕：

醉蓬莱[⑦]

正落灯风里，花缬催红，柳羙回绿。韶昼初长，趁小窗幽独。扶杖相寻，白须红舄，款閒门修竹。乳拍糕团，密煎瓜豉，钉盘牙蔌。

可识今朝，上京燕九，多少香车，凤城西逐。拣取双枝，占春风茅屋。袖翠衔香，脸霞上酒，映梅花如玉。可惜

①侍郎伯寅，清风廉洁，分俸接济我贫。
②中书舍人牧庄屡送酒醪。
③指二十四孝中老莱子作童戏娱父母。
④比岁大祲，忧旱方甚，近得雪三次矣。
⑤李峤《人日遇雪应制诗》：“即此神仙对琼阁，何湏辗迹向瑶池”句。
⑥唐崔日用《人日诗》：“金屋瑶匡开宝胜，花笺綵笔颂春椒”句。
⑦“醉蓬莱”，词调名。又名《冰玉风月》、《雪月交光》。此词是燕九节，偕秋碧老人，招钱郎秋蒌、朱郎霞芬小集寓斋。薄暮，霞芬为朱邸追入城，故有曲终之句。

匆匆，不教留看，画帘红烛。

二十一日，阅《目耕贴》中诗说，“虽亦每及宋儒之说，而辨驳为多，尤能时举三家，申明郑义，较之《书》、《易》为长。惟如欧阳公之谓诗，有删句、删字，王柏之割配《周南》、《召南》，此汪容甫所谓愚诬之甚者，可不必复论者。段氏《诗》、《经》、小学，简核精深，治诗者不可不读。然如归宁父母之“归宁”二字之释，或则迂曲，或为汉学之累，以致招妄人排击。

二十三日夜阅段氏《古文尚书撰义》。“此书训诂纷纶，可谓经学之窟，惟必分今文、古文，凿凿言之，且谓汉、魏以前，欧阳、夏侯《尚书》无今文之称，孔安国所传《尚书》亦用今字。《说文》所载《尚书》古文，马、郑、王本皆无之，俱近于任意而谈，意过其通，反为敝也。臧拜经言、钱竹汀氏有签记颇多，惜不得见之。”此种治学态度实为世人楷模。

二十四日抄段茂堂《戴氏声类表》、《声韵考》两序于《微波榭刻本》中。次日又抄其《明世宗非礼论》第四首，皆论后汉世祖立四亲庙事，其言颇有踳驳处，为之辨正，存《萝庵日记》中，后当别为一文著之。

三十日，对于《檀弓》“舜葬于苍梧之野，盖三妃未之从”事作了考订，以刺房官某翰林、御史周星誉不读书妄斥之，而不知《礼记》别本有三妃之说，可笑可卑。

二月三日夜作书致彦清并送彦清归里诗二首。

（一）

天涯相惜鬓丝斑，送尽穷途旅客还。
贫里向人皆白眼，梦中何处是青山。
独支老病沧桑局，强附穷愁著述间。
此后酒炉应更寂，好花谁与一开颜。

（二）

此去江南水接天，故乡归及治春先。
酒香箫鼓斜阳社，人影烟花上巳田。
羡尔东皋携眷属，几时北郭续因缘。①
练群少长俱无恙，孤负今朝药玉船。②

此后，陆续阅校《北史》、《魏书》、《北齐书》，还杂校《吕氏春秋》、《淮南子》、《韩非子》、《战国策》诸书，参以《史记》。择要录之：

十三日，《北史·虞翻传》：“翻议明堂、辟雍事引郑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一室也，合于五行之数。《周礼》依数以为之室，本制具存，是五室也。于今不同是汉异周也，汉为九室略可知矣。”却因《北史》随意删去词句，往往造成后人不可解读。二十六日《周书·宇文愷传》明堂建于汉平帝元始四年八月。汉武帝所建明堂在汶水之上，乃为宗祀。此说较准确。

二十日夜，校阅《北史》、《北齐书》及《魏书》。订正《魏书》序传、顿丘《李氏家传》、《北齐书·高昂传》、《北齐书·赵彦深传》、《北齐书·慕容俨传》、《北齐书·元孝友传》、《魏书·李顺传》后附《李同轨传》等，

①君世居绍兴昌安门外，为越之北部，乱后寓皋埠（步）。
②东坡二月三日《宴客诗》：“试开云梦羔儿酒，快泻钱塘药玉船”句。

错讹多甚，失载亦不少，读史者当认真对照改正之。先生在此率先提出“中国人别称汉人起于魏末北齐”，值得注意。详见《日记》第7782～7789页。

三十日，《北史》校阅已略讫。猛记起邢劭传云：“劭见人校书，笑曰：‘何愚之甚，天下书至死读不可遍焉，能始复校此。’李孝贞传云，孝贞迁蒙州刺史，自此不复留意文笔，人问其故，慨然叹曰：‘五十之年倏焉已过，鬓垂素发，筋力已衰，宦意文情一时尽矣，悲夫!”先生感之，“呜呼，余已至元操之年，安得不思子才之语。早衰多病，储书尽焚，饥馑荐臻，旦夕莫保，劳精敝神，果何为乎?”

三月初一日的种树诗，似乎回答了“果何为乎”?

戊寅春日种树诗

我生喜种树，隙地常整治。
赁庑得一亩，手自开町畦。
土瘠苦难活，巡行日培滋。
瓶罍或亲抱，芜蓼加芟夷。
今岁值大浸，柴立长苦饥。
质衣尚为此，栽植盈阶篱。
山桃亦已华，水杨初含荑。
杏李半坼萼，红白何离离。
丁香吐紫蕾，寿坛妩黄蕤。
海棠孰夹侍，樱桃与栾枝。
欣欣向春暄，抚之殊自怡。
一年几辛苦，所眄花开时。
此得岂偿失，暂乐能忘疲。
虽云费日力，聊以息我机。
万物遂生意，四时念功施。
无地得自效，吾心自孜孜。
作诗念同志，此事非荒嬉。

初二日，“闻山西、河南自去冬己人相食，山西一人仅易钱一百四十。罗嘉福被檄往襄振（赈）务，行至中途，其子忽不见迹，已为人所食矣。黄贻楫襄赈河南，偶出潜访利弊，即被拴觧衣将刦，黄力自白，且出所裹文卷，久之始得释。近日河间亦已食人。且闻陕西商州、河南邓州俱已民变，陷城潼商道，谢质卿被戕。……山西朔州回民为变。”对此，“枢府诸臣不特置若罔闻，且重怒言者，黄体芳、张观准皆得谴，张佩上疏争之，不报。矫天疾威，彼何人哉。”足见先生对民生之关心。

初九日，终日校《魏书》，“并以脱笔揭檗，凡卷数、纪、传、志，分数传中人名及附传者，皆一一标出之，以便检阅，计作字数千矣，甚劳心力，然不知疲也。”

十二日，“比日复校《北史》及《魏书》，积习性成，不能自已，亦以消遣穷愁耳。”对《尔朱荣传》中说其妻为北乡郡长公主、对《魏书·皇后传》孝文昭皇后等历史事实都作了详明考证，见《日记》第7813～7817页。

二十日，得词两阕。说是“无憀之思”，实是“有意之寄”。

暗香[①]

玉梅乍落。凭嫩苔绣遍，晚风帘幕。唤起情魂，重取清泉与轻濯。携向

①词调名，又名《红香》、《红情》、《晚香》。原词为咏梅。此是因以瓷盘蓄文石、清泉，取梅花浮之，为几案之玩。

明窗绮供，都不美、金床银凿。试映取、白石粼粼，何似在邱壑。

依约，梦痕昨。记竹下水边，几回行药。暗香细嚼，频照寒流数红萼。谁想盈盈斐几，还暂试、影娥池阁。看荡漾，春去也，绮情自讬。

疏影[①]

盘心浸碧，又纤枝散遍，绛英珠缬。可是双成，香唾吹来，犹带露华消息。银瓶怕损累盈影，且伴到、琉璃屏格，待清痕一试凌波，照见玉容明灭。

还似年时旧梦，玉妆成倚镜，相对愁绝。钿杂风前，略整钗梁，却恐珊瑚敲折。回头又逐东流去，祇检取、琼奁花叶。误认将、一幅留仙，绣满折枝裙褶。

二十六日阅陈恭甫所辑《尚书大传》。其中记有山东邹平县有伏生乡、伏生墓及祠。伏生子孙仅三人，其二皆年老务农，有一伏敬祖由山东巡抚全保咨送，承袭五经博士等事。真是“饥不择食”，“做官侯缺”之谓也。

是月，先生比日窘乏，典质告罄，借贷路绝，不胜其忧。二十三日还以“杂阅近儒考据说部，间亦有所订正，而淩沓无序，与荒嬉何异。昔贤三旬九食，尚自著书，我辈岂人类哉”自励。二十六日，“比忧枯鱼甚迫矣，不得已作书致乡里旧识吏胥二人告以称贷。”然书成迟疑不发，还想坚挺。可“饥来一字不堪煮，乃以性命付儿曹”，亦足发志士素唏耳。此种窘境直熬到四月初三、四印结局发来公费银十四两五钱，伯寅惠银六两，沈松亭、杜葆初各惠借银五十两才稍解。

四月初一日，阅方氏《古今释疑》。此书实策略之学，发明甚稀，当名《古今略说》，不当用《释疑》也。

初二日，抄《礼仪汉读考》二叶，成星丈輓诗四章。不过文从字顺而已，然无一饰语、无一閒字。老去渐于诗律细其庶几乎。

輓星斋丈四首[②]

分野沈双曜，朝廷丧五更。
须眉犹昨梦，尊俎绝平生。
公去称全福，吾悲失老成。
凄然临诀语，书字不胜情。[③]

少日佳公子，连云甲第开。
衡文穷六诏，平步阻三台。
雅淡能持俗，风流祇爱才。
平津花树好，东望独徘徊。

海内论知己，公家萃一门。
诗筒花萼递[④]，槃馔竹林分。[⑤]
倾吐皆肝鬲，商量总艺文。
灵床琴独抚，一笑想淩云。

鹤发童颜伴，清闺乐有余。
刘樊同拔宅，卞傅自安居。

①词调名，又名《佳色》、《解佩环》、《绿意》、《绿影》。因盘中浮折枝海棠及丁香，间以白石，红鲜雪濯，珊碎珠霏，石家七宝床中无此观也。
②因与厥配陆夫人同日逝，故有末章。
③公殇前一日作书于余别。书成，自谓字不工，复手毁之。
④谓绂丈。
⑤谓伯寅侍郎。

似此真偕老，相随返太初。

遥知三岛地，白鹿鞔轩车。

初五日撰徐荫轩师六十寿序散文，入外集。

初六日阅明竹邨氏《研六室文钞》。初七日校《北史》列女传和恩幸传。初八日阅《北史》周隋诸传、初九、初十、十一日夜抄《礼仪汉读考》数叶和胡氏《仪礼古今文疏证》，此实继段氏《仪礼汉读考》而作，補正与证引更密。

十四日，阅《老学庵笔记》，湖北书局所刻，据京逮秘书本，而误字颇多，不及毛刻远甚，又止刻十卷，而缺其续笔记二卷，其草率可知。放翁此书，在南宋时足与《猗觉寮杂记》、《曲洧旧闻》、《梁溪漫志》、《宾退录》诸书并称，其杂述掌故，间考旧文，俱为谨严，所论时事人物，亦多平允。

十五日，“有扬州齐氏婢来鬻，年十六，席姓，尚不甚丑，而举止颇醞籍，有大家风范，索银百三十金。姬媪辈俱极从臾，因勉许之。然此款不知何出。”十六日，“作书致香涛，乞贷三十金。”十七日“诣何达夫、羊辛楣、殷萼庭，亦筹婢款也。”十九日“得香涛书并银十两。余两与之书而借三得一。为此婢价，平生风节扫地尽矣。”二十日“得伯寅侍郎书，惠银二十两。”萼庭来“惠银十两”。“得达夫片，送来章氏罚款三十两。”“是月公费银十两。”“夜禔庵来言觅得汇款番银五十。余以集资已足，辞之。”先生谓：“此次丐金几等聚针盈钵，同人怜其贫老，祝其生男，皆谊等倾囊，谋如在己。然最知其不得已而苦言相劝，虽乏钱相助为之从臾尽力者，牧庄、禔庵两君也。”二十一日，以银一百三十两交烂面胡同齐氏，娶席姬来。齐氏盖天津人，其主人已早卒，此其妾祝氏之婢也。有祝氏及媒媪刘氏所立文契。先生五十岁再娶一姬至此结束，但望能生一男以接李氏后代。

二十三日阅《隋书经籍志考证》，忽然想起东坡诗云：“人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平康过尽无人问，十里珠帘半下钩。”放翁诗云：“却笑平生臂鹰手，挑灯閒送佛前香。”遗山诗云：“一瓶一钵生涯了，惭愧南窗打睡僧。”三公讬兴不同，寓感则一：暮年烈士，揽镜自伤。此放翁又有“造物无情吾辈老”之句也。况以黔回之西崦，迫于盐嫫之东隅，徒诮星星，谁歌燕燕，牙郎所出，止知卖绢之工，獦婢初来，空切生琨之想。余前日致友人乞贷书有云：闭房将届，当户无征，强看雾里之花，冀念日中之景，虚舟将败，犹借力于增帆；羸卒无多，亦张疑添灶。言虽似戏，情固难堪矣。这是先生独宿听事，慨然所记之言。

（以下转入《桃花圣解庵日记》壬集第二集）

四月二十七日，记有“古人引书，多有意改，不如其本文，遇叙事者删节尤甚。唐、宋人类书尚如此，其可贵者不似明人之妄窜耳。后人据以考订本书，得者固多，若必以后改前，则惑矣。故此事须有深识也，即以《意林》言之，其所改书今尚存者，概删落字

句，且有改属其文，隐括其意者，于《孟子》尤甚。近时考据家斤斤校订一字，不敢出入者，不可不知其义。”

二十八日，录《意林》亡书格言共三十三条，并考订其亡书、缺佚之书的原委、出处。后又加录杨泉《太元经》七条，共二十二句。详见《日记》第7868～7873页。

二十九日，先生阅陆游《老学庵笔记》，以为此书“掌故最多”，故录官制，并加考订，斥《四库提要》称其“颇寂寥”之谬，实是“放翁学识过人，即以此书而论，亦说部之杰出也。”详见《日记》第7873～7880页。

五月朔日，记有“京师近日大疫，死者数万人，知好中谢麐伯编修、同年史润笙太守皆以此卒。其病起时似寒热，两日不发疹即死，亦有夕病未及旦死者。饥馑之后，继以疾厉，灾劫流行，何时已耶。”十七日，记有“比日疾疫流行，讹言四起，都中市肆停废者多”，“中外知识中死丧相继”。

初六日，谢梦渔来言：“广西全州知州贵蒸以加赋激变，捕治绅士数十人，巡抚杨重雅遽发兵往。有举人蒋云鹏者，遂纠众杀贵蒸，据州城，分犯平乐及湖南之永州。又河南昼晦二日，河间亦晦一日。徐州出人面豆。广东省城雨血。闻绍兴府城亦雨血。又闻河间木叶尽落如盛冬。倘所传果真，吾侪有死所乎?”

十五日，记有“前日银价一两至钱二十二千，昨日忽减，今日仅十五六千矣。以人争取钱，且不肯用。小钱钱铺有停闭者。钱法之乱几如咸丰末年，恐非嘉兆也。”及至二十一日“市中钱法又大乱，钱铺停闭者十五六家。铺家不肯收银，民间不肯行票，银价减至十二千。”

是月，先生以阅读、考订为事。初二日，比日幽忧不堪，钞《南齐书》刘瓛、陆澄传论，《北齐书》儒林传序两首，便觉古人相对经味油然。《南齐书》无儒林传，故萧子显即于刘、陆两君传论发之，其言极醇李重规。《北齐书》以儒林传为第一文字，述北学源流、升降甚备。初三日，钞《仪礼》、《汉读考》讫，阅《思适斋集》。初八日钞顾千里《学制备忘之记》于《思适斋集》后。初九日钞顾千里、周立学《古义考》及《经韵楼集》所附刻《答段茂堂第二、第三书》于《思适斋集》后，以庚申之秋，千里先生之孙河之孝廉曾言：原集本载此数首，为杨文荪削去，今写補之，以成一家之言。初十日，钞顾氏书讫，其第三书甚长，约五千言。今依阮氏《学海堂经解》删节段书之例，去其枝蔓复沓几四之一，转觉义据精深，词气严整，精神益出矣。廿年宿诺，及今始偿，感慨至深。钞毕，复系长跋记之。十一日阅林氏《三礼通释》之卷十二释辟雍、泮宫、校序庠，卷十三释视学、养老之礼，并作考证（详见《日记》第7891～7894页）。十八日终日困甚，卧读《邓析子》。二十二、二十三日，阅《经义丛钞》。二十五日阅杭大宗《道古堂集》，言“大宗之文，雅赡富丽，不愧宏词之选，惟其考据则多不确。”如兵家之孟子，盖三代以上人，详不可考，儒家之孟子，名轲，邹

人，子思弟子甚明，不能相混。又如余、佘，不知佘字本余字之伪变，犹库氏之别为厍，刀氏之别为刁，皆本无其字，伪变而分也，等等。二十六日阅《道古堂集》及孙氏《读书脞录》、洪氏《晓读书斋录》。二十七日终日坐厅事读书，言屠、杜二氏本为一，皆出杜伯之后，惟《通志》氏族略载屠岸为复姓。二十九日记有“腰缠千万贯，骑鹤上扬州”，语出梁人殷芸小说。所说“扬州”，指建业，属江宁府，不是扬州府，今之南京，唐、宋词章家皆误之，得澄清。

六月，天气酷热，时发固疾，与友朋作户外之游，作诗填词，稍有读书。

初二日开始，阅冯注《苏诗》、嘉泰《会稽志》及宝庆《会稽续志》、《龚定庵诗》、《北史》、《吕氏春秋》、《道古堂诗集》、桂未谷《晚学集》、许周生《鉴止水斋集》等，“比既苦暍，又家事凌杂，略无好怀，读书甚草草耳。”

是月先后作有《致绂丈滕诗》二首，《寄王景瑗表兄》二首，《谢王景瑗馈猺桂野术》一首，《酬上虞连明经兄弟》一首，《夏夜雨后月下坐凉》一首，《寄陶心云》七古一首，《答谢禔庵邀游十刹海之游》一首，《雨后轻阴游十刹海饮兴侍郎水榭》一首。皆叙情、思乡之作，不录。

七月初一日，作诗柬牧庄，题为“七月一日奉简孝仲病起且答其秋游诸寺之约”：

伏日劬书不自休，喜看凉琯转从头。
閒庭莎丝初含雨，远树蝉声渐变秋。
终日门关本无客，偶然腹饱更何求。
西风张籍沈疴起，先约城南寺寺游。

初五日，阅马氏《周礼说》。“竹吾之学主荟萃而心得者少，然墨守郑学者也。今日为郑君生日，欲具酒脯之祭，既无一钱，又无一客可招，念都中亦无人能为郑学者。绝业难绍，同志莫期，纵设牲醪，何关鼓匽。”曾记得“道光初，胡竹村氏曾举此祭。所招有龚定庵、夏心伯，而定庵集中有诗记事，乃痛贬郑君之学；心伯著《庭闻录》深诋同集之人，吁唤裸袒，绝无儒者气象。夫以胡氏经学名家，又尔时承乾嘉之后，海宇晏清，人才尚盛，而召客已不能尽择，盖同方同术自古为难，何论今日耶。”听说近日都中“顾氏之会，大率不识一字之朝贵及翕热奔走之少年，其胸中尚不知《日知录》为何书，而俨然衣冠，春秋奠醊，奴颜婢膝，尘汗粪言，吾知亭林之灵遁逃之不暇矣。”故以为“礼堂孤学，服膺毕生，束带陈经，羹墙如见，奚必修市脯之敬，尽村酤之嚼乎。”此种学术风气，今人亦应深思矣。

初六日，阅《彭甘亭诗集》，聊以娱情文字，息读经之劳。七日继之，以为“其家数虽小，然矜严爱好，字不妄下，运事数典，俱有炉锤，盖绩学之言，非同恒设，且处境屯塞，多劳者愁苦之歌，自与我心每相印合也。”

初十日立秋，得诗一首，词一阕：

郑君生日欲具酒脯之祭
苦无同志赋诗解嘲诗

化帛端门瑞再呈，赤符衰运绍苍精。
六经日月明常在，千载蜉蝣埽又生。
仲远不劳称弟子，本初何事具壶觥。

陈书庚子先贤例，束带难胜仰止情。

卖花声[1]

人静画帘低。铜鸭烟微，雨声才过。碧簷西光见一绳，银汉影凉到生衣。

秋信是耶非。莲漏声稀，芭蕉刚与绿窗齐。添了豆红一桁，添个萤飞。

十一日点阅彭湘涵、龚定庵诗词；十六日阅万季野《石经考》、杭大宗《石经考异》及顾亭林《五经同异》。

近日，署中知会军机处考取章京。户部于十九日考试，保送余，注以不愿送枢部之选。本曰“华要部曹不得翰林，以此为极选，举人得之，尤为清途，然所尚者趋跄应对，衣服车马，胁肩谄笑，势轧明倾，近年奸利益明。此选尤杂，代言鄙拙，给札繁猥，上者影射其宠权，下者苟图其醉饱。余老矣，尚能与黄颔年少、鸟瞰家兒承涕唾视眉睫乎？况枢府以此拊私人曹长，以此饵亲昵，虽与试亦必不送，虽送亦必不取，请君无辱我则知之矣。”

十七日阅钱氏《宋史考异》。“《宋史》纪载繁仍，官职差互。钱氏句稽理董，具费苦心，于诸史考异中尤为详密。”

二十二日，阅许周生《鉴止水斋集》。“周生少颛力词章，而诗甚浮滑，其词尤拙。中年颇事经学，而以同时魁儒辈兴，自知不能并驱，遂遁而欲言性命，……又不屑为其言几于猖狂，故周生之学深为余所不喜。”

八月中秋，节日难度，无心读书，聊作诗谣自娱。

戊寅中秋时，孝仲来寓斋中，感赋二首：

其一

明月入吾室，仰看河汉流。
百年怜二鸟，四海共中秋。
到处悲欢异，浮生老病休。
著书徒自苦，急为稻粱谋。

其二

寥落天涯里，荒斋酒一尊。
秋林危堕叶，皓月自当门。
计拙安身贱，心閒觉道存。
斯民艰一饱，吾事且休论。

二十九日，作苦雨谣三首，录其中一首：

桑乾水自楼烦来，挟沙横决如奔雷。
缗钱告绌外繇困，危堤嚙嚙尚崩摧。
神畿南北一河绕，南岸乘危北堤倒。
积年菽菽眄雨工，十室一归复逃涝。
我乏羡卒半亩田，太仓斗食鼪无缘。
蜚鸿满野心悄然，岂但墨突无炊烟。

招隐辞[2]

主人湍忧客进言，我歌能令公解颜。
公胡不归云门山[3]，峰峰巧挽青螺鬟。
桂花未老枫叶丹，溪流曲曲如玦环。
山回竹断逢飞泉，钟声十寺断复连。
花深一磬穿秋烟，秦望[4]翠若波涛翻。
炉峰[5]危戴云中冠，下有阳明古洞天[6]。

①词调名。七夕后二夜烛下作。
②有序。淮南桂树以招隐士，出而仕也。余之所歌，招于隐名同旨异，不必云反，沮溺丈人风斯远矣。
③云门山，会稽山一峰，有云门寺，今尚存遗迹。
④秦望山，会稽山一峰，秦始皇曾登临其上，竖《会稽刻石碑》。
⑤香炉峰为大禹陵一景。
⑥明王阳明先生作室读书之处，在宛委山半山腰。

令人一步千回旋，湖塘[1]十里开平川。
屏风列嶂丹青悬，青林碧篠围檀栾。
华屋鳞比盈万廛，白云突出红楼妍。
开窗面面环青莲，柯山[2]岩壑如雕镌。
秋清峭壁藤萝廛，一蹬窥湖湖镜圆。
沿湖村村乌桕殷，斜阳尽作胭脂斑。
下接菱罾绳相牵，时见菱女小艇穿。
湖山之美难具宣，公胡不具独鹿辕。
或舁篮辇相后先，佩壶挈榼从青猿。
有时载酒上画船，古书绷束缥缃联。
古香佳槧四部全，香炉茗盌无俗顽。
斑丝隐囊轻胜绵，奇器一一随方圜。
名琴虽设不取弹，越女之白天下传。
青凤弄玉双婵娟，绛襦纤颀玉削肩。
墨桂幽靓花为权，淡妆炫服各自怜。
捧卮含笔来公前，为公拂几排牙签。
粉指印满青丝编，有时研墨调丹铅。
校书既毕哦诗篇，日注雪芽百诧团[3]。
对山时汲清泉煎，家家打稻香满田。
煮菱剥芡烹鱼鲜，团脐大螯不论钱。
公呼一醉能忘年，近游既足远亦便。
西溯百里桐江间[4]，头亭艇子十丈宽。
渔姬婉丽能管絃，挂帆直上严陵滩[5]。
水色缥碧之作湾，夹以千仞青峰峦。
交柯蔽日竹万竿，瀑布四界飞猱缘。
九里栀花村在边，树腰十围花似拳。
花飞乱点珊瑚钿，东出剡溪[6]就轻篾。
天姥[7]云际修眉蜷，天台赤城[8]一径攀。
国清[9]异境开仙寰，松阴布算声铿然。
贤首道场花蝉嫣[10]，古德不谈衣钵禅。
三生香火公所安，尽繙贝藏穷涅槃。
上寻华顶跻华鬘，金光昱昱摩天关。
霞飞百道星辰赞，蓝桥万丈游蜿蜒。
下俯清溪激奔湍，薜荔络趾云生巅。
当之六月生清寒，林栖每见坚牢仙。
剔苓随向枫根眠，公平此乐侪乔佺。
采芝饭术寿且千，丹岩碧海棠来还。
胡向五岳胸郁燔，人世逼仄何足叹！
我起公疾公无难，愿公轻赍驾归舷。

九月初一日积雨得晴，神思清豁，复赋五律一首寄绂丈，七律一首怀故乡。

秋霖忽晴柬绂丈为酒垆之游

忽地商飚起，沉霾一埽清。
天心娱晚节，老境爱秋晴。
树脱欹巾便，苔干曳杖轻。
寒衣虽典尽，酒市且经行。

秋晴忆越中光相桥故居

乡心且莫道林泉，即论城居也似仙。
桥市玲珑隔秋水，山亭峭蒨出寒烟。
微风岩桂临街宅，落日湖菱上堰船。
西寺[11]钟声依旧否？几时红舄著僧边。

初二日，为曾退庵舍人（熙文）

①湖塘在鉴湖堤上，有十里湖塘之称。
②柯山，在柯桥街道南，今辟成旅游景区。
③日注（铸）、雪芽、团茶均是当时绍兴名茶。
④即今之富春江。
⑤严子陵隐居垂钓处。
⑥在嵊县，曹娥江上游。
⑦天姥，即天姥山。
⑧天台、赤城均为山名，在今天台市。
⑨国清寺，为千年名刹。
⑩贤首，是六朝名僧之一。
⑪光相寺即晋之西寺，毁于太平军。

《明瑟山庄课读图》作序并诗，见《日记》第7986～7988页。

初十日，作书并写前日所作《招隐辞》致伯寅。“余自谓此诗实千古奇作，将分寄晓湖、牧庄、云门诸同人。平生最不喜写诗示人，此为破例耳。”

十一日夜赋一词。

霓裳中序第一[①]

屏山嫩未展。梦觉潇湘秋渐远。才报妆楼过雁。又嘹戾带星，寒鸦天半。西风尚暖。问碧云、何事催趱。天涯路，为谁旧约，破晓送悽怨。

刚断。凉蝉幽咽。祇客里、雕梁尘掩。归期难问去燕。想故里荒村，斜阳何限。昭阳能几见。便做弄，凭高数点。林枝借，未飘红叶，忍自召雪霰。[②]

十二日，“得王子献八月二十二日宁波书，并宋高宗赐吕颐浩手诏石本数通。上虞连撷香新拓之西郭吕忠穆废祠者。”是夜，偶取定庵诗略评点之。“定庵文笔横霸，然学足副其才，其独至者往往警绝似子，诗亦以霸才行之，而不能成家。文好为释家语，每似偈讚，其下者竟成公安派矣。然如能令公《少年行》、《汉朝儒生行》、《常州高才篇》，亦一时之奇作也。词则非所知耳。”

十四日阅俞荫甫《宾萌内集》。“凡五卷，分《论篇》、《说篇》、《释篇》、《议篇》、《杂篇》。其议论隽利而颇涉肤浅，又喜新巧而偏激者多，文笔亦太轻滑，故为时所诟病。然读书既富，时有特识。”一一加以点评。详见《日记》第8000～8002页。

二十四日牧庄、校亭别京师返乡，因病不得送行。二十七日身热始退能饭，看书作文如平时，谓“地狱中一度快乐劫也。”三十日夜作《送孝仲还里》二首。

其一

病里持君别，相看乏宝刀。
疲驴扶羸疾，短褐犯风涛。
十月重洋险，千山落木高。
故园松菊在，息影解天弢。

其二

困极营营吏，遭回已十年。
微官方挂籍，一病遽归田。
禄薄家人怨，身孱路鬼怜。
吾衰君更甚，搔首问苍天。

十月初，阅宋嘉泰《会稽志》。校乾隆《绍兴府志》。记有“校乾隆《绍兴府志》诸图。嘉泰、宝庆志皆无图，万历志始有图而未备。国朝康熙俞志、乾隆初李铎志，余之见，此为乾隆末李亨特志，颇详析。其图依《浙江通志》例，改旧法上北下南为上南下北，然人坐必南向，以取明书对人而设，故图为上北下南者，以便观阅。若转而就书之方位，则仍下北上南，此古法不可易也。”此说不合地理方位，仍持旧说，恐误。但在阅读的认真态上说，堪称典范。

初八日夜，与仲彝谈先世旧闻。“六世祖天山府君有《京邸冬夜梦亡》，内四绝句，记其一云：‘梅花岙里一株松，泉路他年与子同。笑看儿孙浇麦

①词调名。秋晓闻寒鸦声，便觉暮岁催人，霜雪将集，赋此寄兴。
②此调本用入声。南宋以后，多有用去者，因其声太悲以促，故从之。

饭，满山寒雪纸钱风。’梅花岙在谢墅，府君自营生矿先葬，樊孺人处也。先本生王父蕴山府君少本生王母顾恭人二岁，咸丰辛亥顾恭人卒，府君輓联云：‘六十载夫妻无时暂别，七一年人世送尔先归。’次年壬子三月豫匙矿联云：‘受天地生成，七十年赢得白水盟心，青山埋骨；告儿孙春秋，一二祭须趁梅花未落，枫树初红。’府君最爱梅花及红树也。是时府君康强无恙，踰月竟卒。”

初九日，录有《与某书》、《又与某书》、《复某书》三通。先生言道：“此等文字，唐、宋大家集中多有，然余于书简百不存一，虽或用意作之而无甚关係者亦不录，以为听后人收入外集可也。此三书尤底（低）下，不经意特录之者，一以见妄人之不可作缘，一以见小慧之不庸节取。”

十一日，同年程鬳卿来，言八月间福建乌石山之变，以夷人向于山上筑洋房，渐占官地，掳掠少妇，民为之怒，遭夷诟骂，欲捕民众，遂烧其房之半。夷人大閧，中旨亟起往勘，欲杀民媚夷，诚为可叹，如颜鲁公言：“晚节末路之难，良有以也。”亦足见先生爱国忧民之心。

十二日偶理旧箧，得前年肯夫视学湖南序文，尚未成稿。今日成之，以寄湘中，且谋禦冬之计。先生为人作文、书题、校阅旧籍，实为生计之谋。

是月，先后作有《戊寅冬初杂感》四首、《孝仲尝馈白烛今夕用之尽矣孤坐有怀郤寄道中》、《立冬日柬郑庵待郎》、《对菊作柬绂丈》、《孟冬十七日雪晴后绂丈赋诗见简用韵奉荅》、《得孝仲沪渎书计近已抵里雪后訊之》、《近日得雪山思益深赋诗柬诸君子》、《寄怀云门修志荆州》、《冬晴早起再柬绂丈和前韵》二首、《绂丈再次韵见柬復疊前韵》二首、《仲彝为余赎羊裘诗以志谢兼写所怀》、《绂丈三次前韵见柬复疊和》六首、《与秦澹如书》，吊唁丧媪。

十一月初三日记有“比日多阅《金石萃编》。此书述庵极一生之力，又同时若钱献之、严久能、黄小松、张芑堂等皆精研小学碑版，专门助其搜讨，而钱氏竹汀、王氏西庄、武氏授堂等收藏金石之书，先后已出，尽得取以参校，故搜罗宏富，抉摘精深，实为此事之大观。”推演所及，未免瑕疵，当是自然之事，略有订正。“世人读书恶繁重，好新异，不论实事，妄肆游谈，颇有轻议是书者，故备论之。”

初六日，读唐高宗（李治）所撰《大唐纪功颂》、《万年宫铭》，“宏伟奇丽，四六之杰制[①]，似过太宗远甚，盖初唐气运极盛时也。”

初十日，除仲弟期服，始着重裘。并对“丧服”作了一些考证，着重指出久而不葬（暂厝）者唯主丧者不除服。

十五日，偕仲彝造花好月圆人寿笺，各为赞语。“花好笺”，绘一美妇，折花一枝，左抱一小儿，又一儿牵其裙带。赞曰：“花钗九树，桂林一枝，为神仙妇，为玉雪儿，春风之

①指四六文，文体名。骈文的一体。全文多以四字、六字相间为句，史称骈四俪六，故称四六文。

喜，美人之思，书此华叶，以报我知”；“月圆笺”，绘一人团团如月样，宋人所谓一团和气也。赞曰：“团团如镜，蓬蓬如春，月中名字，现此善人，是大智慧，皆大欢喜，同心之言，宛转如意”；“人寿笺”，绘一寿星。赞曰：“观河之面，以皱为妍，有桃如斗，有藕如船，礼榷聃耳，古诹彭筵，文章之寿，同此万年”。又造宜子孙笺，赞云：“食苹苣，佩兰蒞，国添丁，家有子，得子者，各欢喜。”①

十八日，同邑姜仲白（秉初）新举孝廉方正入都来，携王氏妹十月十六日书并番银二十枚（合大妹四、仲妹二、僧慧四）为余五十寿者。以一诗写之：

剧怜作苦寄金来，郑重封题忍泪开。
孤露余生何足算，饥寒诸妹独相哀。
十年骨肉分存没，关世功名竟草莱。
赢得向南增一恸，天涯谁与劝衔杯。

十九日，阅宋元旧本书《经眼录》。同治癸酉（十二年，即1873年）莫子偲次子绳孙所辑录。凡三卷，又附录二卷，共五卷。卷一为宋椠，卷二为元椠及明椠，卷三为旧钞本。附录卷一为书衣题识，卷二为金石笔识。其书备载行式及收藏印记，间录序跋，时亦有所考订。子偲本绩学之士，入曾文正幕府。江南平后为文正收书，颇得秘籍，又备见上海郁氏及近日丰顺、钱唐两丁氏（日昌、松生）新得之本，故褒然可观。二丁皆俗吏伧夫，必不能久有，他日可因地因人以求之。

二十日校《礼记注疏》，二十一日作《练祥两祭异日说》，皆属祭礼之考。其余日子都为好友阅稿定版，供其付梓而已。

十二月初二日，为刘锳山师《蔗圃自订诗文集》系跋尾一首。集内凡文二卷、诗二卷、续集一卷，师临殁时以其婿陈主事授余作序，且为删定。庋架上已三年未及一展卷，今取阅之。“诗文皆率意而出，然真气流露，自为长者之言。其诗如‘浙江闱中食蓴羹鲈鱼一绝云：‘鲈脍蓴羹未足誇，吴中原不是吾家。秋来我亦乡心动，海蟹鲜蛏蕨菜芽’。亦极有风姿。”

初三日起，比日校《南史》及《齐书》、《梁书》与《爱日精庐藏书志》等。初九日作《丧服小功章君子子为庶母慈己者郑注考》一文，见《日记》第8104～8120页。这是先生《日记》中迄今辑录最长的一篇文字。

十一日起考索礼服诸说。

十三日阅《梁书》昭明等三太子传、豫章王综等四王传、侯景传，并取《南史》互校之。作《答沈晓湖书》，叙生平之谊，叹人生之艰，勉以道为养，抒晚上之望。其中有“世有以刍豢为养，有以药石为养，有以服气导引为养。而吾侪则以道为养。所谓道者，读书安贫贱而已。研经以固其神，考史以充其气，吟咏以畅其性，山水以悦其情，故古来儒生、诗人，枯槁隐逸，往

①笺：用精美的纸张，供绘画、题诗、写信等用，这里指的花笺、锦笺，专门用来拜年用，如同现在的贺年片。

往多寿。”确为正理，时势如此，只好自得其乐，个中意趣，详见《日记》第8122～8130页。

十六日阅沈匏庐《说文古本考》，共十四卷，未有刻本。“近有人从其子芙江钞得，尚无序例，云其稿已七易矣。其书采唐、宋人所引说文，以证‘二徐’本之误，亦有谓‘二徐’是，而所引非者。采取极博，折衷详慎，极有功于许书，学者不可不读也。”是夜，赋五律一首，柬子缜、敦夫：

岁暮数佳夕，清辉今倍寒。
径犹三益待，月隔一年看。
老树鸦声噪，虚帘烛影单。
耽吟应不寐，耐冷依阑干。

二十一日夜书春联：

大门：夜来投刺皆佳客，暂自栽花作寓公。

枋间：己有孚象，卯曰春门。

厅事：常爱书窗满晴日，偶缘客坐得新闻。

堂柱：随分读书吾事了，多方种树此心长。

房扇：梅蕊渐消寒九九，桃茶双结闰三三[①]。

二十三日起，校《东都事略》及毕氏《续通鉴》[②]

二十六日夜，姬人辈治具张烛为余煖寿，萧然独饮，感念身世凄戚，殆不自胜，赋《貂裘换酒》两阕[③]，一以自悲，一以自解也。

百岁平分了。谩相传南人衰易，此年难到。更有萧家天子语，各半东西相祷，祇未食长生茶蓼。人鬼挤排终不去，有黄奎百甕供人咬。忧患窟，此中老。

生来百药都愁天。记当年瑶环就塾，未离怀抱。历尽人间千万劫，转眼头颅都皓，祇赚取形单自吊。今日杯盘红烛影，算三生留得枯禅稿。归去也，故山好。[④]

且作团圆计。有蓬头翦风房老，恭心獠婢。使指浣衣萱草辈，银鹿青猿差备，争进食欲令公喜。雪样餈糕花样肉，更黄鸡玉面淘来腻。京雒食，故乡味。

练裳苾篹都搜抵，胜相嘲影妻椅妾，乏人料理。祇念白头花烛伴，独自牵萝乡里，媿割肉东方难寄。比似买臣差不恶，便从公饿死宁相弃。下床答，百年礼。

二十七日，五十岁生日，鲍敦、曾圣舆、杨斯大、羊敦叔、朱蓉生、陶子缜、何达夫、殷萼庭诸君枉过，张灯夜饮，霞芬为之佐觞，酒酣花浓，陶然一醉，即席赋此：

百字令[⑤]

瘦年前夜。喜冬暄回暖，春风催律。小试灯屏围绛蜡，照遍梅花如雪。白发庞眉，兒童指点，卅载填词客。斯

①明年闰三月，故称。
②毕沅《续资治通鉴》。
③戊寅十二月二十七日，先生五十初夜。前夕，姬侍辈为治具作暖寿筵，赋词二阕示之。
④传先生前身为天台国清寺僧。
⑤词调名。五十岁出生之日作。

人犹在，东方游戏还剧。

漫道铸错郎潜。三朝京辇，几醉閒花月。同辈少年偏见爱，来作灵均生日。更喜尊前，一枝瑶树，绰约依人立。笑他坡老，紫裘诮煞吹笛。

二十九日，守岁至五更，复赋百字令一阕。

百字令

绕床逋券。任扃门高卧，雪花如掌。到晚糝盆光影里，又见先生无恙。裹饭荷包，笼薪筠筥，山侣能相饷。腊筵才罢，墙头还度家酿。

自数五十今朝。但除童幼，尽作移台长。沧海翻流家再破，此老依然强项。爆竹声中，撚髭吟罢，静待黄鸡唱。茸裘风帽，明年新试携杖。

这年二月，清廷申禁栽种罂粟。左宗棠奏遣留叶尔羌之英、印商侨。三月，曾国荃遣兵击溃大青山游勇。五月，命严查私铸，禁京师奸商操纵钱价。七月，命各省裁陋规，撤冗、佣二官。八月，浙江定海大衢山金启兰聚众抗查荒地，至是败死。十月，安集延人扰边，刘锦棠破走之。十一月，左宗棠奏报新疆北路招恳情况，并请建为行省。广西怀远斋教徒于秋初起事，至是败。是岁，借德国款二百五十万马克为海军建设费。唐景星成立开滦煤矿矿务局。左宗棠在兰州设立机器织呢局。法商在上海设宝昌丝织厂。北京等处海关附设送信局，发行邮票。

在浙江，二月，招商局设立温州分局于北门外，派“小广济”轮穿梭往来瓯、沪线，兼航宁波。这是温州以本国轮船开辟海运之始。陕甘军事费用全赖东南各省海关款协济，名为“西征协款”，浙、闽二省上年协济均在八成以上。是年，左宗棠以军需孔急，催提前赶解。六月，杭州汉民不得出入旗营，但旗人却可以日夜自由外出，滋事扰民。有旗丁郑听向茶铺强买茶叶，并殴毙店伙，市民激愤，罢市反抗，但杭州将军果勒敏却置之不理。金、衢、严三府属县大水，漂没人口，冲坍房屋，损失极巨。

五十一岁

光绪（己卯）五年（公元1879年）

这年，先生仍在京师蛰伏。

正月初一日开始，试朱笔，校《史记》、《汉书》相关列传。初四日记有“‘四皓’之名，《史记》有之，而《汉书》不见。班氏（固）于史公（司马迁）之书，虽有所删节，大率同文不急之事，若此则非所应删，疑《史记》亦本无之，后人取他书附益者也。盖‘四皓’不必实有其人，所谓须眉皓然者，衣冠甚伟者，不过一时宾客耸动观瞻，高帝藉以塞戚夫人之请，岂真惮其羽翼太子哉。故史家皆等之传疑荒忽，后人侈张其事，既传其姓号，又妄造名字，且有为作碑、祠、神坐者。所谓危言日出而疑之者，又或谓是子房（张良）所假托，或谓史公好奇傅会，皆非也。”初九日记有“淮阴侯传、韩王信、卢绾传。淮阴、韩王二人同名，故史公以此

题篇，为别他传。凡涉淮阴者多曰淮阴侯，涉韩王者皆曰韩王信，所以别之也。《楚汉春秋》谓韩王名信，都不足信也。”先生在校阅中校正颇多，各附校语，亦有识论，各以朱笔细书之，但《日记》中均不录。十九日就记有“杂校史汉，颇得前人所未发者数条，各识本书眉上，不及割录。”真可惜哉！此项工作，直至二月底止。

是月春节，多有拜会之举。

二月初一日，阅武进费伯雄《医醇賸义》。伯雄，字晋卿，今之名医，江南人推为徐洄溪后一人。太平军乱后，居武进之孟河庄，就医者舟车凑集，遂成邑市。“尝著《医醇》二十四卷，分六门，曰察脉、曰辨证、曰施治、曰医理、曰治法、曰法外。经乱版毁，且亡其副，乃追忆绪言，录成四卷，故曰賸语也。其言以平淡为主，于东垣丹溪诸家多有所驳正，所论脉象藏征俱有名理，所载诸方亦多平实可依，惟不载伤寒症证治耳。后附医方论四卷，取《医方集解》中所载者，各为论。其当否，自言专为初学而设，然最为有用之书也。其书刻于丁丑，闻其人去年已卒，而汪谢城近购得其《医醇》中《论脉》者一卷，为刊行于越中，不知果否耳？其言药中升麻、柴胡、知母、黄柏、石膏、附子、肉桂七味，不可轻用，而于升、柴、知、柏四者，尤反复言之，尤为名言。余见京师医生，以此等药杀人者，不知凡几，深可痛也。”先生久病成良医，其对医学亦深有研究。

初七日，点阅《小谟觞馆诗》。“甘亭一身（生）坎廪，诗多郁抑忼慨之辞，骨力遒上，采色亦足。《楼烦》一集，状塞上风景尤多名篇，乾、嘉以还莫能及也。《佣书》二集，多落宋调，率尔之作，时见累句，于全集中最为下乘。盖依结镭，滑手应酬，故以刺促减其性灵耶？余雅不喜评抹诗词，今日寒风掩帷，沈晦转币宇，羁苦穷悴以遣无聊，亦以处境与甘亭颇同，穷鸟之鸣，自有含契，世之所谓工拙不必计矣。后有得此集者，玩其品骘，于学诗亦非无益。”观先生诗词之作，应酬之品，逊于有感而发，正与甘亭同病相怜，其情不虚。

十八日夜，补作诗七首，实有八首：计《七月二十九日王厚斋尚书生日为余豫作五十之寿赋诗奉酬》二首、《东坡先生生日同年携厨傅过寓斋为余豫寿五十赋诗纪事》三首、《己卯元夜敦夫、敦叔、仲彝、子缜及孝廉小集寓斋》一首、《贺伯寅擢御史大夫》一首、《花朝夜饮霞芬新居》一首。详见《日记》第8200～8203页。录《贺伯寅擢御史大夫》如下：

汉廷亚相继三公，着陛台端一品崇。
独坐旧居中执法，六官仍涖少司空[①]。
兰陔日映宫袍紫，莲炬春回苑树红。
自有清名惊百辟，不须白简已生风。

十九日开始，校《宋书》及《南史》，兼及《梁书》。杂阅扬子《法言》、《荀子》等。

三月初一日起，络绎阅读《周礼》。

①伯寅君于甲子、乙丑间以副都御史署工部右侍郎，及今擢总宪，仍摄工部左侍郎，皆以山陵事也。

初四日夜得诗四首：其中二首和作，二首为《送仲彝试令江南》。录后二首于下：

送君此去试鸣琴，春水桃花别思深。
群从才名俱国用，中年出去总亲心。
九科匡鼎知非计，匹绢胡威好嗣音。
自古江南游宦乐，不须手版叹浮沉。

大府争求汰吏方，近传明诏罢訾郎。
澄清渐见官师肃，抚字尤资牧令良。
幸有写书传治谱，莫嗟捧檄滞周行。
悬知十亩公田稻，犹胜侏儒羡一囊。

十五日阅全谢山《鲒埼亭诗集》，共十卷，诗八百三十六首。道光十四年慈溪郑尔龄据董小钝校本及二老阁诸本付刻。“先生诗为余事，而当日与杭堇浦、厉万榭、赵谷林、意林、马懈谷等唱和极多，颇以此得名，亦颇以此自负。其诗学山谷而不甚工，古诗音节未谐，尤多趁韵，然有抒胸肊，语皆有物。其题目小注多关掌故，于南宋、残明事，搜寻幽佚，尤足以广见闻。五七律颇有老成之作，暇当再录以见其凡。”

十六日阅《九史同姓名略》，共七十二卷。《九史》者，新、旧《唐书》，新、旧《五代史》，宋、辽、金、元四史及《明史》，书成于乾隆五十六年龙庄署湖南道州知州时。归田后又著《二十四史同姓名录》，一百六十卷，杀姓录四卷，皆未见刊行。另外，尚有《三史同名录》共四十卷，为辽、金、元三史，皆龙庄晚年所撰。详见《日记》第8234～8237页。

十七日，阅殷斋文集八卷，诗集四卷。平定张穆著。穆字诵风，本名瀛暹，字硕州，后以石州为号。编修敦颐之子，道光辛卯优贡生，以教习侯选知县，乙亥试顺天，被诬黜革。己酉卒，年仅四十五。著述甚丰，以文章经济自负。详见《日记》第8238～8242页。

十八日作《己卯清明后大雪连日积素平阶有生所未见也赋此柬故山诸子》诗：

清明三日雪大作，积晓寒光满簾幕。
乳鸦雏鹊噤不声，稚杏夭桃冻回萼。
垂垂花树诚可怜，先生亦复翘吟肩。
敝裘久已付质库，天公相戏毋乃顽。
方今复土戒行早，万乘三宫急驰道。
颇念畚插千夫鞍，欲使桥山一时缟。
我思镜湖春水生，柳花如雪飞江城。
上山杜鹃下山荠，篮舁篾舫随处行。
辞家作官计诚拙，执戟虚名不堪说。
抛却一畦田水声，来看西山暮春雪。

又作《案头种麦一盆，青青可爱。水仙、红梅亦尚有花者，以山桃直插入瓶中，赋诗简同志诸君》：

种麦在盆盎，入春叶渐舒。
青青作方罫，日日勤溉濡。
颇觉几案间，田野渐可抚。
水仙杂绛梅，玉佩扬罗襦。
数枝作晚秀，历久弥妍腴。
山桃亦已华，纷插盈盆盂。
绝代本难偶，异质各鲜敷。
席砚函尺地，粲粲环名姝。
古书相映发，暗香风与俱。
静念生意足，默推物候殊。
和气一以感，泯然化荣枯。
为念素心友，存养今何如？

二十一日阅《汪子遗书》，吴县汪缙大绅所著。二十二日阅汪菉友《文字

蒙求》。二十五日阅宋氏翔凤《过庭录》，七十三岁所辑。

二十九日，改《荀学斋日记》甲集上。先生言道："《史记》谓荀卿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所传《荀子》三十篇，醇粹美富，无所不包，夙志钻研，冀绍微绪，过时为学，希仰大龄，爰以荀学名斋，自今以后，日记遂以系之，庶厉炳烛之光，附假之义，呃穷终老，亦吾志焉。"可见先生五十一高龄，仍孜孜以求，厉志于学。

闰三月初三日得词二阕。

满庭芳[①]

花醒余寒，柳苏丝雨，闰春留作重三。倦游词客，芳序恨长淹。为约薇壶俊侣，凤城畔閒趁珂骖。轻阴里，朱墙一抹，松影转幢南。

那堪，思往事，廿年再禊，曾款精蓝。问咸丰朝士，几共言谈。惆怅僧贫树老，一株雪、犹照春衫。凭高望，斜阳燕麦，无羔是晴岚。

一萼红[②]

傍西墙。有猩棠一树，含意上金堂。珊缀珍丛，脂匀粉杂，未许蜂蝶轻狂。看取次、将开复敛，似避人、娇面怕端详。散点朝霞，轻笼细雨，略逗斜阳。

应记几年栽就，比摩娑稚女，锦带低量。才整搔头，凝羞晕颊，尚怯轻洩春光。镇赢得、回眸一笑，襯纤妍，垂柳万丝长。只恐开时遇风，翻损红妆。

初七日，因比日疲于花事，读书多辍。因寓庭旺发红绿，得绝句四首：

六年栽树幸今成，红紫浓香各擅名。
为照主人头似雪，夕阳相映更多情。

常拟娱亲辟小园，卜居难定一枝安。
即今半亩众众朵，不及閒居奉母看。

迴环小径绿生莎，别占春风锦一窠。
赢得隶人沿路说，冷官无事种花多。

海棠粉褪柳丝斜，一树浓桃烂似霞。
蜂蝶不知人迹断，也寻花事到贫家。

十四日，"比日甚倦，读书无绪。今日稍理经业，阅江慎修氏《群经补义》。"

十五日阅《五经异义疏证》，考"板"、"堵"、"雉"。各经传各有说法，先生以为《左氏传》说郑庄公弟段居京城。祭仲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三国之一，中五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古之雉制，书传各不得其详，今以左氏说郑伯之城方五里，积千五百步也。大都三之一，则五百步也。五百步为百雉，则知雉五步。五步于度长三丈，则雉三丈也。雉之度量于是定可知也，此郑以三丈为雉之坚据。"其余则请见《日记》第8273～8276页。

二十日，为赵桐孙撰《左传质疑》序，约二千余言。"桐孙此书，本细密可传，余所为序，亦甚有关于学术，以文太长别存之"（见《日记》第

①词调名。作者自注：己卯闰三月三日，小雨微晴，偕禔庵、敦夫、子缜游慈仁寺，坐栾枝花下，追忆庚申旧事，怅然有作，索诸君和。

②词牌名。原注：庭中海棠一树，今年作花甚繁，比日多雾，红萼可爱，夕风大起，恐有所损，光依曼声媵之。

8291～8298页）。

二十二日，有与孺初之言：“迂儒不可与论古，不可与言今。帝王传序立適（谪）、立长，礼之经也。”因而作了考证。见《日记》第8282～8284页。

二十三日夜阅《过庭录·周易考异》，皆明汉学各本流别，其辨析极细，于郑读亦多有发明。

二十四日读刘楚桢氏《论语正义》，“共二十四卷，自十八卷卫、灵以下为其子叔俛（恭宪）所续，末一卷为何氏集解序及宋氏翔凤所辑。郑君论语序、逸文，皆叔俛所撰。”二十六日又说：“其证引极博，而取去多未尽善。”故略有考证（详见《日记》第8286页、8289页）。

三十日，捕录《赵又新（桐孙）同年左传质疑·序》、《卫定姜论》、《己卯看花绝句二十四首》详见《日记》第8291～8298页、第8298～8302页、第8302～8306页。

四月初五日，《致伯寅宫保书》，中有：“弟天之僇民，世所共弃，而区区哀残守坠之志，一息尚存，不容少解（懈），非故欲相强也。”对于“吴御史之死，震动人心，古今仅见，而其则甚谬。”先生以为：“国家统绪，授受甚严，凡嗣服者即为子道，千古一揆，何嫌何疑？岂如小民之家，操田宅之券，为血食之计，必明立继书，定其称谓，以杜争讼、绝侵吞乎。吴君未悉古今昧于经义，孤行一意，赴死如归，其忠可矜，而不免于庸人自扰。弟《日记》中有‘迂儒不可与论古’一条，为此发也。执事处此，宜审虑始终，申明大义，固不可为揣测调停之言，而尤当预防数十年后之或有异论。汉、明故事，皆一孔之儒激成之者也。”

是月，先后阅读评介了张子中《说文引蒙辨疑》、陈恭甫所辑《尚书大传》、《经义丛钞》、《过庭录》、杂考《天文》诸书、《复初斋文集》，还为星丈作墓志铭等。

五月初四日，绂丈以初六日七十初度，伯寅来告不称寿、不受礼。为此作《家庆图序》骈文一首、写横帧一幅诒之，并书楹联十六字：

箴聃大龄本之学问
韦平代业中有神仙

《潘绂庭封翁七十家庆图序》文见《日记》第8344～8346页。

这月，先生先后阅校《汉书·礼乐志》，顾访溪《学时详说》、《悔过斋文集》、《史记·货殖列传》、《史记·龟策列传》等。

二十五日，得悉牧庄于是月六日暴患气逆而卒。为之，惊愕，出涕不止，素心将近，吾道益孤，悲哉。

“余之识牧庄，在丙辰、丁巳间，介孙子九以过余，借《日记》数册以去，尝相质经义十余事（识面在甲寅，然未相过从。此所谓识者，学问相知也）。己未各在都，相见甚稀。庚申后别去，不相闻者数年。乙丑牧庄复入都，一再相见，而余旋出都，又不相闻者六七年。辛未余再入都，过从犹未数也。壬申以后，比年盖无三四日之间隔者。其寓常在城东，去余居三四里，隆冬盛暑辄杜步来过，虽潦雨冰雪，不少至，来辄尽日至夜，商榷疑义，综涉四

部，常苦日之不足。深夜必返其所居，或泥淖没髁，严霜载涂，余欲止之宿，或为具车，必力辞。去年尝谓余曰：比不解何故，一二日不来，则心为之不宁也。至秋以病归，今春闻其少瘥，余方日望其复来而竟永诀矣。”

“其学以邃密为主，绝不为外禄喜，搜抉隐义，钩校散逸，尤喜说文，聚书甚夥。又好掌故之学，缀辑无间。余于学散而无纪，健忘而无恒，牧庄独笃好之。余每著一文字，辄能循其始终，道其甘苦，尝曰：近百年来，本末钜细，无不臻极者，君一人而已。其言偏嗜过情，固万非余之所敢当。然实能知之所得者，君之外固无人也，而今何言哉。余之一生交游甚稀，而静念三十年来戚好，远近间凡有相知相爱者，无不先就零落。甚者，或夭绝亡后，其家为虚。每清夜思之，悲惨交集，盖不独天伦骨肉之间，痛心之甚也。呜呼，庄子所谓‘人之小人，天之君子者’，何至于余而并所亲爱者，亦均为天之小人欤!”

二十六日作书致敦夫，以牧庄所寄《三礼通释》八函，属其收入遗笥，将还其家。敦夫，牧庄之妇弟也。牧庄有书数箧，尚留都中，皆节衣缩食辛苦得之。平生屡与余言，恨所蓄之不备而不知心血已尽矣。蠹鱼未化，明膏自煎，穷精敝神，究为何哉?”

六月酷暑,都下入伏始霉变,先生素有湿疾(俗名蛀夏),以涼喝不时,中虚多感,积滞重腿,饮食多废,不日尤甚,几不能读书。虽以为老之将至,生气先尽,但仍然“不可不自振”勉之,虽为疾,还是或坐或卧,读校不绝。是月以阅《易》、《论衡》、《史记》、《学诗详说》、《孔子集语》、《管子》。校《北史》西域北狄传、僭伪附庸传、高丽百济至琉球倭国传等。其中如初八日对顾惟康《学诗详说》略有评述：

“其书虽自称不专汉、宋，然实墨守集、传，攻击郑笺。于郑间有取者而不敢直言其是，于朱亦有一二异者而不敢显言其非，盖嘉兴守张杨园（张载）、陆三鱼之学者，惟恐以一语背朱为得罪圣门，犹不出学究之见。……其说诗所采诸书，颇亦不陋，亦间涉考据，然止獭祭诸家，择其文从顺有当于私臆者，以为折衷，自诩实事求是，以意逆志。而于旨趣之博，制度之精，名物之颐，皆未能探讨，于治乱升降，风会政事之大，四始六义微言之绪及汉儒专门、授受之业，尤所未知，故其论小序，亦出入依违，忽疑忽信，虽如《郑风》亦不敢斥为淫诗，而终横一朱子之辨说，于胸谓序，所指刺忽者，不可尽据，其他无论矣。惟其涵文会意，亦颇有得于经旨，尤甚便于初学，不可废也。”

再如二十四日阅《孔子集语》。“是书孙氏星衍所辑，凡十七卷，分劝学至寓言为十四类。以宋人薛据之书不免挂漏，为之博稽群书，分篇缀录，各注出处，其用意甚善。惟孙氏意在著明先圣遗训，垂为格言，自宜择取精粹，凡庄（子）、列（子）杂家之语悉从裁汰，或辞而辟之，不使乱真。乃别之杂事、遗谶、寓言三门，多载谶纬异端不经之谈事。谱二卷，亦与集语无涉。即

博学至博物十篇中，亦有不当采而采者。盖汉学诸家爱博之过，往往以多为贵，不肯割弃，有宁令人讥其杂，不可令人议其漏者，此其通病也。”

这月初九日，先生记有揭露官场陋习一节：“京官贫不自存，逢一外吏入都，皆考论年世乡谊，曲计攀援，先往投谒，继以宴乐，冀获微润。彼外吏者，少分其脧削所得，以百之一辇致权要，黎其豪末偏散部院，诸司人得锱铢以为庆幸。于是益冥搜广询，得一因缘，动色相告，趋之若鹜，百余年来已成故事。近日，訾郎多于虮虱，穷不聊生，趫附鲤钻，其卑弥甚。彼外吏者，益偃蹇倨侮，凡同乡、同年之乏声气者，则拒不见，亦不答拜，至有涓滴不及者。余深恶其事，前后官京师十余年，从不投此曹一刺，即来拜者，亦不答之，非以矫枉鸣高也，冗官末秩，即大声疾呼，户到为说。人孰从而问之，惟区区之心，廉耻不能尽丧。故自行吾意，以存几希。而彼之过我者，以车马之便，随例遍拜，其意亦本不知有我，我即不答，彼亦不知，故假杜门之辞，以省僦车之费，不夷不惠，为拙为工，岂思表蓬稞以孤麻，堙江河于一掌哉。”这不是空泛议论，在戚属、同乡、同年、同署中人均有之者。

七月入秋，先生身体有所恢复，阅读校注增多，诗词创作亦丰。

初一日阅《会稽掇英集》，略为校之。“此书吾乡杜吉甫明经（丙杰）据文澜阁所录澹生堂旧钞本手写付刊，校雠颇精，末附札记数页，考证极审，然尚有误字。”又订正《嘉泰志》误记一条：“《唐太守题名记》：‘王奉慈永徽二年正月，自潭州都督授五年，拜秦州都督。’案此必是勃海王奉慈，高祖兄蜀王湛之子也。《旧唐书》陇西王博乂传言：奉慈，显庆中为原州都督，薨，谥曰敬，时代正合，惟史文从略，止言其所终之官耳。此记，据宋时石刻误作王奉慈，《嘉泰志》踵其误，以后诸志遂皆沿作王奉慈矣。”

初二日，校《旧唐书》李密、窦建德诸传。记有“陆务观（陆游）《南唐书·后主本纪》：太平兴国三年七月辛卯殂，年四十二，是日七夕也。后主盖以是日生。《旧唐书·乔琳传》，琳居相位八十余日，罢为工部尚书。德宗幸梁洋，琳污贼泚伪，命官军收京师，琳已七十余，临刑叹曰：‘乔琳以七月七日生，亦以此日死，岂非命欤。’古人以七夕生、卒者，有此两事而皆非令终。”此说荒诞，却显先生信命耳。

初四日阅陆祁孙《崇百药斋集》。初集诗十二卷（分寒檠等十集）、词一卷、文六卷，其所生母林太孺人年谱一卷，共二十六卷；续集诗二卷，（合筝柱、香通两集）、文二卷，共四卷；三集诗十卷、文二卷，共十二卷，附其妇钱惠尊诜宜人《五真阁吟稿》诗一卷，都为三十七卷。祁孙少交其同邑张翰风、恽子居、洪孟慈诸君。及后入都，又与徐星伯、包慎伯诸君游，声气遍海内，由嘉庆五年举人，官合肥训导，为阮文达、邓懈筠诸公所称。重以修《安徽省志》保举升江西贵溪县知县，病归，道光甲午卒，年六十三。尝修《郯城县志》，有名于时。余未及见也。其

文笔颇简老，法度亦谨严，而平生最致力者在诗，自喜特甚，其诗亦颇有风力。近体学晚唐者，亦清婉可诵，而痕迹未化，意趣太浅，实不能远过常流也。”

初六日，记有绍兴沥海所赵良及其子国麟事迹。云：“《望溪集》有赠右副都御史《赵公神道碑》云：‘公讳良，字维林，浙江绍兴府沥海所人，处士临若公之子。国初避乱东游齐、鲁，遇族父于泰安，遂旅其地，以医自活。娶淮阴江翁女，康熙癸丑生子国麟。甫数月而临若公来就养。公与江夫人力致鱼菽，虽居穷巷，远方畸人、老宿多造门。’豫章吴慎安尝叹曰：‘临若之室，仅容膝可旋身，而入其中则旷如也’。康熙二十三年，临若公卒。公及江夫人相继没。又二十余年，国麟巡抚安徽，以乾隆元年覃恩诰赠如其官。案国麟，字仁圃，康熙四十八年己丑科进士，乾隆四年正月拜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六年六月降调，七年正月起为礼部尚书，七月免，十六年卒。其事国史名臣传不具，亦未见其碑志。而全谢山（祖望）《鲒琦亭集》方侍郎神道碑言：‘河督高君（高斌）思倾公，会新拜泰安为辅臣，而召河间魏尚书（廷珍）为总宪，朝廷争相告曰：是皆方侍郎所为，若不共排之，将吾辈无地可置身矣。’是赵公固一时之名臣，与望溪为执友，望溪称之为君子。惜其事未有表见者。沥海所属会稽（县），而越人无知有赵公者。幸望溪此碑著之，当向山东人求其碑状及泰安郡、县志，考其行事，补入吾邑志传，即望溪此文述赠公穷约养亲之乐，亦自油然有真味，当附载赵公传中者也。”

初十日，“阅《鲒崎亭集》，比日觉志气衰落，阅此以自振竦。”十一日，阅《望溪集》，“其文多君子之格言，实吾辈之刑书也。”’

十六日，子缜赠《词律拾遗》四册。“今人德清徐本立诚庵所纂，前有俞荫甫序。共八卷，以拾万红友之遗也。卷一至卷六为补词及补体，补万书未收之调、未备之体也。凡补一百六十五调、四百九十五体；卷七、卷八为补注订万注之未尽也。缀辑考证俱有依据。

十七日阅《老学庵笔记》，“其中有‘赐无畏’一条。谓唐季五代功臣多赐‘无畏’，引韩惺《金銮密记》云云。当是始于唐末。案王棨《本事诗》载：玄宗召李白赋宫中行乐诗，白顿首曰：‘宁王赐臣酒，今已醉，倘陛下赐臣无畏，始可尽臣薄技’，是唐初早有此语也。无畏盖即汉时入朝不趋等事之遗意。”

二十一日，记有“唐诗及小说，往往有可以证古训者。如诗‘桑柔谁能执，热逝不以濯’，执热犹言当暑。故《左传》北宫文子之释诗云：‘礼之于政，如热之有濯也，濯以救热，何患之有。’言当热时，必濯水以求凉也。《杜甫集》中有《多病执热奉怀李尚书》诗云：‘衰年正苦病侵淩，首夏何须气郁蒸’，可知唐以前皆如是解矣。《汉书·张良传》：‘良间从容步游下邳汜上’。服虔注：‘汜，音颐，楚人谓桥曰汜’。（今本皆作圮，由宋初张秘妄校改），此以汜通作圮也。《太平广

记》卷二百九十八神部引《广异记》：垂拱中太学进士郑生晓度洛桥下，见一艳女欲赴水，载与归，号曰汜人，是亦以得之桥下，故曰汜矣。”

二十八日，姜仲白来夜饭，至二更后去，谈诸暨包村人包立身抗击太平军事甚详，见《日记》第8441～8443页。先生说，曾于壬戌（1862年）冬，有书包立身事文，久失其稿，又著吊包村文，亦言之未详，故书此以记其详。因观点不同，先生之态度可见，故简录之，以供史学者研究。

是月，先生作诗甚多，计有初五日《己卯岁郑司农生日作》。初九日《为顺德梁福草封翁题兰册》二律。十八日《哭孝仲》六首。二十三日《寄怀程雨亭太守（仪洛）》一首、《答云门自春中连得沪上书今未知消息》一首、《唁仲彝衔恤归夷陵将谋返越》一首。二十六日，补作《山谷生日偕敦夫子缜鼎甫诸君小集》一首、《七月三日独游十刹海》一首、《六月二十一日欧阳文忠公生偕敦夫汝翼禔庵子缜紫泉小集》一首。今录末一首如下：

汉后文章韩欧阳，群儿毁伤毋乃狂。
月宿南斗日无考，兖公月日言能详。
公之说诗吾无取，公疑系辞毋乃鲁。
独有师法契康成，搜剔丛残出诗谱。
立朝大节尤嶙峋，韩富文范相比伦。
政事辉映已千古，风流偏被人寰春。
钟鼓清时暂行乐，同情还谱堕下曲。
荷花深恐惊鸳鸯，皂荚今犹梦鹳鸹。
有琴一张酒一壶，银枪棒盏我亦无。
坐中不乏苏梅徒，公今不乐胡为乎？

八月初一日起读《尔雅正义》兼读《说文段注》。

初七日校读《荀子》，郝兰皋《补注》，颇多穿凿迂曲之处，其精确者，王氏《读书杂志》已采之。初九日，言《荀子·成相篇》中的“成相”二字及此篇音节，即后世弹祠之祖，并作了考证。详见《日记》第8449、8450页。

八月十一日起，日记转入《荀学斋日记》甲集下。

十六日起读《特牲馈食礼》。

十七日得敦夫之兄益夫八月一日记，言阮孝林（福昌）故世。孝林，己未举人，尝入訾为刑部主事，颇不修边幅，而才锋隽颖，文笔清雅，经史、小学亦都略涉，尤善作画，人物山水俱工致秀丽，吾邑之才美实无踰之者。惜嗜好太多，不能专精，乡人以狂士目之。而极服膺于余，每与之言，学问诗赋皆悉其阃奥。以母年逾八十，辛未后不赴会试，今年甫过四十，遽从委化，可叹惜也。其妇为故山东巡抚陈慈圃（庆偕）之女，美而甚贤。孝林数为余言之。”

二十日，阅钱溉亭《淮南天文训补注》。

二十一日在京师琉璃厂阅市，见《植物名实图考》。此书“六十卷，固始吴瀚斋中丞（其浚）著，蒙自陆家堂中丞（荫谷）校刻，有道光二十六陆所作序。图绘极精，考亦援证博雅。其三十八卷以上分谷、蔬、山草、隰草、石草、水草、蔓草、芳草、毒草、群芳、果、木十二类，以后为长编，别为卷，分类如前。”

二十三日，阅李香子《说字辨字正俗》。

二十四日阅晋江陈颂南侍御（庆镛）《籀经堂集》十四卷。其门人光泽何比部秋涛所编。《补遗》二卷，其同邑龚编修显曾所编，而以活字版印行之。”“侍御一代伟人，穷经博览，所著甚多……皆未见于世，是集仅一斑，而所收策问、钟鼎、考跋诸篇，湛深古义，弥可宝遗，其与李子迪检讨（光彦）书论等韵，双声之学，尤咳洽绝伦。”

是月有诗作九篇。如二十六日《秋日对雨追悼牧庄之作》、《仲弟再周忌日夜坐闻雨作》、《夜梦经会稽明桑村见秋山红叶其实村本无山也》、《简同人为西山之游》四首。二十七日作《包英姑歌》一首，以悼念诸暨包立身之妹。二十九日作《伤逝》四首，为谢增、阮福昌、杨仲愈、李国彬四君故世作。

九月初一日阅《古经解钩沉》。初二日阅朱伯原（长文）《墨池编》，雍正间吴下刻本，犹二十卷之旧，其中真字皆缺笔，避宋仁宗嫌名，盖本宋椠翻者。《四库》仅收六卷，合并本未见此本也，亦多误字。前有玉若霖（澍）序，后附明朱象贤《印典》八卷。初六日阅《隋书》。初七、八日校《隋书》及《北史》。十三、十四、十五、十六日校《周书》及《北史》是月，校阅《隋书》并为之揭橥。

近几个月来，先生校阅诸书特多，想必是故友死亡、离京外任较多，虽有伯寅等数位知己仍馈银不辍，仍不免夏典冬衣，春典错杂，以度困窘。唯多校勘以增收入，如印结局每月印结银已有十两、廿两增至三十、四十余两矣。

十月，仍校阅群书，如《隋书》天文志，续汉、晋、宋天文各志。《明史》本纪等外，尚专阅以下诸书：

初九日，阅金华张丹村太守（作楠）《翠薇山房数学》，共十五种。“丹邨之学，虽兼中西，然自八线类编以下，皆专门西学。大恉以八线驭弧角，以对数驭八线，谓八线以加减代乘除，最为简妙直截。凡古之开方、三乘方求矢重差缀术诸法，皆可不用，即其仓田通法，虽以少广句股御粟布方田，亦多以三角八线借根方释之，实西学之专门也。”

二十六日，阅丁氏（俭卿）《颐志斋丛书》，凡二十种。先生称其“汴宋石经之存，莫多于此。”“略考其与唐石经及今本之异同，尤足以广异闻。”“《读经说》一卷，示人读书之法，兼取汉、宋，简而有要，切而不苛，乃其道光庚寅主讲盐城表海书院时作，以劝学者也。”“《礼记释注》，辨析诂训，最为典密。”“亦郑学之专门，与段氏《周礼汉读考》多可参证。”

十一月初一日，张香涛以妇丧来赴，已三娶矣，王廉生之妹也。前日托云门来乞輓联，今日书予之：

蜀锦浣桃花，正画筴西来，绣帨东至，指官阁猩棠开日，翟帔催妆，话昔贤三趣邀封，偕老将同欧兖国。

宫眉伴莲烛，奈金銮甫晬，玉燕重怀，趁蓐房黄菊斜时，鸾钗遽判，赢垂老六如补偈，悼亡还续魏城君。①

①香涛任四川学政时，亲迎妇翁龙安太守署，生两女以娩后亡。

为弢夫书七言楹帖：

笛谱已销隋苑月

经帷长映赤城霞

先生一生在书写联、帖、序、文等甚多，虽厌弃，但戚友、知己间不得不为之。当然有的是为了赚钱，为还债不得不为之，如姚宝勋为其祖母八十寿序，于丙子岁讬肯夫以五十金说定，至丁丑秋复以金属许竹篬转致，今遂其了之。此类文难作，往往与受主所望，同事实不符，“余文无苟作者。文中即姚氏家世立论，皆有意义。宝勋之父文枏，以赀官芦运同知（芦盐运司同知衔），旋以道员用，加布政司衔。宝勋童騃以赀得户部郎，亦擢道员加二品衔，皆钻穴之尤。文中勉以承祖德，娱寿母，亦忠厚之义也。此等文字，荀子所谓‘以为禽犊者，例不存稿，聊记其旨，以见主言之无所苟而已’。”

这月，先生集中阅读丁俭卿《颐志斋丛书》各种。初七日阅《尚书余论》，凡二十三条。“条为一篇，皆明《古文尚书》及《孔传》之为王肃伪作。曰余论者，以申阎、惠诸君之说，畅发其所未及。”初八日，阅《郑氏诗谱考正》。“以欧阳文忠《诗谱捕亡》为本，录《正义》所载谱文于前，其下旁行之谱。据《正义》所言郑氏左方世次，排比缀辑，正欧本之脱误。又谱其所缺《三颂》之谱，而末别为总谱。据《史记年表》，起共和以来，上溯厉王元年，下讫定王八年，以附于后。于郑君谱学极为有功，考《诗》之世次者，莫详于此矣。”十二日，阅《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校正》，“以毛晋津逮秘书本为主，参考群书所引，补正阙误，比列异同，甚为详密。”晚阅《陆疏校正》，“并取段氏说文草木鸟隹部校之。”十四日，阅《毛郑诗释》，兼释传笺之古义雅训也。“此为丁氏少年所辑述，本曰《毛诗古学》，后以兼申郑旨，改题今名。其首仍冠以《毛诗古学》原序，备载毛诗之本于子夏、荀卿，及所采《古文尚书》、《周官仪礼》、《礼记》、《左传》、《孟子》之文，又与《国语》合者七条，与《吕览》、《淮南》合者各一条，又兼取《韩诗》者十四条。皆罗列证明，以著其学之最古而尤博。治《毛诗》者不可不读此序也。”十八日，阅《诗考捕注》。“以王厚斋诗考，乃草创之本。或前后重出，或编次失当，或援据未精，且多传写伪舛，世无善本，因为之补正。著其所出，详其所略，加案字以别于旧，复为《补遗》一卷。较王氏原书详密过倍。二十三日阅《禹贡集释》。“凡三卷，节取自马、郑注伪孔传以至国朝诸儒之说，而后低一格为之疏通，或加辨正，务取简明切要，便于循省，初学者所宜首从事者也。”二十四日续阅，考云梦二泽；二十五日再学，考物产之名，不可以一例求者。

这月，先生还阅读介绍张寿谷(澍)《续黔书》十八卷、徐彝舟(嘉)《读书杂识》、《求阙斋读书录》（王鼎丞所辑）、马竹吾《周礼目耕帖》等。

另外，有续伤逝二首，吊余辉庭舍人、王杏泉教谕，皆先生中表兄也。

十二月先生开始系统重温《周礼》注疏、义疏及王氏《周官》新义，兼考

《释文校勘记》等书，并加点校，如初一日就点校注疏五叶、义疏七叶、新义七叶，并望“此后无间，亦可谓晚学也已。”实际上，据是月《日记》所载统计，仅温五天，共点注疏三十八叶、义疏三十八页、新义十五叶。可见在俗事缠绕中要坐下来读书做学问之难。

十五日、二十三日，记有读王侍读先谦所辑《读东华录》，属乾隆一朝，共四十八册，计一百二十卷。

这月作有《己卯生日诸同人携酒枉过醉后放歌》一首、《观宣府伶人演仕女图剧》一首、《腊八大雪献之走使惠银赋谢》一首、《竹篔自蜀中奉使归侯致馈岁赋诗奉谢》一首、《冬日坐弢夫斋头偕汝翼云门茗话》一首、《弢夫云门冬日馈海棠》一首、《为弢夫生日汝翼禔庵云门生日亦相先后因用东坡集中子由生日诗韵柬诸君》一首、《谢敦夫太史馈岁酒》二首、《岁暮得子缜长沙书》一首，共十首。

这月，先生前后得到伯寅二十两、竹篔四十两、桐孙十两、献之十金，方得卒岁。

这年正月，中国安集延人布鲁特扰边，朝廷命刘锦棠破之。二月，丁宝桢因修都江堰办理乖方，降级留任。四月，崇厚奏俄允查禁安集延人犯边，并请免逃入境内回民；朝廷命左宗棠酌度办理。五月，朝廷任命崇厚出使俄国钦差大臣，嗣令其便宜行事。六月，罗应旒请整学校，练兵民，精机器及参西洋法例。七月，命湖并严惩拐卖妇女之囤户。八月，以崇厚与俄所订交还伊犁条约，交左宗棠等审议。九月，王先谦条陈洋务事宜。李锡才败死，冯子材班师。十月，丁日昌奏整顿轮船水师应延致西人教练。十一月，穆宗实录、宝训成。哥老会徒已革总兵杨海青谋于贵州省城起事，被发觉，处死。崇厚因擅自回京，朝廷议开缺听候部议，并将其所订条约发交廷议。十二月，张之洞等交章弹劾崇厚丧权辱国，并请备战，旋将崇厚革职拿问。是岁，出口值七千二百二十八万一千二百六十二两，进口值八千二百二十二万七千四百二十四两，征货税银千三百五十三万一千零六十七两。借汇丰银行款千六百十五万两。架设天津大沽间电线。英国人在上海创印英文《文汇报》。上海徐家汇天主教堂创刊《益闻录》。

在浙江，六月二十九日，日本废琉球国王，改置冲绳县。清政府照日本使官，提出反对，日本置之不理。朝廷命定海戒严。八月间，镇海县大旱，河床龟裂，禾苗枯死。是年，因山西频年灾情严重，朝廷命浙江提银三万两协济山西省灾情。



刘基被『羁管』绍兴

余德余



刘基（1311～1375）字伯温，浙江青田人，元末明初著名的政治家、哲学字、军事家和文学家。在其一生65年的生涯中，其中44岁～46岁的两年两月被羁管绍兴，虽然时间不长，只占其人生岁月的三十分之一，但在这两年多的时间，对其思想的发展和文学创作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

一、反对招抚方国珍而遭“羁管绍兴”

元至正十二年（1352）三月，方国珍接受朝廷招安后，旋又反悔，再次遁入海上，诱杀时任浙东道宣慰使都元帅泰不华，朝廷命令江浙行省重新集结兵力征讨之。时任浙东元帅府都事的刘基奔赴庆元路参与战事，力主加固城池，整备战具。七月，徐寿辉攻克余杭，行省参政樊执敬罹难，杭州失陷。在此之际，海上方国珍连续发起了对台州、温州的袭击，至正十二年十一月，朝廷再次命令江浙行省征讨方国珍。在大军压境面前，方国珍迫于压力，故伎重演，于次年正月表示愿意投降。十三年三月，朝廷命令江浙行省右丞特哩特穆尔和江南行台御使尊达实哩共同前往招降方国珍。此时，刘基由浙东元帅府都事迁为江浙行省都事。十月，朝廷授方国珍以五品流官徽州路治中，同时诏令其交纳船只，解散徒众，并强行督其赴任，方国珍及其兄弟疑惧不受。这就表明他此前的愿意投降是假，一是为了试探朝廷的决策，二是为拖延时间，积蓄力量，为再次发动进攻作准备。不久，方国珍兄弟又一次入海占据海道，阻断

朝廷南粮北运。

对于方国珍的屡降屡叛，朝廷上下意见大相径庭。方国珍在与元朝当局周旋中，深知朝廷、地方主政官吏的腐败，掌握了执政者的贪鄙弱点，因此，每遇危急时刻，即以纳款受降为缓兵之计，将从朝廷那儿劫来的大船小船的金银珠宝运往京师和行省握有生杀大权的官员手里，因而屡次得到权贵们的庇护，即使杀死了地方官员，也能转危为安。《明史·方国珍传》载曰："天下承平，国珍兄弟倡乱海上，有司惮于用兵，一意招抚。"方国珍"诱杀台州路达鲁花赤泰不华，亡入海。使人潜至京师，赂诸权贵，仍许降。"这种屡降屡叛的策略使方国珍屡屡受益，小造反得小官，大造反得大官。为此他屡试不误。

作为地方官吏的刘基谂知方国珍屡降屡叛给朝廷和沿海百姓造成的危害，为此他竭力主张：方国珍兄弟为"首乱"者，罪不可赦，宜追捕诛杀之，而其他"协从"者则宜宽大，予以招安。此议得到了行省大臣的采纳，并上报朝廷。方国珍得到信息后深为恐惧，立即派人"重赂"刘基，刘基"却而不受，执前议益坚"[①]。此招不行，方国珍转而"使人浮海至京师"，向朝廷大员行贿。有钱能使鬼推磨。十月元朝朝廷又一次作出了招安方国珍的决策，授予方国珍兄弟更大的官职；同时否决了江浙行省的建议，认为是"伤朝廷好生之仁，且擅作威福"，罢免了特哩特穆尔左丞的官职，刘基也被革职，且"羁管绍兴"[②]。刘基忠心耿耿，为朝廷"平乱"出谋画策，反而遭革职"羁管绍兴"的处分，其内心悲愤难抑之情溢于言表："精卫衔石空有心，口角流血天不知"[③]，"贾谊奏书哀自哭，屈原心事苦谁论?"[④]，他自比精卫、屈原，怨恨无人能理解他的忠心，"天路阻且修，不得羽翼翔"，"况有蛟与蛇，磨牙塞川梁"，"子亦慎所适，我亦行归藏"[⑤]，又嗟叹自己不能象雄鹰那样飞翔，直达最高统治者，更何况沿途布满了坏人呢，我还是算了吧！貌似平静，实是愤慨难平。

二、"羁管绍兴"的生涯

刘基于至正十三年（1253）十月被罢免了江浙行省都事之职而"羁管绍兴"，那么，他是何时到达绍兴的呢?刘基在《游云门记》中自谓："甲午之岁始至越。"《牡丹会诗序》说得更为明确："甲午之春，余避地会稽"，《棣萼轩记》开篇云："至正十四年（1254）春二月，予以事至萧山，……明日，予还居越。""甲午"即至正十四年，"越"、"会稽"皆为绍兴的古称，绍兴原为战国时期越国的都城，称

①明·黄伯生《刘基行状》，《刘基集·附录》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②同上。
③《登高丘而望远海》，《刘基集》卷二十一。
④《次韵张德平见寄》，《刘基集》卷二十三。
⑤《赠周宗道六十四韵》，《刘基集》卷二十。

越地，秦汉时期置会稽郡，隋唐北宋改称越州，南宋始称绍兴。“羁管”原是拘管之意，即将犯罪的官员安置某地，接受当地官员的监督管制，行动有一定的限制。但从刘基在绍兴时期的活动来看，当地官员对他的看管较为放松，他在绍兴路以及下辖之县的活动较为自由。黄伯生《行状》云：“公在绍兴，放浪山水，以诗文自娱。时与好事者游云门诸山，皆有记。”道光《会稽县志稿·寓贤》记载：“（刘基）居绍兴，放浪山水，以诗文自娱，凡新、剡、萧、稽诸名胜，游赏殆遍，而盘桓云门诸山最久，俱有记。”刘基“羁管绍兴”时，携带妻儿，寄居于山阴县城塔山古刹下南边王文明家，他在自己写的《王文明墓志铭》一文中说：“基自台来越，寓其家南楼，居数月，麟为诗益大进，基每叹而异之，谓王氏有佳子弟，必当复振矣。”王文明，名麟，文明其字也。曾从刘基学诗。王文明之叔王元实，与刘基来往甚勤，相处十分融洽。刘基曾应王元实之请，为其书斋作《裕轩记》、《王元实裕斋铭》。刘基对于寄居王文明之家的南楼曾作诗《遣兴六首》，其一描绘道：

避地适他乡，息肩谢羁束。
生事未有涯，暂止聊自足。
南园实清旷，可以永幽独。
层楼面群山，俯见湖水绿。
杂英被郊甸，鱼鸟得栖宿。
登临且慰意，未暇计远躅。
圣贤有遗训，知命夫何卜？

可见对当时的新居还是十分满意的。

刘基在绍兴时期交游的对象主要有三类人：一是宗教人士（和尚、道士），如塔山宝林禅寺住持别峰上人、能仁寺僧用章上人、开元寺僧圆（玄）中机上人、云门寺僧若上人、普济寺僧砥上人、道士张玄中等；二是读书人，如山阴王元实、王文明、余邦用、江仲谦（医生），会稽富好礼、黄中立、祝茂卿、吴以时，萧山包与善兄弟、程邦民、贾性之，诸暨王冕，还有天台朱伯言，东平李子庚等；三是下层官吏，如池阴府史余希江、绍兴路宣慰使王明则、稽山书院山长张用中、萧山主簿越某、新昌县训导吕不用等。交游方式主要是游览胜迹、诗文酬唱。如至正十四年（1254）暮春参与祝茂卿家举办的牡丹会，与会者“取唐人罗邺诗二句十四字为韵，命探丸，信所得为诗，不限以体制。”诗成，众人推举刘基作序，欣而命笔，为《牡丹套诗序》。同年《三月八日偕徐成中、杨澄源、李子庚、吴溥泉、董朝宗、黄中立、程邦民、汤仲谋、王文明游南镇得禽字》、《四月二十二日郊外游得水字》、《五月三日会王氏南楼得激字》、《六月十八日自天章入城作》、《七月四日自深谷之灵峰作》、《次韵和朱伯言自云门之天衣途中作》、《普济寺遣怀》、《次韵和王文明雨中杂兴四首》、《登卧龙山写怀二十八韵》、《题富好礼所畜村乐图》、《柯桥灵秘寺即景赠基上人》等。至正十五年（1255）春又与天台朱右、东平李子庚、会稽富好礼和开元寺僧玄中等同游云门诸景，写出了《游云门记》、《自越城至平水记》、《活水源记》、

《松风阁记》等一系列优美写景抒情散文。

刘基在“羁管绍兴”期间的交游中，值得一提的是与著名画家、诗人王冕的交往，他在《王原章诗集序》中写道：“余在杭时，闻会稽王原章为诗，士大夫之工诗者为称道之，恨不能识也。至正甲午，盗起瓯、括间，予避地之会稽，始得尽观原章所为诗。”他们互相倡和，甚是相得，刘基曾作七言古诗《雪晴偶兴因以成篇》，王冕随作《雪中次韵答刘提举》，两诗风格豪放，气势恢宏。他们的朋友吴孟思去世后，王冕曾作《挽吴孟思》诗悼念，刘基为之撰写《吴孟思墓志铭》。王冕虽然年龄大刘基25岁，但仍视刘基为同道知已，当其诗集付梓之时，特请刘基为之作序，刘基也乐于执笔，称其诗“直而不绞，质而不俚，豪而不诞，奇而不怪，博而不滥，有忠君爱民之情，去恶拔邪之志，恳恳惻惻，见于词意之表，非徒作，因大敬焉。”给予了高度评价。刘基离别绍兴后，王冕曾写过五律《题青田山房》诗：“青田刘处士，潇洒好山房。夜月移花磴，春云动石床。书声通远谷，琴响应清商。我欲相依住，临流筑草堂。”“青田山房”为刘基至正十八年（1258）弃官归故里至二十年（1260）三月应朱元璋之聘时的书斋名，王冕卒年为至正十九年(1359)，此诗当写于至正十八年或十九年之间，足见王冕对刘基的深厚感情。

刘基在“羁管绍兴”前，声名已经播扬，来绍兴后，中下层官员和一般读书人，还有和尚、道士乐与之交游，社会下层人士中仰慕刘基者甚多，求其写序、记、墓志铭、碑、铭一类的应用文甚多。如至正十五年三月，刘基由杭州经萧山回绍兴途中，曾应萧山县主簿赵某之请而写《北岭将军庙碑》，应山阴县达鲁噶齐鼎鼎之请撰写《山阴孔子庙碑》。同年七月应诸暨知州伯不花侯之请，撰写《诸暨州重修州学记》，为名贤绍兴路总管宋文瓒作《前江淮都转运盐使宋公政绩记》。住户又是学生王文明病逝，为其作《王文明墓志铭》。至正十四年暮春，会稽祝茂卿举办牡丹诗会，撰写《牡丹会诗序》。同年，道士张玄中来访宝林禅寺高僧别峰上人，赋诗倡和，将归，应别峰上人之请作《道士张玄中归桐柏观诗序》，为柯亭灵秘寺守基上人作《横碧楼记》，应萧山包与善之请作《棣萼轩记》，为住户王元实作《裕轩记》，为会稽黄中立作《尚节亭记》，为山阴余邦用作《寿萱堂记》。此外如《绍兴能仁寺钟铭》、《王原（元）实裕斋铭》、《奎上人耘杖铭》等，估计笔资甚丰，对于改善寄居生活大有好处。

三、“羁管绍兴”时期的思想与诗文创作

刘基原有高远志向和实现志向采取的兢兢业业的行动，但受元朝高层当权者的阻遏，被剥夺了参与政治活动的权力。在此情况下，“放浪山水，以诗文自娱”乃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他在《题王右军兰亭帖》中写道：“王右军抱济世之才而不用，观其与桓温戒谢万之语，可以知其人矣。放浪山水，抑岂其

本心哉！临文感痛，良有以也。而独以能书称于世，悲乎！”这段话真切地反映了他在“羁管”时期的思想状态：一方面，他非常理智，写于此时的《感时述事十首》，对元朝的吏治、军事、农政、刑法、盐法、钞法等种种弊端逐一剖析，究其原因，寻找症结，在第七首中着重反思了遭致革职羁管处分的原由：“好生虽大德，纵恶非圣裁。……招安乃倡议，和者声如雷。天高豹关远，日月照不该。俱曰贼有神，讨之则蒙灾。大臣怨及己，相视若衔枚。阿谀就姑息，华绂被死灰。奸宄争效尤，无风自扬埃。啸聚逞强力，谓是爵禄媒。黎民亦何辜，骨肉散草莱。倾家事守御，反以结嫌猜。恸哭浮云黑，悲风为徘徊。”朝廷当权者为了维护“天下承平”的虚幻政局，“惮于用兵，一意招抚”，而方国珍也摸准了执政者的思想动向，屡屡以诈降相引诱，耿直忠心的他遭致猜忌而被处分也就理所当然了；另一方面，对于挫折愤恨不甘，又无奈悲伤：“谁言纵壑鱼，竟为触藩羝。长夜起啸叹，邪气凭我脐。梦登舜苍梧，遥望禹会稽。援琴奏将归，日暮增惨凄。盲飚正滃勃，孤凤将安栖”[①]。为此，只有借“放浪山水，以诗文自娱”平息内心的伤痛。幸运的是古城绍兴特有的人文自然景观使其心灵创痛得到了抚慰，“兹邦控吴越，名胜闻自昔。湖山竞奇丽，物产亦充斥。交游尚质俭，而不事华饰。况有良友朋，时来慰岑寂。全家免寒饿，几欲忘旅客。”[②]尤其是会稽山水别具特色：“虽有层峦复冈，而无梯磴攀陡之劳；大湖长溪，而无激冲漂覆之虞。于是适意游赏者，莫不乐往而忘疲焉。”[③]在与僧人道士频繁交往中，此时的心境与万物皆空的佛教教义容易契合，佛寺古刹座落于风景秀丽清静寂寥之处：“听之可以解烦黩，涤昏秽，旷神怡情，恬淡寂寥，逍遥太空，与造化游。宜乎适意山林之士乐之而不能违也。”[④]而与甘于清贫，不愿出仕的读书人交游，有“无求多于口腹”，“无求多于衣服”，“无求多于盘乐玩好”，“无求欲尚人”——“何往而不裕哉”[⑤]的王元实；“抱才未用，而早以节立志”（《尚节亭记》）的黄中立；“无忘其先人，取诗人之旨而服膺焉，去其所戒而敦其所劝，使祖考慰于上，而子孙法于下”[⑥]的包与善兄弟；“放旷豁达，以尽主客之情”、“揖让酬酢，所以尽朋友之义；凝志澄神，所以杜纵欲之门；抑扬歌咏，所以抒幽深之抱”[⑦]的祝茂卿；精于医术，而又“不取馈谢”[⑧]的良医江仲谦等。他们的处

①五言古诗《遣怀》，《刘基集》卷二十。
②五言古诗《丙申二月别绍兴诸公》，《刘基集》卷二十。
③《游云门记》，《刘基集》卷三。
④《松风阁记》，《刘基集》卷三。
⑤《裕斋记》，《刘基集》卷三。
⑥《棣萼轩记》，《刘基集》卷三。
⑦《牡丹会诗序》，《刘基集》卷二。
⑧《赠医学录江仲谦序》，《刘基集》卷二。

世思想为人品德，与刘基所持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传统思想相一致。这些都为刘基抚慰、消融政治上的失意，提供了难得的物境和心境。

然而，综观刘基与方外高僧，亲朋好友诗文相酬中，内心又何曾有片刻的安宁？至正十四年十一月，元丞相脱脱在高邮大败张士诚部时，他闻讯赋诗：“闻道高邮已撤围，却愁淮甸未全归。圣朝雅重怀柔策，诸将当知虏掠非。尧帝封疆元荡荡，世皇功业甚巍巍。忠臣义士同休戚，纵欲寻安总祸机。”[①]壮心难泯，对国事战局十分关注。平日驻足绍兴先贤遗迹，也会蓦然感怀激烈：客居王氏南楼，“登楼望禹穴，感慨生感激”，“惟见野田中，白骨杂瓦砾。忧来歌一曲，客泪再三滴”，[②]深为百姓遭受乱离之苦而忧虑；游历兰亭山下，作《题王右军帖》为王羲之不遇而感喟；徜徉沈园之中，捧读放翁之作，又为其报国壮志“男儿抱志气，宁肯甘衰朽！”[③]所感染；与奎上人游普济寺，在星光潋滟、白华如水的秋夜，诗人置身于古刹万籁俱静的环境中，感悟的不是佛理空灵，而是“愿闻四海销兵甲，早种梧桐待凤凰”，[④]深为战乱频繁，人才困厄而叹息。

刘基在“羁管绍兴”两年多的时间里，“放浪山水，以诗文自娱”，写下了诗歌近400余首，其中有歌行、五言古、七言古、五律、七律、五言绝句、六言绝句、七言绝句、词；文50余篇，其中有序、记、跋、铭、碑铭、墓志铭，可谓是众体皆备。在这两年中，正是刘基处于壮年有为时期，也是其出与入、穷与达两种思想的激烈碰撞时期，更是其文学创作处于高峰时期。

唐代诗人王勃《滕王阁序》中有“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的联句，说的是人间有了丰盛精美的物产，上天也会视为珍宝；洪都所以被称为灵异的名胜之地，因为东汉时曾出现过正直有学问的高士，他们之间有着纯洁的友谊。如果把这联句移用于绍兴，也是完全贴切的。绍兴的地理自然孕育了无数的文化名人，文化名人的历史功绩又丰富了绍兴的人文自然景观，它们互为联动，互为作用，自然景观因名人而更显耀，文化名人因自然景观而永世长存。

①七律《闻高邮纳款漫成口号》，《刘基集》卷二十三。
②五言古诗《五月三日王氏南楼得激字》，《刘基集》卷二十。
③《题放翁晚兴诗后》，《刘基集》卷二十。
④七律《普济寺遣怀》，《刘基集》卷二十三。



辛亥志士沈钧业

□ 蔡 彦

沈钧业(1884～1951),字复生,又字复声,号复庵,浙江绍兴人。他曾投身于辛亥革命,在一生中写下了不少战斗诗篇,是一位民主主义战士和诗人。

沈钧业的青少年时代,正是中国近代社会急剧变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时期。这时清王朝的统治极端腐败,帝国主义的侵略已发展到对中国实行瓜分,中华民族已濒临亡国灭族的边缘;处在帝国主义和清王朝双重压迫下的中国人民,从痛苦的挣扎中逐渐觉醒;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被镇压,说明清朝政府已成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支柱和走狗;改良主义愈来愈走向反动而被人们唾弃,革命烽火已开始在全国蔓延。这就极大地激发了广大爱国知识分子的觉悟,他们满怀爱国热忱,毅然以拯救中华民族为已任,勇敢地投入到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斗争中来,沈钧业就是其中的战斗骨干之一。

一、辛亥志士 勇猛精进

沈钧业生于绍兴农村——张墅大湮,今镜湖新区张市。张墅附近有大渡、上下官渡、狭猱湖等河湖,明清两代张墅共出过7位进士,民谣称其为“大地方”。据民国十七年(1928)《绍兴县各村、里筹备区组成,村、里、邻户数报告表》:张墅村总户数为390,邻数为37、里数为6,在绍兴属中等偏上村子。又据民国二十七年(1938)《绍兴县志资料第一辑·氏族》所记:沈宗文,谱行宗三,元末明初时赘于张墅田氏,为此族居张墅之始。此族之裔有分徙于广东潮州及江西南昌等处者。今张市沈氏祠堂第二进东西两侧墙壁上嵌有“二十五世廷”、“二

十六世元”等用来取名字辈份的砖块，依次为“廷、元、世、振、祖、业、家、传、成、□、□、守、先、泽、长、贻”，可推知沈钧业应为三十世。他从小颖悟勤学，16岁就中了秀才，后进入绍兴府学堂。据光绪二十八年（1902）《绍兴府学堂肄业各学生积分通表》：“沈钧业，经学86分，史学100分，文学160分，格致125分，算学200分，外国文177分，积分通数848分”，成绩优异。据光绪二十八年（1902）《绍兴府学堂校员题名》：“徐锡麟，字伯荪，山阴县人。教习（算学）。每月修银40圆”。其算学老师即徐锡麟。

光绪三十年（1904），沈钧业和徐锡麟同在绍兴府学堂执教，参加了革命团体光复会。光绪三十一年（1905），沈钧业担任大通学堂教习。这年冬天，他东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学习。在日本期间，经章太炎介绍，加入了同盟会。光绪三十三年（1907）6月，徐锡麟和秋瑾在皖浙两省同时起义的计划失败，相继被捕就义。据陶成章《浙案纪略》：“锡麟既就义，清吏至锡麟公馆验视，……又从锡麟书籍检出书信数件，而以沈钧业及其弟伟函件为最多。”是时，共“搜获先生密书8件”（中国史学会《辛亥革命（三）》第84页），因之派兵围张墅，至其家中搜捕，因本人在日本未果。案发后，沈钧业受到清政府的通缉和搜捕。宣统元年（1909）12月，在光复会会员龚味生的“促成”下，他由日本避居南洋群岛。据沈钧业《南游杂诗（秀水龚生）》：“秀水龚生实可人，冰心一片见天真，如君合作梅家婿，九鼎长悬一钓纶”。自注：“龚味生，宝铨君，为太炎师之婿，虽未至南洋，而余之行实君所促成也”。又据章太炎《龚味生传略》说：“焕卿性急，与同盟会人不相能，未生常调护之……清政府遣侦探东来（日本）者甚众，味生惧事泄，乃取同盟会《浙党籍》焚之，故浙人无被祸者……”。通过陶成章介绍，在爪哇泗水（今印度尼西亚苏腊巴亚）参加办《汉文新报》。据宣统元年（1909）9月17日《陶成章致李燮和、王若愚信》：“此次南来者，一为沈君复生，名钧业，故友徐君得意弟子；前曾在大阪商会一年，商情甚悉，性情和平，用心精细，学问亦甚佳，不易得之人才也。”在另一封致李燮和的信中，陶成章又说：“沈君才具、学问、人品均佳，前在大阪商会中，故东方一面之商情，颇行熟悉。……将来东南声气可通，亦一佳事也。如能承顶来，沈君才堪当经理之任，与兄等面晤之后，当可知其才能矣。”这家报纸除刊登商业信息之外，主要是介绍国内革命的情况，在华侨中间撒播革命思想。沈钧业曾亲自为该报撰写过题为“故国不堪回首”的长篇政论，“分载数日”。苏曼殊（1884～1918，近代作家、诗人，南社成员）的小说《断鸿零雁记》，也是边写边经沈钧业阅定，连载在这家报纸上的。办报同人张云雷（1883～1977，近代诗人、光复会和同盟会会员，南社成员）曾称赞沈钧业“不愧为好主笔，报馆大部分事都由他一人担当”。

从1909～1911年，沈钧业在南岛两载，写了不少旧诗。据1943年2月12日作者自叙：“余以已酉之冬，由日本赴南洋群岛，二年滞留，间或作诗。作非一时，事非一处。三十年来，强半遗忘，兹

录存之。其记忆不清者，则略有补作，聊志鸿爪”。其中有回忆与陶成章见面场景：“‘会稽先生’一世雄，芒鞋踏破万山中，中原王气久沉寂，海外忽逢虬髯公。”“会稽先生”即陶成章，据龚味生《自叙革命历史》云：“（陶成章）数月之间，提皮包，蹑草履，行浙东诸县”。“虬髯公”本指隋朝张仲坚，这里指的也是陶成章。沈钧业积极响应广州、武昌等地的起义和上海、杭州的武装光复，与泗水、爪哇的革命同志一道，积极奔走各地，为革命军筹集军饷。

武昌起义后，陶成章由日本回国。稍后沈钧业也回到国内。1912年，沈钧业与朱希祖、钱玄同、龚味生、沈兼士、许寿裳等章太炎十弟子一起组织“国学会”，推章太炎担任会长（姚奠中、董国炎《章太炎学术年谱》第195页）。“国学”是辛亥革命时期在中国出现的名词，它是引进西方近代文明的思想运动在中国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章太炎对“国学”的看法有一个流变的过程，1906年，章太炎在《国学讲习会序》中说：“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持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到1922年，他又说“国学的名称起于近代，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为了区别于西学，于是称中国本有的学术为国学”（章太炎《国学概论》第74页）。这种变化的实质反映了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界虽然在引进西方富强之道，以拯救民族危亡这一任务上达成共识，但具体实践却是一个相当长过程。章太炎认为：“本国的学问，本国人自然该学，就象自己家里的习惯，自己必定应该晓得，何必听他人的毁誉？”他不反对学习西方的长处，“至于别国所有中国所无的学说，在教育一边，本来应该取来补助（章太炎《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他强调“今之言国学者，不可不兼求新识”（章太炎《国学讲习会序》）。为达到这个目的，章太炎曾多次赴海外游历、讲学，沈钧业随其左右，成为章得意弟子。以后革命受到挫折，章太炎把主要精力投入学术研究和文教事业中，这对沈钧业是有影响的。

光绪三十二年（1906），沈钧业在日本协助章太炎主编《民报》，后经章介绍，加入同盟会。宣统元年（1909）年8月，陶成章为《民报》复刊和筹款等事与孙中山发生冲突，章太炎支持陶成章。第二年，章太炎与陶成章在东京重组光复会，章太炎任会长，陶成章任副会长，沈钧业与李燮和、魏兰同为光复会南洋执行总部执行委员。沈赞成光复会和同盟会之间的联合。宣统二年（1910）11月5日，陶成章答复沈钧业说：“兄所言‘与其虚言实事，不如实行虚事’，乃至理名言，所可惜者，光阴易逝，精力虚耗”。随着革命阵营内部矛盾加剧，光复会一派受到压制或被排挤。辛亥革命胜利后，章太炎推荐光复会领导陶成章任浙江都督，熟料陶成章在上海遇刺客身亡。“复生先生得悉后，五内具焚”（朱仲华《光复会会员沈复生事略》）。当年2月，孙中山聘请章太炎为总统府顾问，双方在向日本借款及建都问题上意见向左。章太炎转而支持袁世凯在北京建都，袁世凯聘章为总统府高等顾问。5月，统一党、共和建设讨论会、民社、国民协进会等政党团

体合并成共和党，黎元洪为理事长，章太炎任理事。据《绍兴市志》载：共和党绍兴分部，于同年秋由沈钧业等5人发起成立。徐子干遵照绍兴分部所嘱，延揽镇上要人，于翌年初组织共和党安昌事务分所。12月，共和党绍兴分部合并于进步党。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绍兴分部解散。

二、心系桑梓　热心公益

辛亥革命后，沈钧业历任浙江省军政府教育司司长、浙江省政务厅厅长、金华道尹、山东省政务厅厅长。1912年，为了纪念陶成章烈士，沈钧业与蔡元培、周树人、龚味生、孙德卿等13人，本着烈士生前普及妇女教育之遗愿，在绍兴发起创办成章女校，并成立校董会，沈钧业任校董。学校初名成章女校，1914年起改办女子小学。1916年8月，孙中山莅校视察，据《鲁迅日记》记载，他曾先后2次察看校况。1927年起男女生兼收，改名为私立成章小学，1950年改称私立南街小学，1957年改称绍兴师范学校附属小学。1962年“祭陶”50周年之际，改称成章小学。“文革”期间又两度改名。1980年起恢复成章小学的原名。

1913年9月，孙传芳入浙，杭州各界开欢迎会，一时诿词连篇，而沈钧业独具胆识，致词谓：“馨帅武功彪炳，然终属煮豆燃萁，若能致力于外敌，复金瓯而张国权，则我当代表浙江人民，泥首军门。”1915年，位于东浦镇的热诚小学[①]厨房失火，等到发现时已经成燎原之势，学校房屋大部被焚毁，甚至连后院里的数百杆绿竹也被烧焦。经过沈钧业和陈燮枢呼吁，学校由浙江省政府拨款5000元加上徐锡麟烈士的抚恤金重建。1921年，沈钧业出任浙江省议会第三届议长，他赞成章太炎的省自治主张，主持制订浙江省宪，反对军人干政。1925年，沈钧业应盟兄直隶省长孙世伟邀请北上，任直隶省署顾问，得谒孙中山于北京协和医院。后来大概因其政治上受到蒋介石集团的排斥，郁郁不得志，遂于1937年8月间，愤然“由沪回里”，息影家园。写于这时期《寒夜读史书所感》，忧国爱民但又无可奈何之情跃然纸上：

“饕风虐雪数寒更，炉火微茫百感生。太息佳人甘作贼，可怜竖子已成名。衣冠末世无完土，金鼓边城有怨声。袖手燕云甘自欺，何须辛苦说长城。玉马西为叹式微，铜仙铅泪认依稀。漫愁汝璧将焉往，其奈迁巢计亦非。辽海风云迷故垒，洛阳宫阙已斜晖。宣和遗事荒凉甚，艮岳摩挲愿恐违。主计新酬汗马功，东南杼柚已全空。居奇大贾持朝局，画饼钱神揖上公。尽有金缯输海外，未妨豪杰实关中。债台原是衰周事，休向人夸聚敛工……”。

回绍后沈钧业十分关心地方公益事业，被邀为锡麟小学、稽山中学校董，并参与修复禹庙。1933年，禹庙大修告成，章太炎撰碑文《重建大禹陵庙碑记》：

①即热诚学堂。1904年由徐锡麟创办，以徐氏撰联：“有热心人可与共学，具诚意者得入斯堂”取名。学堂提倡军训，实行男女同校，是光复会的重要活动基地。1914年热诚学堂改名为热诚小学。

“二十一年始集役，至明年更十有六月而成。凡银币九万三千六百十七。主其事者，绍兴县长汤日新。计工者楼之凡。督役者姚煦，金汤候。堂庑法式，冕服章采，则沈钧业，张钟湘，考于礼书而为之。皆越氏也。”

民国方志的编修，发轫于民国初期各地学校的乡土教材编修。1914年民国政府教育部发文督促各县编修乡土志，作为各地学校的乡土教材，其中以江、浙、川、沪、两湖编纂较多。这些乡土志文字浅近，以传授本地历史文化和进行乡土教育为宗旨，同时也为各地方志的编修奠定了基础。沈钧业热心收集乡邦文献，从事文物古迹的考察和保护，著有《绍兴氏族考》。1934年，陈焕任绍兴县县长，登门拜访各耆宿，商议修志大事。感其诚意，沈钧业慨然允诺。1935年初，绍兴县修志委员会成立，沈钧业是7位常委之一。今存沈编《绍兴县志资料第一辑·氏族》民国二十七年铅印本和《绍兴县志资料第二辑稿本》，录绍兴124氏483族。沈言“吾邑旧志无氏族一门，是编所载系以各家谱为依据，加以采访所得者汇录而成，以为他日修志时撰氏族志之底本。各族始迁之地其族谱所载多有音同字异不易稽考者，则注明现属镇乡名，以别之。”凡引文均注出处，采访必明来历。“因修谱之时或得之传闻或有意攀付以至参互纠纷莫可整理。是编先按原谱所载录而存之，间付考证以至比对。文献脱落亦不过存十一于千百耳。（沈钧业《绍兴县志资料氏族编例言》）”。《绍兴县志资料第二辑》还补充了堕民的资料。《绍兴县志资料》原分存于沈均业、王子余、朱萸君、陈艮仙等常委处，后分别转移到张墅。据王子余《张墅西厅书目》记载：“朱、陈、沈三家均初藏小云栖，余迁张墅，乃取以汇存予处。”新中国成立后，由王子余次子王贶甫捐给国家。1943年，浙东粮荒严重，难童流离，沈钧业会同王子余等向沪、杭绅商募款，筹办民间组织难童教养所，任董事，专司“收容难童并教以手艺”。

三、研究马列主义

沈钧业为官20年间，目睹了军阀政治和蒋介石统治集团的腐败无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的猛烈冲击之下，一度倾向马列主义的宣传。他曾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领悟到“剩余价值，此为资本家社会掠夺之秘密。”还学习列宁的国家学说，写心得说：

“社会主义者对国家的观念可分为两派，甲派尊重国家职务，扩张国家之权威，利用它去做各种改良的革命，然后听其自然消灭，……乙派以为国家在现今并无存在之价值，不但憎恶它现在的形式不好，就令它进步到任何形式，也是社会主义的障碍物，而主张废弃它。大概甲派以马克思主义者为代表，乙派属于无政府主义者。”

这里沈钧业虽未能准确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在国家问题上的原则区别，但他在学习马列著作是可以确信无疑了。由于沈钧业接触到了崭新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因此这一时期他的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他异常忧虑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一次他从上海四川路一家日本人办的内

田书店购书回来，就感慨万分地写道："见日本出版界之日新月异，遂叹吾国学术之不振，不能不有存亡之想也。"他同情受压迫的人民群众，有一次，家乡为征收户捐，乡公所和乡民之间发生了严重冲突。眼看群众就要遭殃，沈钧业毅然站在乡民一边，奔走数日，通过调解，终于平息了这场风波，使乡民免受了一场灾难①。事后，他愤然记云："盖鱼肉乡民，此辈惯技。及至事情闹大，尚欲重惩乡民，以泄其私愤。可谓全无天良者矣！"

四、同仇敌忾　提倡民族精神

沈钧业的民主爱国思想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中国人民八年抗战期间，达到了很高的程度。"九一八"事变后，他的心情是"虽见秦迁覆，仍忧鲁难加。"1937年7月间，当得知同学和战友冯骥才父子被炸死于上海的噩耗后，他悲愤万分，控诉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写下了"弥天烽火追穷寇，沿海穷黎器使君"的讨敌诗句。他对蒋介石统治集团消极抗战极为不满，写了《楚客吟》一首长诗，揭露他们的腐败无能。诗云：

"不知何将军，麾下十万骑，……见敌一何怯，奔北非一次。似云战略然，大言仍欺世。旬日失数州，仍然拥高位。"

这位何将军就是时任民国政府高级将领顾祝同。与此同时，他则以极大的热情宣传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在《与客谈明季浙东山寨遗事有感》一首诗中写道：

"山中岁月纪春王，颁诏何须辩鲁唐。此日甲兵栖越纽，相继饶吹渡钱塘，檄传英霍军威远，势压杭嘉士气扬。成败区区君莫问，中华终竟属炎黄。……"

这首诗的前四句，曾被周恩来同志于1939年来绍兴时，抄赠给当地《战旗》杂志编辑曹天风，可见其诗旨的宏大切时。"春王"，大一统也。"不辩鲁唐"，只要能抗战救国，就团结之。这首诗下，作者原有跋语，兹录如下：

"山寨之起，不能不征粮于民，其艰苦可想。然如张苍水之'平岗案'、李长祥之'东山寨'筑海塘，勤屯垦，事事为民生着想，非但不扰民而已。人民与义师既融成一片，则狡虏之反间，佥人之诱惑，皆无所用其伎，敌岂能一日居哉？无如统率无一，亦有假名义师自便私图者，人民患苦，不免移其恨虏之心转而恨义师，于是鄞之谢三宾，绍之严我公辈，反得藉此为进身之阶。告密也，招抚也，蒙面虏庭，恬不知耻。山中义旅，遂亦渐渐解体矣。读史至此，能无流涕！然而义烈流传，种性不灭，迄清之季世，我浙东山寨，仍接踵平起，以复九世之仇，不可谓非我先民之遗教也，此尤论古者所当知已。"

在这个时期，沈钧业还写了《祭秋睿卿瑾女士》、《谒祁忠敏公像》和《祭陆放翁》等诗篇，赞扬"雪耻之乡"的这些以身殉国的民族英雄，"时代虽殊大节同，民族精神永不死，"激励人们要保持民族气节，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而勇于献

①据《张市志》：民国二十年（1931），新婆底机纺户与乡公所冲突，被诬撕毁孙中山画像，经沈钧业调解平息。

身。在《祭秋睿卿瑾女士》中，诗人先是写道："三百年前金夫人，镇东阁下血不灭。三十年前秋先生，轩亭口畔血犹热。大金祠荒不可寻，遗事犹闻故老述。秋坟姓名妇孺知，三十年来如一日。"金夫人是明末抗清英雄。将秋瑾与金夫人并论，意在突出秋瑾的革命影响。接着他通过回顾秋瑾的革命事迹，自然引出诗作主题："婺处二州多杰士，幽光潜德今存几。山寨联盟遍浙东，刘、张、周、品同时起。一时声气及衢瓯，盟主居然让女流。飞檄但凭金约指，犒师敢惜玉搔头。"指出："呜呼惟君与金氏，洵是越中奇女子。时代虽殊大节同，民族精神永不死。一亭风雨越山颠，极德崇功岂偶然，草章陈词君莫笑，重提旧曲代神弦。"

他还经常用爱国主义思想教育自己的子女，寄书远离家乡的孩子们：

"家国正多难，天下共此心，及时应努力，莫被客愁侵。"

勉励他们为拯救民族和国家的危亡而努力工作和学习。沈钧业共育有三子。1999年，次子沈家楠作为"两弹一星"专家，受到江泽民主席的接见。

五、以诗咏志　诗史飘香

沈钧业曾先后参加过"南社"、"越社"等革命文学团体。南社之"社"，来源于明末清初的复社、几社之社。据陈去病《南社杂佩》："南社者，去病与吾苏高旭、柳弃疾三子所以继东林复社之志业而与焉者也"。它是20世纪初一批革命民主主义者，以推翻清朝统治为目标建立的，全国性、近代性文学团体。社员大部分为光复会、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前后，南社的活动中心主要在长江三角洲地区。据陈去病《民国十八年(1929)南社杂佩》中甲同岑录："凡社友之消息可考者，均列与此。沈钧业，字复生，籍贯浙江绍兴"。越社是一个绍兴地方的文学团体。宣统三年(1911)春夏间结社，为"南社"分社。据原中央文史研究馆宋紫佩《二十年来之回首》："时革命思潮贯注于人人之脑海，而吾越为尤甚。予因征集匡社同志，另设越社，遥与南社相呼应。"社刊定名《越社丛刊》。鲁迅先后以"会稽周建人乔峰"名义发表《辛亥游录》，以"周作人起孟"名义发表《古小说钩沉序》。抗日战争爆发后，"越社"活动停止。1947年2月，沈钧业、朱仲华、王贶甫、王铎中等，复建"越社"。

1932年，沈钧业发起重建龙山诗巢壬社，与王子余、杜亚泉等定期活动，以诗唱和，诗作甚丰，编印有《诗巢壬社唱和集》六卷。其一生中写下的诗是很多的，所可惜的是据他自己说，"多半遗忘"和散失了，录存下来的只是"聊志鸿爪而已"。沈钧业的诗反映了作者对当时黑暗现实的不满和强烈的爱国思想，有些诗是作者进行革命工作的纪实，这对今人仍然是有教育意义的。且有许多诗关涉到辛亥革命时期的人和事，是研究中国近代史非常宝贵的资料。

世界红卍字会绍兴分会史料钩沉

□　裘士雄

也许是存世时间短暂的缘故，近年先后出版的《绍兴市志》、《绍兴县志》、《绍兴市卫生志》、《绍兴市民政志》和《绍兴市军事志》均只字未提世界红卍字会绍兴分会及其活动。其实，与红十字会一样，红卍字会也是一种志愿的国际性救护、救济团体。它原从事战时救护工作，后逐渐包括自然灾害救济、社会救济等事务。1904年3月10日，经上海闻人沈敦和、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等人的努力，在上海英租界工部局成立的“上海万国红十字会”，这是中国第一个红十字会。是当时在中国领土东北发生的日俄战争催生了“上海万国红十字会”。1910年6月5日，则易名“大清红十字会”。民国前期，各地军阀连年混战，红十字会也发挥了它的作用。抗战军兴，则以“中国红卍字会”名目出现，总部设在南京，绍兴分会会长是陈秉彝（1878～?），他当过绍兴商会会长，是著名的地方士绅。世界红卍字会绍兴分会成立于1936年6月，会所设在绍兴府山后的张神庙、风神庙（今市外侨办所在地）。会所墙壁刷有一、二米大小见方的“卍”字，非常醒目（见图1）。其会员外出公干一定打出书有“卍”字



图1：世界红卍字会绍兴分会。（金永华　供稿）

的旗帜，会员的胸标、袖套也必有“卍”字。绍兴红卍字会活动了五、六年时间，随着1941年4月17日绍兴陷于敌手，它也终止了活动。说到红卍字会，当代人很陌生，甚至连“卍”和希特勒法西斯的“卐”都搞不清楚。卍，音wàn，佛教常用之。1937年12月，日本侵略军灭绝人性地疯狂进行“南京大屠杀”，红卍字会成员救治幸存者，收殓死难同胞遗体等，做了大量有益工作。抗战胜利后，审判日本战犯，也有红卍字会人员出庭作证，红卍字会的历史性贡献应该加以肯定。同样，绍兴红卍字会也做过大量值得铭记的工作，主要的有：



图2：难胞排队领取绍兴红卍字会发放的救济。

1.救济难民。1937年“八·一三”沪战突然发生，上海难胞纷纷来绍，绍兴红卍字会即在城区开元寺设立难民收容所，“办理给养、资遣”。不久，杭嘉湖亦沦陷，“沪杭线各县难胞及本籍回绍者为数甚多，开元寺收容所因事迁出，改在府山后本分会间壁葛公祠及仓圣祠为第一收容所，啸唫镇车家浦为第二收容所”。杭州沦陷前夕，其难民收容所亦被迫解散，多数难民拥到一江之隔的绍兴。在这一非常时期，难民救济委员会绍兴县支会甫经成立，而下属的难民收容所尚在筹建之中。这样，绍兴红卍字会这两个收容所担当了收容难民的重任。每天接待难胞有数百人之多（见图2），早已告人满，办理给养和资遣，尤感困难，只得向宁波四明红卍字会和上海红卍字会求援。沪、甬红卍字会体谅绍兴红卍字会的难处，上海李、盛两会长与四明陈会长曾特此来绍考察商议，承诺绍兴红卍字会所缺乏之款项物品由上海红卍字会设法接济，部分难胞则资遣到甬，再转沪。据统计，自绍兴红卍字会设立难民收容所以来，不到2年时间，接收了12500余位难民。除设法资遣或自行出所者外，留在收容所提供给养者常在1700至1800人。1939年前后，绍兴粮荒非常严重。在新近发现的10余帧绍兴红卍字会照片中就有1帧原照背面写明“该梅墅办事处门前急放杂粮”（见图3）。为广大难胞服务的救济队员“初由四明全浙各会联合办事处



图3：绍兴红卍字会梅墅办事处正在发放杂粮。



图4：遭受日本飞机轰炸后，绍兴红卍字会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抢救。（高绍祥　藏）

派到上虞分会队员五人及工役均有薪给”，除此之外，大部份救济队员由绍兴红卍字会会员“担任义务”，并“自愿出资置备服装等费”。红卍字会会员纯粹是志愿行动，不发薪水，其精神令人十分感佩。

2.救死扶伤。绍兴最早遭受日机轰炸的是曹娥飞机场和绍城西郭门外，绍兴红卍字会“同人等目击心伤，亟筹救济”（见图4）。他们主动同美国人高福林（1877～1959）办的绍兴福康医院联系，并取得院方的支持，“福康医院为本分会临时伤病医院”。“自萧山县被轰炸及于本县各地，无不出发救护”。随着战事临近绍兴，日机三天两头轰炸绍兴城乡，伤兵、伤民和病患者到绍兴红卍字会“请求治疗日见多，除特约福康医院外，借蠡城凌霄社为疗养所，在本分会内设治疗室，由单会员担任西医，陈会员担任中医。所需药品甚巨，虽承沪甬卍会拨助，而出资购办者尚多”，经费缺口甚大，绍兴红卍字会经常发出呼吁，也得到全社会的响应。如福康医院，“院中主事暨中外医师、看护诸员役多尽义务”。

平时，绍兴红卍字会也组织演习活动，使有关人员掌握抢救伤病员的知识和技能。有一次，绍兴金家花园（今儿童公园）旁遭受日机轰炸，警报一解除，绍兴红卍字会人员就赶赴现场，抢救伤员。（见图5）遇到有人在空袭中遇难，绍兴红卍字会人员怀着悲痛的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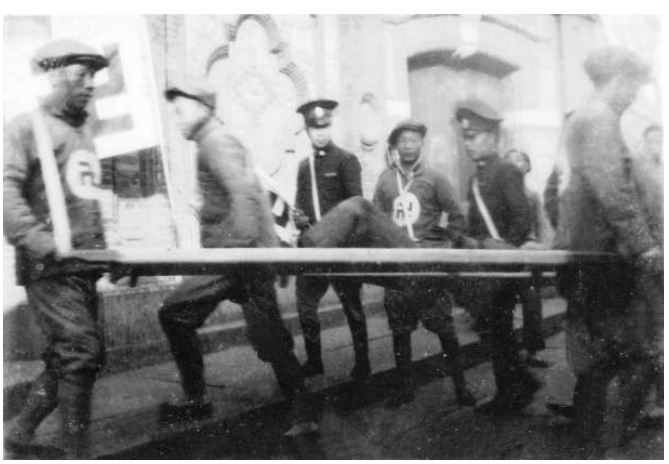


图5：绍兴红卍字会担架队救护伤病员。



图6：绍兴红卍字会会员掩埋遇难同胞尸体。　（金永华　供稿）

情，埋葬死难同胞。（见图6）从附图为死难者所立的木质墓碑来看，死难者系杭州人，名叫傅利弟，木质墓碑写明死难者姓名、籍贯、死难时间和地点等。原照背面写有“志新葬尸首”等字样，当为名叫“志新”的红卍字会员正在掩埋遇难者遗体。

3.收集日伪罪行史料。1940年2月17日（农历正月初十），日本侵略军兵分三路，冒雪渡过钱塘江，偷袭驻绍兴一带的中国军队。驻柯桥的国军79师得知日军这一企图后，经过一番准备，在湖塘古城老秧山岙给予日军迎头痛击，日军遭受了较大损失，中国军队也有96位官兵阵亡。日军吃了亏，撤退时途经夏履桥，又暴露出它的兽性，在那里疯狂地报复，实施“三光”政策。近年新发现的关于绍兴红卍字会的一组照片中，其中有一帧照片是断墙残垣，有两位绍兴红卍字会人员站在废墟上调查记录，而这帧照片的背面有当事人的手迹：“劫后之夏履桥”等，这是日本侵略军铁的罪证，弥足珍贵。（见图7）

4.为民众送医送药。除从事战时救护工作外，绍兴红卍字会也参与抗灾、社会救济和施医药等工作。当时拍摄的一帧照片人头攒动，墙上挂一黑板，上有“本所特约中西医士一览”几个较大的字清晰可见，下面密密麻麻的中西医师名单已无法辨认，这是1940年前后，绍兴红卍字会组织中西医下乡义诊的热闹场景。即使平时外出，绍兴红卍字会会员总随身携带保健箱，以便及时



图7：“劫后之夏履桥”，两位绍兴红卍字会员正在调查取证。　（金永华　供稿）



图8：绍兴红卍字会会员随带保健箱下乡。　（金永华　供稿）

施救。（见图8）

前些年有一次偶然的机会，碰到从外地回乡探亲的陈秉彝的后人（可能是孙子）陈谋立先生，他和他的姐妹由于当时年龄太小，印象很少很浅，陈家原在八字桥直街，记得那时有红卍字会会员进进出出，很忙碌，好像借他家房子办过什么培训班。陈谋立还陪同笔者四处走访查找有关遗址，可惜收获不多。《会稽车家浦陈氏宗谱》的记载亦十分简略。只有金陵陶道开在《序二》中记载："今红卍字旗帜飘扬于环瀛世界，盖大道为公，大同进化之机已兆于此矣"等语，从一个侧面佐证了红卍字会在绍兴活动的存在，道出了红卍字会绍兴会会长陈秉彝与南京红卍字会的关系，陶道开很可能是南京红卍字会总部的负责人。民国《绍兴县志资料》第二辑仅藏《世界红卍字会绍兴分会报告书附启》2页多，语焉不详，但也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史料，如该会所"缺乏之款银物品"，"函电向沪同乡呼吁，先后由同乡李馥荪先生及沪卍会所设难民救济会拨助款银及物品，俾得勉力支持。"所需食米又因人多食众，所备不敷，也是由绍兴红卍字会"派员往南昌，托裕民银行陈行长代购，设法运绍接挤。"绍兴红卍字会的义举也得到各界支持，"轮船各公司各航线到达码头，概为搭运难胞，并不收费，且招呼异常周到。电话公司亦蒙免去装费、月费。汽车公司亦有尽义务之处"。在面临民族大劫难的危急时刻，许多本埠与外地的同胞特别是同乡伸出了援手（福康医院外籍医护人员也是如此），而绍兴红卍字会从中所起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并应予充分肯定的。

钱玄同和古越藏书楼

□ 鲁先进 张玲琳

【摘 要】文章通过钱玄同自撰之年谱、日记等史料，对钱玄同在绍兴古越藏书楼苦读一事及岳父的种种说法作一澄清，得出钱玄同在1909年7～8月到过古越藏书楼、岳父为藏书楼总理徐尔谷的判断。

【关键词】钱玄同；古越藏书楼；徐尔谷

钱玄同（1887～1939），祖籍湖州，生于苏州。原名师黄，字德潜，又字季、子季，后改名玄同，号疑古。著名文字音韵学家，北京大学教授，《新青年》编辑，“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提倡文字改革，创议并参加拟制国语罗马字拼音方案。子钱三强为我国著名物理学家。

古越藏书楼，由绍兴乡绅徐树兰（1838～1902）于1902年创建，在办馆理念、管理制度、藏书建设、分类体系等方面均领一时风气，被推为我国近代第一个公共图书馆。

（一）

关于钱玄同与古越藏书楼以及藏书楼主人徐家的关系，就目前所见资料，约略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1985年，朱允坚在《绍兴文史资料选辑》上发表的《古越藏书楼与县立图书馆》：

古越藏书楼于一九〇一年（光绪二十七年）开办，由徐树兰亲自主持，每年捐银一千两作为经费，充请人管理和添置新书之用。因为藏书新

旧咸备，是知识源泉，虽仅供检阅而不出借，但环境清幽，起坐舒适，是读书的好地方，颇为探索学术的自学者称赞。越中名流如蔡孑民（元培）等在里时，都曾来检阅过书籍。著名学者钱玄同，是徐氏门婿，少年时常在此博览群书，与康（有为）、章（太炎）同脉，以为古书多古人伪作，因此别号“疑古玄同”，这可能在藏书楼沉湎于书堆中有关。徐树兰不久去世，由其子尔谷继续主持。尔谷死后，长子世大（康候）席丰履厚，纨绔习气深，人人称为“康大”，就是好做大老倌，性格又有点怪僻，与钱玄同郎舅二人，可称一对很爱戏弄人、玩世不恭的人物，有徐文长再世之称。①

二、1987年，徐明浩在《绍兴文史资料》上发表的《古越藏书楼创办人徐树兰先生》：

著名学者、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之一的钱玄同先生，也曾在古越藏书楼闭户读书达数年之久，并由此而奠定了学业基础。据父辈传说，钱玄同先生之与徐家联姻的缘由，是因为他在藏书楼用功苦读，被祖父徐元钊和二祖父徐尔谷看中了，认为钱先生少年好学而有为，遂将大姑母许配与他。此外，绍郡中西学堂、绍兴府中学堂师生中的许多杰出人物，他们的成才与藏书楼的辅翼作用也是分不开的。②

三、1996年，叶放在《中国文物报》上发表的《中国近代图书馆的发端——古越藏书楼》：

古越藏书楼不仅在我国图书馆史上值得大书一笔，而且在培养人才方面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越中名流蔡元培等在里时，曾来此检阅过书籍，著名学者钱玄同（钱三强同志父亲），是徐氏门婿，少年时常在此博览群书，获益非浅，诚如藏书楼阅览厅中的一副抱对所言：“吾越多才由续学，斯楼不朽在藏书”。③

四、2002年，葛能全编著《钱三强年谱》：

1913年，出生。

是年10月16日，钱三强生于浙江绍兴岳父家。

其父钱玄同……1906年春，奉兄长（钱恂，其长玄同30岁）之命返国，与绍兴清朝举人徐树兰之女徐婠贞在上海结婚，随后再赴日继续学业。④

五、2002年，李可贞编著《钱玄同传》：

1906年春，钱玄同奉兄命回国。5月，与浙江绍兴徐琯贞女士在上海结婚。

徐琯贞的父亲徐树兰是清朝举人，曾任兵部郎中、知府等官职，热心于公益事业，在绍兴镇建造了一座

①朱允坚：《古越藏书楼与县立图书馆》，《绍兴文史资料选辑》第137页，1985年版第3期。
②徐明浩：《古越藏书楼创办人徐树兰先生》，《绍兴文史资料》第57页，1987年版第3期。
③叶放：《中国近代图书馆的发端——古越藏书楼》，《中国文物报》1996年11月24日第4版。
④葛能全：《钱三强年谱》第1页，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年版。

很知名的书香楼。书香楼内藏有很多书籍和文房四宝，因此，吸引了众乡邻子女前来读书，并有不少饱学之士在这里校勘古籍。蔡元培曾于1886～1889年在书香楼读书校书达三年之久。徐琯贞自幼随父辈在自家的藏书楼读书，长大后还曾赴上海读中学，是一位知书达理的女性。①

六、2002年，刘一丁在浙江日报上发表的《古越藏书楼》：

上个世纪初叶，湖州一位贫困书生到了绍兴。

有一天，当这名叫钱玄同的青年在戴着毡帽的人群中思忖下一顿食物的时候，遇上了一位穿长衫的人。这位面慈心善的“长衫人”引领着钱玄同走进一座大宅院，书生本能地抬头，仰望院门上方几个斗大的隶书，心中赫然亮了起来：古越藏书楼。

钱玄同永远无法将这一天和这一位贵人从记忆中抹去。因为就是从这一天起，书生的命运与这座书楼结了缘。他在书楼里孜孜不倦地攻读，甚至享受免费的膳宿。天上不仅掉下了馅饼，还掉下了一个“林妹妹”。不久之后，钱玄同与书楼主人的千金小姐共度佳期，喜结连理。

这仿佛是梦，却是现实。

钱玄同从书楼出来，成了中国语言文字学家的同时，还为自己、为绍兴，为国家贡献了另一位奇人，那便是他的儿子、科学家钱三强。

……

遗憾的是，徐树兰，这位中国最早的、具有公共图书馆性质的藏书楼始作俑者，却在书楼建成不久撒手人寰。好在长子徐元钊继承了先父的衣钵，将书楼“开放”了，并且，还在日后的那一天里，意外地把钱玄同请进了殿堂。②

七、2002年，高燕、金敖生在《浙江日报》上发表的《从古越藏书楼到绍兴图书馆——一支唱了百年的歌》：

近代绍兴人才辈出，恐怕离不开一个“书”字。在以后的岁月里，至少有十余位上得了中国文化史的学者曾在古越藏书楼攻读过。被传为佳话的是，当年的贫苦学子钱玄同偶遇徐树兰之子徐元钊，被他领回家来，安顿在藏书楼读书，还免费提供膳宿。数年后，好学上进的钱玄同与徐元钊的长女喜结良缘，再后来，钱玄同成为中国语言文字学家，而他们的儿子就是我国著名科学家钱三强。③

八、2006年，邱巍在《书屋》上发表的《钱玄同和他的家族》：

长兄对钱玄同的另一至大影响是替他定下了终身大事。钱玄同的夫人徐婠贞也是出自名门的大家闺秀。其祖父徐树兰是光绪二年（1876年）的举人，曾任兵部郎中、知府等官职，

①李可亭：《钱玄同传》第13页，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②刘一丁：《古越藏书楼》，《浙江日报》2002年6月28日版。
③高燕、金敖生：《从古越藏书楼到绍兴图书馆——一支唱了百年的歌》，《浙江日报》2002年10月24日第1版。

在绍兴建了一个很著名的藏书楼——古越藏书楼。蔡元培曾在徐家校书经年。而父亲徐元钊又是钱振常当年在龙门书院时的门生，钱徐两家堪称世谊。1904年冬，由钱恂做主，钱玄同和徐婠贞订婚。不过对于这宗门当户对的包办婚姻，钱玄同似乎一开始就有抵触情绪。观其1906年5月述其结婚前后的日记，仿佛是看客看了一场别人的结婚，全无一点喜悦或兴奋之情，而多是对结婚前后烦琐礼节的厌恶，他的新婚之夜是用“是夜难过，真平生罕受者”而概括的。①

除上述记载，其他报刊、图书还有此类的介绍，如杨小白《百年沧桑——从古越藏书楼到绍兴图书馆》、周圆《古越藏书楼“藏”着多少先锋与传奇，我们的身边“藏”着多少当年的“书屋”》等，但基本没有跳出上述的说法。大致可得出如下观点：

一、钱玄同年轻时在古越藏书楼苦读数年，成就了他的学问，且因此被徐家看中而成为女婿。

二、钱玄同岳父，即夫人徐婠贞之父，有徐树兰、徐元钊之说。

事实真相到底如何？下面试以具体史实进行梳理分析。

（二）

一、钱玄同年轻时是否在古越藏书楼苦读？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古越藏书楼从筹建到改组的一段简单历史：

1900年，集议筹建，1902年粗具规模，1903年告成，1904年向公众开放。

1911年，因辛亥变故停办。

1916年，徐尔谷续办。

1921年，尔谷离乡复停办。

1926年，徐世南重整开放

1930年，世南游皖南，再度停办。

1932年，绍兴县政府将之改组为绍兴县立图书馆。②

而根据前所引资料，钱玄同是因在藏书楼读书方成就姻缘。那么钱玄同是什么时候定下这段婚事的？《钱德潜先生之年谱稿》载1904年，“是年冬，阿兄为予定姻于会稽徐氏。”③也就是说钱氏在古越藏书楼读书的时间当在1905年之前，而藏书楼1900年至1903年都在筹备之中，1904年方正式开放，钱何以能在此苦读数年？

钱玄同自记一生情形，一是《钱德潜先生之年谱稿》，自出生至1905年，“是年十一月随兄等东渡，此后有日记矣”④；二是《钱玄同日记》，1905年12月9日至1939年1月14日，中有间断。年谱与日记的保存，使其平生行事基本完备。福建教育出版社影印出版的《钱玄同日记》将《钱德潜先生之年谱稿》作为附录收入其书。

钱玄同父亲钱振常（1825～

①邱巍：《钱玄同和他的家族》，《文史参考》第23页，2007年第4期。
②绍兴图书馆：《从古越藏书楼到绍兴图书馆》第17页，浙江人民出版2002年版。
③④北京鲁迅博物馆：《钱玄同日记》（第12册）第7525～7578页，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1898），清同治十年（1871年）进士，官吏部主事，晚年寓居苏州，湛深经学，精于考据，治小学。子二，长子钱恂，号念劬，外交家，任中国驻日、英、法、德、俄、荷兰、意大利等国使馆参赞及公使；次子钱玄同，出生时，钱振常已逾六旬，对他的教育分外严格。“家君以苏俗多无赖市井，乃学坏之地，故禁不使出门，自幼至先君见背之年总是这样。”[①]钱振常卒于1898年，时钱玄同12岁。此前除父亲自教，先后聘请李吉夫、顾挹峰、莫砚山、董东初、李夔颺、朱培甫、冯蓝宋、张得川、延沈鉴等先生，读《尔雅》、《毛诗》、《周易》、《文字蒙求》、《尚书》、《礼记》、《四书》、《左传》等书。是年十一月，随兄至鄂。1899年，延冯师读公羊、谷梁传，十月奉母旋苏。1900年，随冯师读周礼，学试帖诗、八比文。1901年，从苏州唐继盛学试帖文。秋，废八股试帖，取士以《四书》、《五经》义，因改业唐师，看《盛世危言》、《校邠庐抗议》诸书。1902年，从冯蓝宋受业，作《四书》经义。夏，至湖州府试，六月旋苏。七月生母卒。住李丈家，大病，十二月始渐瘥。稍阅新书。1903年春，兄挈眷赴俄。始欲读欧文，想以译书为糊口计。1904年春，值郡试，去书坊甚多。四月与方青箱、张界定、潘贵生等办一杂志，曰《湖州白话报》。六月渡申，制西衣。八月在湖。冬，兄为其定姻于会稽徐氏。1905年春至上海南洋中学读书。三月，兄自俄归国，寓杭州半载。其夏钱玄同亦往。八月廿七日，学堂因孔诞演剧，钱不赞成，致召全体学生之反对。十一月随兄嫂东渡日本。[②]

事情很明了，钱恂这个哥哥长钱玄同三十余岁，父亲去世后，长兄为父，相当于给他包办了个婚姻，对象就是出生于绍兴的徐氏。钱玄同一向敬畏于长兄，惟命而从，至1905年，他与绍兴的关系，也只是定了个名义上的亲。

那么1905年之后，钱玄同是否到过古越藏书楼？查曹述敬《钱玄同年谱》，约可得出大致行踪：

1906春回国，五月在上海与徐婠贞结婚，九月又赴日本。直到1909年“七月，归国，到绍兴徐氏岳父家探亲。十月，回东京。”[③]1910年五月归国，相继在湖州、海宁、嘉兴、杭州任教；1913年钱恂担任大总统府顾问，八月，钱玄同由杭州至北京。“钱玄同从一九一三年来到北京，当了二十多年大学教授。但却没有买下一间房子，也没有个固定的租赁的住处。一九一三年钱玄同初到北京时住在他兄长家里。一九一四年，他的家眷来北京后，在东安门北河沿北头叫北箭亭子的地方租民房居住。一九一六年春，袁世凯称帝，钱玄同一家人曾去天津暂住；夏天回到北京，住在

①②北京鲁迅博物馆：《钱玄同日记》（第12册）第7525～7578页，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③曹述敬：《钱玄同年谱》第13页，齐鲁书社1986年版。

宣武门外香炉营头条。一九一七年初，迁居琉璃厂西北园。一九二一年初，又迁居东城赵堂子胡同。一九二二年秋，又迁居景山东街大学夹道。一九三O年春，又由大学夹道迁居沙滩。一九三三年九月移居东四猪市大街双辇胡同三十七号，在这里住到他逝世。所有他家这些住处，都是租赁的。他家的住处所以迁移频繁，一个主要原因是迁就孩子们肄业的中小学的所在地。至于钱玄同个人，一九三四年患病前，他常单身住在师大的寄宿舍或孔德学校。”[①]由上可知，钱玄同是在婚后三年即1909年曾到绍兴探亲。

我们再具体细看《钱玄同日记》，可以知道钱氏是在1909年7月23日至8月20日居住在绍兴，近一个月的时间，但日记仅有7天：7月23日、24日、25日、28日、29日、30日，8月20日。

7月21日“午后五时顷偕武承同乘轮赴杭”；次日晚七时抵杭，夜宿舟中；23日“晚九时顷抵藏书楼”；24日“是晚丈为请宾主共五人”；25日晨到二区莘英小学及中学等校参观，“中饭□长请饭，宾主共五人”；28日上午至谊臣夫人处，见之及其女。晚吉老请酒，陪宾三主人四，共八人；29日“得汤轩信，知其将有杭行，□嘱我补抄藏书楼中□行书约数十片，殊苦。”30日“午前得蓬仙馆印□□”；8月20日“是日离绍，晚六时顷登舟，丈为嘱人送我，因有三箱书要带出也。”[②]

这里，我们只知道钱玄同时年23岁，并且是婚后3年，前后在绍兴住了将近一月，就住在与古越藏书楼相连的徐宅，所记内容却甚是不详，至于在藏书楼是否读书，读什么书，却不得而知，甚至临走时的三箱书也不知是否为岳丈所赠？

另有一事说明，关于钱玄同夫人的姓名，资料一般多记为“徐婠贞”，钱玄同自写之日记也是如此，有时简写为“婠”。但也有写“琯贞”的，如《钱三强文选》，据钱三强妻子何泽慧在代序中所言，钱三强自1991年得知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决定出版他的文选后，“翻箱倒柜整理各个时期的照片，一张一张标明年月，并分门别类装在大信封袋里。”[③]该书有100多帧历史照片，涉及到他母亲的有两张，其中一张下释：“赴法国留学前夕同家人合影（1937年7月　　北京）。左起：钱德充（弟）、钱秉友（兄）、徐琯贞（母）、徐幽湘（嫂）、钱玄同（父）、钱三强。”[④]又如《浙江绍兴栖凫东海堂徐氏年谱》，列有钱三强母亲徐琯贞姐妹8人，琯贞为长女，另有瑗贞、璐贞、瑜贞等，琯贞大伯徐元钊有3女，2女名字不详，三女琳贞。[⑤]根据取名之部首，似“琯贞”为宜。

二、钱玄同的岳父究竟是谁？

这个答案其实就在钱玄同自撰年谱与日记中，但钱玄同手稿多用行草书，率意信笔，所以研读也是一件非常艰难的

①曹述敬：《钱玄同年谱》第113～114页，齐鲁书社1986年版。
②北京鲁迅博物馆：《钱玄同日记》（第2册）第760～764页，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③④钱三强：《钱三强文选》，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版。
⑤徐道长等：《浙江绍兴棲凫东海堂徐氏家谱》第109～113页。

事。原本很简单的问题，竟然出现了多种说法而少人纠正。这里就以年谱、日记为钥匙，启疑惑之门，同时介绍一下其岳父的行状。

1.《钱德潜先生之年谱稿》中的岳父记录。

《鲁迅研究月刊》1999年第5期整理铅印过《钱德潜先生之年谱稿》，《钱玄同文集》据此引用并更名为《钱玄同自撰年谱》作为附录置于书末。全谱不长，但有些字因不识而空缺，其中有1904年“是年冬，阿兄为予定姻于会稽徐氏，徐□□为先子龙山书院之门生也。”下注“原稿二字不识。”[①]（原稿影印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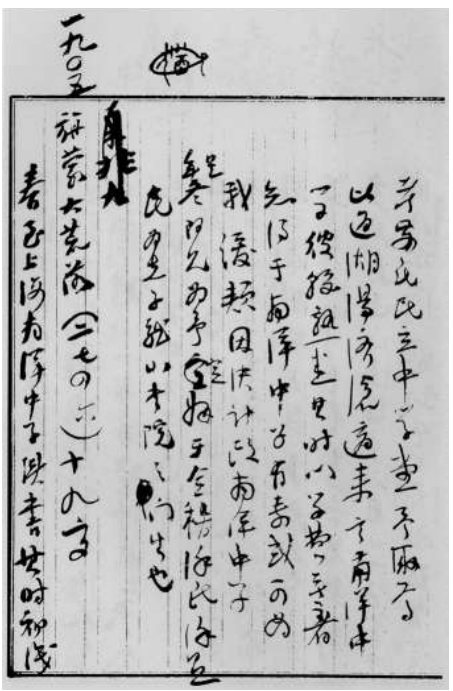


图1

2.《钱玄同日记》中的岳父记录。

日记中有多处记录，或称“丈”、或其名、或“显丈”。最直接明了且字迹较清晰的是1906年日记的末页，是年春钱玄同从日本归国，五月奉兄长之命，在上海与徐婠贞完婚。

此页内容（原稿影印见图2）：

伯岳	徐元钊	吉荪
岳	尔谷	显民
叔岳	嗣龙	谊臣
叔岳	维烈	武承[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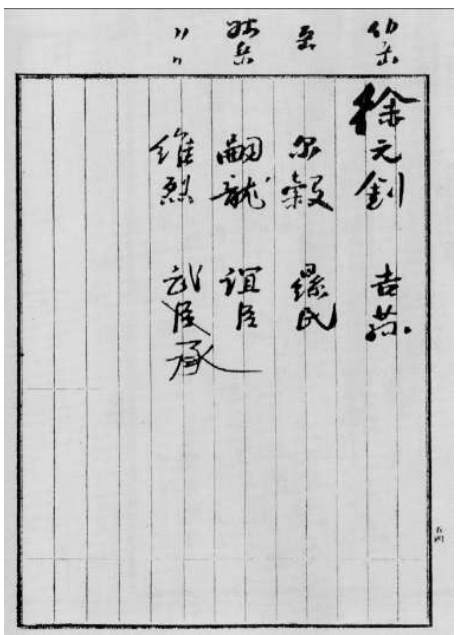


图2

3.《绍兴县志采访稿》中徐尔谷的记录。

上述四人就是古越藏书楼创建人徐树兰的儿子。薛炳民国五年

①钱玄同：《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320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年2000版。
②北京鲁迅博物馆：《钱玄同日记》（第1册）第268页，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1916）所撰《徐仲凡先生传》，其中有云：“子四，元钊字吉孙，尔谷字显民，嗣龙字谊臣，维烈字无竞。谊臣、无竞今已卒。吉孙工诗。显民以贫谋食于北京。”①

至此，对照书影，可知钱玄同之岳父是徐尔谷。至于钱家为什么会与绍兴的徐家联姻，还得说到钱振常。民国《绍兴县志资料第二辑》记“龙山书院掌教”条时，其中一条是“钱振常　笆仙　浙江湖州人　翰林　光绪”②，当时蔡元培、徐尔谷兄弟等皆执弟子礼。

徐尔谷为徐树兰之得力儿子，助父创建绍郡中西学堂。1902年徐树兰病卒，又继承父志，两年后开放古越藏书楼，为当时藏书楼的实际管理者。他与蔡元培交好，这在《蔡元培日记》多有记载，如应蔡要求在日本东京为学堂购买物理、化学器械、标本及仪器，助蔡赴青岛学德语，伺机赴欧等。又与当时实业家张謇等人以“募股”形式在吕四创办“同仁泰盐业公司”。特别是1911年武汉起事，越中人士为维持治安计，兴办民团，徐尔谷总其事，招勇二百名以资镇抚。绍兴临时军政分府成立，徐即担任民事部长兼办民团。王金发治绍，徐等又筹款添募三百余名，按新军规则编一营，为维持当地治安作出了贡献。

（三）

从上述所陈资料，不难看出，钱玄同少年时期不可能在古越藏书楼苦读数年，也并不因此为徐家看中而成为女婿，钱玄同的国学基础渊于家教。又因父亲在绍兴龙山书院掌教，徐树兰子侄为其学生之故，方由长兄钱恂定下姻亲，1906年在上海完婚。1909年，钱玄同来绍探亲近一月，住古越藏书楼近旁徐宅，得以在藏书楼阅书。他的岳父既不是徐树兰，也不是徐元钊，应该是徐树兰次子徐尔谷。

①绍兴县采访处：《绍兴县志采访稿》，民国六年稿本。
②绍兴县修志委员会：《绍兴县志资料第二辑》（第27册）第99页，广陵书社2011年版。